



周叔莲 经济理论文选

(上 卷)

经济科学出版社



前 言

1953年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经济研究所分出工业经济研究所等单位，我随着转到工业经济研究所，一直工作到现在。

我的研究工作大致可分为文革前和文革后两个阶段。这本文选收集的是我在文革后写的一部分论文。由于时间跨度较长，涉及的问题较多，我把这些论文分为十二个部分，每个部分围绕一个主题，它们是：

第一部分：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和经验教训。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国面临着经济发展战略转变问题，当时人们对经济发展战略概念比较陌生，对建国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历史也缺乏研究。针对这种情况，我在《认真研究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历史经验》（《人民日报》1982年5月24日）等论文中，阐明了何谓经济发展战略、如何研究经济发展战略等问题，回顾总结了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历史演变和经验教训，论证了经济发展战略转变的必要性和方向。我强调“正确的经济发展战略必须适合本国的国情”；并指出：“长期以来对于我国经济发展有两种根本不同的战略思想，一种是‘持久战’，一种是‘速成论’。这两种思想都经过不止一次的实践，证明‘持久战’是切合我国国情的，而‘速成论’则不符合国情”。我还提出要“把经济发展战略同社会发展战略、科技发展战略较好地结合起来”。

第二部分：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1979年6月国务院财经委员会布置全国经济结构调查研究工作，我参加了调查研究工作，写了《三十年来我国经济结构的回顾》等多篇论文。我分析了当时我国经济结构的状况和问题，并总结了30年来的经验教训，提出了改善经济结构的政策建议。我还分析了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的关系，指出“经济增



长是经济结构变动的基础”、“经济结构对经济增长有重要制约作用”，具体分析了经济结构从哪些方面影响经济增长。我还研究了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及其保障机制等问题。

第三部分：提高经济效益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1980年，我在一份研究报告中，用大量的事实说明“一五”时期以后我国投资效果和工业企业生产效果下降的严重情况，并分析其原因，指出“提高经济效率是当务之急”。在另一篇文章中，我指出，为了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必须“用实践来检验我们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论证了“增长速度快经济效果未必一定好”，强调“不能再走经济效果差的路子了”。我还根据当时的情况，研究了国民收入和工农业总产值、税利和生产能否同步增长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鉴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对于提高经济效益的重大意义，我把几篇关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论文也收入这一部分。

第四部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理论和实践。建国以后我国实行工业化有巨大的成绩和丰富的经验，也有严重的失误和深刻的教训，这些都需要认真研究总结。1979年我在由我主笔的一篇论文中指出：长期以来流行着一种说法，优先发展轻工业是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方法，优先发展重工业是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方法。这种说法来自斯大林，在我国学术界和经济界有深远的影响。论文从历史、理论等方面剖析了这种说法，指出其谬误所在，认为在一定时期经济建设要把优先发展轻工业放在优先地位。（《把发展轻工业放在优先地位》，《人民日报》1979年8月31日）。为了扩大视野，我又对社会主义工业化和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共同点和特点进行了比较研究，对我国社会主义工业现代化的历史经验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分析和总结。这一部分还包括几篇“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论文。

第五部分：技术进步和创新。这一部分的论文分析了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关系，新技术革命的社会经济影响，新兴技术和经济管理的关系，驳斥了“四人帮”否认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谬论。1975年夏秋之际，中国科学院写了一个关于科技工作的《汇报提纲》，提出“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科研要走在前面，推动生产向前发展”。“四人帮”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反对《汇报提纲》的观点，说马克思没有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我写了《科学·技术·生产力》一文，发表在



1977年5月30日《光明日报》上，批驳“四人帮”的谬论。论文论证了马克思早就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并指出：“最新的现代技术”“无一不是自觉运用科学研究成果的产物”，“离开了现代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工农业生产是无法想像的”。此文发表前曾由《光明日报》编辑部送胡耀邦同志审阅修改，发表后胡耀邦同志曾写信鼓励我说：这篇文章可以使许多人打开眼界，明辨是非，吸取力量，“这应该是感到足以对得起党和人民的一件好事情”。我在另一篇文章中还澄清了对知识经济的一些流行的误解。

第六部分：企业管理和企业家的使命。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企业本身只有管理问题而没有经营问题。随着企业改革，国有企业的经营问题就提出来了。1981年我在《重视企业经营的研究》一文中提出了中国企业的经营问题。这一部分还收集了我对企业改革和企业管理的关系、企业民主管理的意义、中国如何实施名牌战略、如何进行企业文化建设、如何学习外国企业管理经验等问题的看法的几篇论文。过去国内长期否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企业家，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开始对这个问题进行探索，这部分也收集了几篇有关的文章。

第七部分：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认识的转变。我国在处理计划和市场的关系上经历过曲折的过程，我自己的思想演变也是如此。这一部分的文章反映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的认识演变过程。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个重大突破，我在《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问题争论的思考》（简称《思考》）中，探讨了“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问题上怎样取得突破，为什么能够取得突破”、“这个问题为什么长期得不到解决，困难在哪里”、“怎样说明社会主义社会商品经济的必然性”等问题。这篇文章是在长期思考的基础上写成的。1979年3月我写了《充分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实现企业管理和发展的“自动化”》，1983年又和吴敬琏同志合作写了《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计划属性和商品经济属性问题》（《工业经济管理丛刊》1983年第9期）、《试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调节方式》（《工业经济管理丛刊》1983年第2期）两篇论文。这三篇文章没有收集在这本文选中，但这些研究也是我撰写《思考》一文的基础。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历史的又一伟大进步。在认识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结合的必然性的同时，也



要认识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是一种矛盾统一关系，正确认识和处理它们的矛盾，使它们更好地结合起来，这是我在这一部分最后一篇文章中强调的问题。

第八部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和规律性。我在1979年写的《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几个问题》中，指出“社会主义经济管理体制的实质是生产关系问题”，“改革社会主义经济管理体制的中心问题是充分发挥企业的主动性”。1981年初在《建立合适的经济形式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要求》一文中，剖析了长期存在的盲目追求一“大”二“公”三“纯”的错误及危害，指出“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多种经营方式存在”“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水平这一客观规律的要求”。1985年的“巴山轮会议”对我国经济改革的理论和实践有重要影响，我参加会议后写了《从巴山轮会议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等论文。在《试论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规律性》一文中，我从历史、理论和实践等方面分析了经济改革的必然性、长期性、艰巨性、阶段性、多样化、规范化以及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相互制约关系等问题，指出“经济改革要以经济理论的发展为先导”。这一部分的有几篇论文中我还研究了如何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非公有制经济是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基础、怎样发挥政府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作用等问题。

第九、十部分：中国企业改革的轨迹与经验。以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界，我把这方面的文章分为上篇（第九部分）和下篇（第十部分）。上篇第一篇文章是由我主笔和几位同志合作的《充分发挥企业的主动性》一文，发表在1978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上。文章指出：发挥企业主动性是一个突出的问题；应当适当扩大企业权力，给企业必要的利益，使全民所有制企业也能自负盈亏。文章还强调要“发扬企业的社会主义民主，保证职工当家作主的权利”。《企业改革和两权分离》是我提交给1988年12月中宣部等单位“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周年理论讨论会”的论文，探讨了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模式和如何充实发展“两权分离”理论等问题。接着我又在《我国国有企业模式的演变》一文中，总结历史经验，提出社会主义国有企业由产品生产者发展为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的五种递进模式。在1992年写的《研究产权问题，发展产权理论》中，我提出要“坚持和



发展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强调“马克思主义是有自己的产权理论的”。下篇的文章主要是探讨国有企业如何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当时理论界曾热烈讨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能否结合的问题，我是主张能够结合的，但结合需要条件，条件之一就是必须进行产权改革。为此我在《关于国有企业产权的几个问题》中提出所有制（不论是公有制还是私有制）也是一种经济手段。这个观点受到许多人的责难，对于有些责难，我在《再论国有企业的产权问题》中作了回答。这场争论也曾引起哲学界的关注。当时有位哲学教授说：“关于所有制是目的还是手段的问题”，“理论界的看法有两种。第一种观点认为，公有制只是一个手段，发展生产力是最终目的。有的同志不太同意这个看法，而持第二种观点。认为公有制不仅是手段，而且即使作为手段，也是不可或缺的一个手段。我倾向于同意第二种观点”。（《党校科研信息》1994年第6期第4页）在此我不想置评这位教授的观点，但至少他的概括忽略了还有第三种基本观点，就是不少人当时是认为公有制只是目的而不是手段。这第三种观点正是一个时期内人们盲目追求的一“大”二“公”三“纯”的重要思想根源，是不应该忽略的。

第十一部分：改革过程中的宏观经济管理。这一部分的文章探讨了如何培养经济管理人才、如何处理搞活企业和宏观经济管理的关系、如何改革计划体制、如何处理基本建设规模、如何学习国外产业政策的经验等问题。1985年上半年由于工业超高速增长，引起学术界的争议，我在《中国工业发展速度》一文中对怎样评价工业发展速度、我国工业高速度发展的可能性和限度、工业发展速度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等问题提出了看法。

第十二部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问题研究。邓小平理论是我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这一部分的头两篇文章《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的指针》和《改革经济体制，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1983年我学习《邓小平文选》的体会。这一部分的其他文章也同学习和实践邓小平的理论有关。近几年我很关心可持续社会主义和不可持续社会主义的问题。社会主义持续发展当然必须处理好人口、资源、环境等问题，但同时甚至更重要的是要处理好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等社会制度问题。所以，社会主义制度也有一个可持续发展的问題。苏联剧变更凸显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意义。我体会，邓小平提



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为了使中国社会主义能够持续发展，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则可以为中国社会主义的可持续发展打下牢固基础。因此，我把近几年写的《可持续的社会主义和不可持续的社会主义》，《再论可持续的社会主义和不可持续的社会主义》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可持续的社会主义打下牢固基础》等几篇文章也收入这一部分。

这个时期我发表的有些文章，曾受到学术界、理论界和社会上的关注，如《科学·技术·生产力》，《认真研究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历史经验》，《政企分开和两权分离》以及未收入这本文选的《社会主义工资和它的具体形式》，《“四人帮”经济思想的封建性》；有些文章的观点曾引起激烈的争论，如“国有企业可以政企分开，应该自负盈亏”，“一定时期要优先发展轻工业”，“经济增长是经济结构变动的基础”，“所有制也是经济手段”，“非公有制经济也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基础”等。不过，很多文章中的观点现在已经是许多人的共识，甚至已经是常识了。这可能同这个时期社会发展快、理论进步快、人们思想认识提高快有关。当然，更同研究起点低以及研究的深度不够有关。

那么为什么还要把这些文章编成集子呢？这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一是论文涉及的许多问题（甚至所有问题）现在都还未完全解决，或者说还仍在解决的过程中，不管我论文中的意见是正确还是不正确，对进一步研究解决这些问题可能有参考的作用。二是由于所处的时代环境，我受传统计划经济理论和实践的影响很深。这一时期我从事经济研究工作，为了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际结合的学风，首先要同自己头脑中的片面或错误的思想观念作斗争，摆脱各种不符合实际的条条框框的束缚，努力“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是一个艰难曲折和痛苦的历程。我们这一代从事经济研究工作的人可能都有这样的经历和感受。这本文选从某些方面反映了我在片面或错误观点中挣扎的情况和力求解放思想的过程，年轻一代经济学家也许可以从中吸取一些教训以便少走弯路。三是我对不少问题的认识有过转变，对有些问题的认识还有反复，甚至同一时期对同类问题的观点也有矛盾，有些研究过的问题，现在仍感迷茫。我已年逾古稀，但在有生之年，在健康允许的情况下，还想做些工作。因此，我很需要对过去的研究成果进行清理和反思，在此基础上继续再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编辑这本文选，使我有机会对过去的部



分成果进行清理。四是把跨越近 20 年的文章收集在一起，也是为了便于查找，便于同行和一切有兴趣于经济问题的同志对我进行批评指教。

“文化大革命”前我主要研究政治经济学和农业经济问题，也发表过一些论文。例如 20 世纪 60 年代我写过关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作用以及农业扩大再生产的文章，还和汪海波同志合作写过有关社会再生产和社会主义级差地租的论文。我们合作的《关于扩大再生产公式的初步探讨》（《光明日报》1961 年 12 月 24 日）曾在当时经济学界引起一场热烈的争论。本书附录中收集了文革前我的部分论文目录。

现在出版学术著作很难，我很感谢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这本文选。我也要感谢工业经济研究所科研处、资料室、办公室的同志，他们为我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很多帮助。我的夫人彭韵倩是我论文的第一读者，对文选的内容编排提供了很多好意见，由于她承担了全部家务劳动，使我有充裕的时间从事研究工作，所以这本文选也是她辛劳的成果。

周叔莲

2005 年春节



目 录

第一部分 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和经验教训

- 认真研究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历史经验 (3)
- 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历史回顾 (8)
- 论我国经济发展“翻两番”的战略目标 (23)
- 战略目标和经济效益 (34)
- 关于经济发展战略的几个问题 (46)
- 战略转变和经济发展
 - 谈谈“六五”时期的经验 (55)
- 我国沿海城市的经济发展战略问题 (73)
- 牢固树立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经济的指导思想 (79)
- 重视城乡经济关系战略问题的研究 (82)
- 地区经济发展战略要把实现“两个转变”作为指导思想 (93)

第二部分 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

- 三十年来我国经济结构的回顾 (103)
- 合理化的经济结构和经济结构的合理化 (130)
- 正确处理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的关系 (144)
- 城市的作用和经济结构的合理化 (162)
- 中国产业结构调整 and 升级的几个问题 (177)
-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和调整经济结构的任务（读书笔记） (204)

第三部分 提高经济效益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 提高经济效果是当务之急 (219)



论经济增长和经济效果的关系	(226)
经济效果问题是经济建设的核心问题	(239)
论国民收入和工农业总产值的同步增长	(246)
再论国民收入和工农业总产值的同步增长	(258)
税利要和生产同步增长	(269)
千方百计提高经济效益	(277)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提高经济效益	(282)
现代经济增长方式的特征和我国转变经济 增长方式的紧迫性	(287)
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条件和困难	(293)
怎样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299)

第四部分 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理论与实践

把发展轻工业放在优先地位	(307)
把重工业搞活 争取一定的发展速度	(312)
调整时期如何把重工业搞活	(317)
正确处理两大部类之间、农轻重之间的关系	(321)
试论我国工业发展的战略目标	(333)
认真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工业现代化的历史经验	(338)
重视社会主义工业化理论问题的研究	(352)
社会主义工业化和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比较研究	(360)
重视城乡工业关系问题的研究	(372)
“十五”时期中国工业发展的特点和方针 ——兼论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	(375)
论工业化与信息化的关系	(386)
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402)
走出振兴老工业基地的新路子	(413)

第五部分 科技进步和创新

科学·技术·生产力

——斥“四人帮”诬蔑攻击《汇报提纲》的谬论	(425)
-----------------------------	-------



引进先进技术和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	(430)
列宁是怎样看待引进新技术的	(437)
设备更新改造和国民经济调整	(441)
技术改造与经济调整	(448)
利用新技术是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重要保证	(453)
试论新技术革命的社会经济影响	(458)
新兴技术和经济管理	(474)
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483)
科技进步和企业改革	(492)
把开发高新技术产业放在重要战略地位上	(504)
对知识经济的几点认识	(516)
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与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524)

第六部分 企业管理和企业家的使命

重视企业经营的研究	(547)
经济改革中的企业管理问题	(555)
深化企业改革, 强化企业管理	(564)
企业民主管理的意义和任务	(573)
实施中国名牌战略的意义和条件	(580)
关于发展名牌产品的几个问题	(587)
企业文化建设的几个问题	(596)
学习外国企业管理经验 提高我国企业管理水平	(600)
美国企业管理的若干特点	(605)
论企业管理在美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613)
中国企业家的历史使命	(624)
社会主义企业家的地位和素质	
——在“90年代企业家素质研讨会”上的发言	(633)
企业家要发扬三种精神	(638)
谈谈我国企业家队伍的建设问题	(643)



第一部分

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 转变和经验教训



认真研究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历史经验*

经济发展战略对于搞好经济管理，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作用。为了制定指导今后经济发展的正确的经济发展战略，一项重要工作是要认真研究过去制定和实行经济发展战略的历史经验。

过去我们不常使用经济发展战略这个概念，有人因此怀疑我国过去有经济发展战略。这种怀疑是不必要的。所谓经济发展战略，简单说就是关于一个较长时期内经济发展所要达到的主要目标和实现这些目标的主要措施的设想。建国以来各个时期的经济发展主要目标和主要措施不仅有设想，而且有些设想已成为党的方针和国家的计划。例如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结束后党就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根据这个总任务，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明确详尽地规定了这一时期的基本任务、具体任务和重要措施，这些任务和措施就体现了“一五”时期的战略目标和战略措施。其他时期的战略目标和战略措施也都有过规定或设想。这些规定和设想很多事后证明是正确的，有些则被证明不完全正确甚至是错误的，但都是值得我们研究的课题。

应该看到，我国在制定和实行经济发展战略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教训。“一五”时期的战略目标和战略措施，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经过周密的调查研究制定出来的，它符合国情，贯彻执行得到了圆满成功。周恩来同志总结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验，曾经指出：“应该根据需求和可能，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的基础上，以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应该使重点建设

* 原载《人民日报》1982年5月24日。



和全面安排相结合，以便国民经济各部门能够按比例发展”。这些是我们当前也应该贯彻的战略思想。按照当时的规定，大概需要三个五年计划来完成过渡时期的总任务，就是说“一五”时期的战略目标和战略措施是应该延续下去的。但是从1958年开始，在战略思想上发生了转变，战略目标和战略措施都犯了错误，例如搞高指标，刮共产风等等，使“二五”时期经济发展受到严重挫折。但是即使在“二五”时期，也提出了不少正确的战略思想，如发展国民经济要以农业为基础，安排计划要以农轻重为序，要先生产后基建、先简单再生产后扩大再生产，应该重视发展商品生产利用价值规律等等。这些重要的战略思想都是这个时期首次提出，对现在也有着指导意义。

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是为了帮助我们懂得今后应该做什么和不应该做什么。为此，我们还要提高对这些经验教训的认识，把它们提高到规律性的高度，找出其内在联系，加深理解。例如，过去30年我们曾多次有过这样的经验教训：当实事求是地确定发展速度时，就能够提高经济效果，当盲目追求高速度时，就会导致经济效果下降。这究竟是什么原因，有没有必然性，还有哪些因素在起作用？我们应该系统地收集历史资料，探索发展速度和经济效果的相互联系，回答这些问题。类似的问题，如发展速度和经济结构的关系，经济结构和经济效果的关系，也要通过总结实践经验给以科学的说明。如果我们在一些重大的战略问题上掌握了规律性，并且学会了根据具体情况运用这些规律的本领，今后制定和实行经济发展战略就可以少犯错误。

现在理论界对一些同制定经济发展战略有关的经济理论问题，如对于优先发展重工业问题，生产和生活的关系问题有不同的认识。总结过去的经验，也有助于比较全面地认识这些问题。例如关于优先发展重工业问题，我们知道，“一五”计划根据当时重工业基础极其薄弱等情况和实现工业化的要求，提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方针，实行的结果是好的。可见那种完全否定优先发展重工业方针和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规律的看法是根据不足的，但是，后来长期片面实行这个方针，又确实带来了种种消极后果，这几年优先发展消费品工业，则起了积极的作用。这又说明，优先发展重工业只能是有条件的，生产资料优先增长也是在一定条件下的规律。我们应该探索重工业和轻工业之间以及它们和其他部门之间的内在联系，既要承认在一定条件下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规



律，又不要把这个规律绝对化。关于生产和生活的关系，我们曾长期犯过片面强调生产忽视人民生活的错误，而这几年一部分人中又存在一种离开生产片面强调改善生活的偏向。经验表明，我们搞经济建设既不能违背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又不能离开实现这个目的的手段来谈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一五”计划规定“在发展生产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逐步地改善劳动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至今看来也是正确的战略思想。

研究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历史，也能帮助我们吧经济发展战略同社会发展战略、科技发展战略较好地结合起来。过去我们在社会发展战略、科技发展战略上也有经验教训。例如对于劳动就业问题，建国初期处理得较好，以后由于种种原因，使得城乡待业人员增加，这几年解决这个问题又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对于人口问题，我们曾长期忽视控制人口，这是一种战略性的错误，后来实行计划生育的人口战略，有些地方已取得了成绩。对于这些社会问题，我们要从战略的角度进行总结。再如20世纪50年代我国曾制定了科学技术12年长期规划，这个规划是和经济建设结合得比较好的，对生产建设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但后来很长一段时期我们对科学技术的作用重视不够，很多技术政策摇摆不定，科学技术工作和经济建设结合得不紧。我们也要对这些科技发展战略问题上的经验教训进行总结。总之，要从历史经验中学习如何使经济、社会、科技发展战略同步配套，形成最大的合力，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发展。

正确的经济发展战略必须适合本国的国情。研究我国的历史经验也能帮助我们认识国情尤其是一些基本国情如何制约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学会从国情出发制定经济发展战略。长期以来对于我国经济发展有两种根本不同的战略思想，一种是“持久战”，一种是“速成论”。这两种战略思想都经过不止一次的实践，证明“持久战”是切合我国国情的，而“速成论”则不符合国情。但是，不能认为“持久战”思想已经在广大干部群众中牢固地树立了。而且，“持久战”也绝不是不要多快好省，我们实行“持久战”的战略正是为了使国民经济发展从长期来看有一个较快的并且经济效益较好的经济发展速度，以便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我们要通过对历史经验和现状的调查研究，为“持久战”战略树立科学的理论依据，并为它的顺利实现奠定思想基础。



为了制定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必须研究和借鉴外国的有关经验。现在已经开展了对世界上一些主要国家经济战略的研究，这方面的工作无疑还要加强。但是，研究和运用外国的经验也有一个和本国情况相结合的问题。研究我国的历史经验，可以帮助我们把外国经验和本国情况结合起来考虑，正确认识国外经验对我国的意义、局限性及如何运用它们。例如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实行出口主导型的发展战略，主要发展出口或以加工出口的外向型工业为主，以此带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取得了一定成效。有人建议我国也采用这种战略。我国发展国民经济无疑应该十分重视进出口贸易和国际交往，坚持对外开放的正确方针。但是，像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大国，不必要也不可能主要依靠出口来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现在还没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说出口主导型的发展战略是适合我国当前国情的。

研究我国经济战略的历史经验还要解决以下几个方法论问题：

1. 如何划分战略阶段。过去 30 多年我国经济发展有过多战略转变，有必要分阶段对发展战略进行分析研究，可以考虑根据战略转变即战略目标和战略措施的区别来划分阶段，把建国以来的历史分为六个战略阶段，即（1）国民经济恢复时期（1949～1952 年）；（2）“一五”时期（1953～1957 年）；（3）“二五”时期（1958～1962 年）；（4）国民经济调整时期（1963～1965 年）；（5）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1976 年）；（6）粉碎“四人帮”以后时期。应该说明，“二五”期间从 1960 年冬就开始改变大跃进时期的发展战略，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但考虑到调整在 1962 年以后才大见成效，同时通常把 1963～1965 年作为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因此我们把“二五”时期作为一个阶段，把 1963～1965 年作为另一个阶段。

2. 如何确定各个战略阶段的战略内容。由于发展战略包括多方面的内容，人们对此还没有统一的认识，加上过去没有明确提出发展战略，这就给确定各个阶段的战略内容带来了困难。作为一种探索，我们考虑可以根据各个阶段提出的方针、路线、纲领、计划以及它们的贯彻执行情况，来确定各个阶段战略目标和战略措施的内容。由于有些时期存在着不同的战略思想及由此出发制定的战略内容和战略措施，因此应该实事求是地确定各个阶段的战略内容，而不能简单化。

3. 如何评价各个阶段的发展战略。发展战略实践的结果



是检验其正确与否和正确程度的客观标准。具体一点说，可以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评价各个阶段的经济发展战略：（1）生产关系的演变；（2）经济效益的状况；（3）经济结构的演变；（4）经济发展速度；（5）人民生活状况。此外还应该考虑战略对社会安定团结、精神文明建设、科学技术发展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影响。我们搞经济建设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因此应该考虑经济发展战略是否导致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巩固和完善，包括是否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否在公有制占优势的条件下发展各种经济成分的积极作用，是否发展商品生产和实行按劳分配，是否完善社会主义经济管理体制。我们在评价经济发展战略时既要重视它对发展生产的影响，又要重视它对提高人民生活的影响，不能片面强调某一个方面。

总结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历史经验是一件困难的工作。建国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经过曲折的过程。经验教训很多，这几年大家进行总结，已经取得了研究成果。但是应该进一步分析研究的课题还是很多的。总结过去经济发展战略的经验不能局限于换一个角度重复一些已有的结论，而应该探索新的领域和新的问题，加深对历史的认识，并使之有助于制定今后的经济发展战略。



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历史回顾*

考察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历史演变，是研究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课题。30多年来，我国在经济发展战略问题上有很多经验教训。为了制定指导今后经济健康发展的、有科学根据的、切实可行的经济发展战略，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是必要的。

这里有几个问题要首先研究解决。一是如何确定各个时期经济发展战略的内容。二是如何划分经济发展战略阶段。三是评价经济发展战略的标准是什么。

关于第一个问题。过去我们虽然没有使用经济发展战略这个概念，但是事实上是有经济发展战略的，各个时期规定的发展经济的基本任务，实际上就是一定战略阶段发展经济的战略目标和战略任务。而为完成这些任务规定的基本措施，也就是这个战略阶段发展经济的措施。党和政府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我们研究过去的经济发展战略提供了可靠的依据。我们根据党和政府的文件（包括计划、决议、条例等）以及各个时期的经济建设实践，是能够正确地确定战略目标和战略措施的。

关于第二个问题。划分战略阶段的基本原则，是根据当时的设想，并把它和实践结合起来。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战略原来规定是要继续到第二个五年计划和第三个五年计划的。但是1958年提出了另一种战略，“大跃进”就是这种战略的实践。因此，从1958年起应该是另一个战略阶段。划分战略阶段也要考虑通常的历史分期。例如，1960年起我国就开始调整生产关系和经济比例，也就是说开始纠正1958年以来的错误的发展战略，直到1963年，调整才有明显的成效。现在通常把1963~1965年称为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因此我们也把第二个五年计划

* 本文是作者在一次学术报告会上的发言，曾载《经济研究资料》1983年第2期。



时期作为一个战略阶段，把1963~1965年作为又一个战略阶段。

根据上述原则和实际情况，30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经历了如下几个战略阶段：（1）国民经济恢复时期（1949~1952年）；（2）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1953~1957年）；（3）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1958~1962年）；（4）国民经济调整时期（1963~1965年）；（5）“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1976年）；（6）粉碎“四人帮”以后的时期。

关于第三个问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一种经济发展战略实践的结果，也是检验这种经济发展战略的客观标准。因此，我们要根据各个时期经济建设的实践来检验经济发展战略是否正确及正确的程度。主要要从以下四个方面来检验：首先要从生产关系的演变来检验。有人忽视生产关系的变化是检验战略的重要方面，这是没有根据的。我们搞经济建设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这就有必要考察发展战略是否带来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巩固和完善，包括是否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否在公有制占优势的条件下发挥各种经济形式的积极作用，是否坚持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按劳分配，是否坚持计划经济，是否完善社会主义经济管理体制。其次，要从生产力的发展来检验，包括产业结构是否合理，比例关系是否协调，经济效果是否提高和提高的程度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情况，等等。有人强调人民生活提高是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却忽视生产力发展同样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要求，这也是不够全面的看法。再次是从人民生活状况来检验。我们反对把生活和生产对立起来的看法，绝不是说不应该把人民生活提高和改善作为检验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标准。最后，还应该从精神文明等方面来检验经济发展战略的正确性。

上面说明可以从路线方针政策中概括出经济发展战略，但它们毕竟又有区别，加上资料不足，研究不够，这种概括可能不很准确甚至很不准确，对经验教训的分析更会有很多错误，这是首先要说明的。

一、“一五”时期的经济发展战略

“一五”时期的经济发展战略就是当时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总任务。1953年8月，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规定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



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个“一化三改”的任务就体现着“一五”时期的经济发展战略。原来规定需要用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完成这个任务，“一五”时期是坚决贯彻这个战略的。

“一五”战略目标的主要内容有：(1) 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使我国逐步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2) 逐步实现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集体农业和集体手工业，把资本主义工商业变为社会主义工商业。(3) 在发展生产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一五”计划中明确规定：五年中职工工资增长 30%，农民购买力增加近一倍。

“一五”战略措施的主要内容是：(1) 优先发展重工业。(2) 注意国民经济平衡发展，一方面优先发展重工业，一方面使农业、轻工业、交通运输业以及商业、文教、科技等事业相应发展。(3) 工业以基本建设为中心。(4) 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切实可行的办法，逐步实行所有制改造，使“一化三改”相互促进。(5) 立足于国内，争取苏联援助。(6) 正确处理建设和生活、积累和消费的关系。

实践证明，“一五”时期的经济发展战略是正确的。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检验。

1. 经济发展速度较快。

工农业总产值和国民收入每年平均增长速度情况如表 1。

表 1

	工农业 总产值	农 业 总产值	工 业 总产值	重工业 总产值	轻工业 总产值	国民 收入
平均每年增长速度 (%)	10.9	4.5	18	25.4	12.9	8.9

2. 经济结构趋于合理。

工农业总产值中，工业比重逐步上升；工业总产值中，重工业总产值逐步上升。虽然农轻重关系上也存在一些问题，但基本趋势是合理的。农轻重产值变动情况如表 2。

表 2

	工农业总产值中 (%)		工业总产值中 (%)	
	农 业	工 业	轻工业	重工业
1952 年	56.9	43.1	64.5	35.5
1957 年	43.3	56.7	55	45



生产关系的变革也比较健康。1957年参加互助合作组织的农户占总农户的比重达97.5%，参加合作化手工业的从业人员占手工业从业人员的90.2%，参加公私合营工业的职工人数已占资本主义工业总数的99.5%，私营商业中已改造部分占从业人员总计的85.5%，其中组织合作商店、小组的占53.9%，私营饮食业中已改造部分占从业人员总计的87.2%，其中组织合作商店、小组的占63.5%。

3. 经济效果比较好。

国营工业企业每百元资金实现的利润税金1952年为25.4元，1957年提高到34.7元；每百元产值实现的利润1952年为14.2元，1957年提高到17.1元；全员劳动生产率1952年为4167元，1957年为6336元。

4. 人民收入增加，生活改善。

全民所有制职工的年平均工资，1952年为446元，1957年为637元。全国居民每人平均消费水平，1952年为76元，1957年为102元。其中，农民1952年为62元，1957年为79元；职工1952年为148元，1957年为245元。

这几年来，对“一五”时期的经济发展战略有些不同看法，值得提出的有这样几个问题。

一个是对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看法。有一种意见完全否认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必要性。这是不正确的。“一五”时期优先发展重工业是正确的。李富春同志在《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中说：“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政策，是使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惟一正确的政策，实行这个政策，将为我国建立社会主义的强大的物质基础。”事实也证明，“一五”时期优先发展重工业效果是好的。以后不顾条件片面地实行这个政策是错误的，但这是另一个问题。

一个是对社会主义改造的看法。有一种意见认为农业合作化没有条件，我们搞的是农业社会主义。这种看法是完全错误的。我们搞社会主义依据的是工业中先进的生产力即大机器工业。国营经济是在没收大垄断资本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社会主义工业化必然要求农业合作化，小农经济从长远来看是没有前途的，所以我们搞社会主义工业化和搞农业合作化是符合经济规律的要求的。至于合作化中的缺点，那不是主流，“一五”时期的合作化运动采取的方法步骤也是有丰富的经验的。当然，现在看来，我国的合作化也未能打破斯大林集体化模式的框框，例



如单一的统一经营、集中劳动和按劳动日分配等等并不成功。

一个是对提高人民生活的看法。有一种意见认为“一五”时期没有把人民需要作为生产的目的，理由是生产增长快，消费增长慢。这种看法也是不正确的。1957年和1952年相比，工农业总产值增长67.8%，其中农业增长24.8%，工业增长128.6%，国民收入增长53%，而全国居民的消费水平增长22.9%。生产增长快于消费增长是正常的，这样才能为进一步扩大再生产打下基础。“一五”时期的积累率为24.2%，其中1952年为21.4%，1957年为24.9%，比旧中国当然高多了，这也是必要的，因为积累是扩大再生产的源泉。所以，“一五”时期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生活，把生产目的和实现目的的手段结合起来考虑，这是正确的。

二、“二五”时期的经济发展战略

“二五”时期本来应当继续实行“一五”时期的经济发展战略，因为“一化三改”的任务原来规定要三个五年计划来完成，但“一五”计划完成后战略就发生了变化。1957年11月莫斯科会议上提出了我国要在15年或者更长一点时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英国，这个口号无可厚非，但是具体工作部署只是考虑超过英国的钢产量2200万吨，后来发展到以钢为纲，形成了一套包括严重错误的经济发展战略。1958年提出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就是这个时期战略的主要内容。

“二五”时期战略目标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1）把经济发展速度放在第一位，尤其是把钢产量放在第一位。（2）生产关系上要求“一大二公”。（3）人民生活摆到了次要地位，忽视了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是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

“二五”时期战略措施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1）大炼钢铁，以钢为纲。1957年生产钢535万吨，1958年原计划620万吨，后来要求达到1070万吨，一年翻番。因此，造成几千万人上山，大炼钢铁。（2）实现人民公社化。扩大基本核算单位，搞食堂化和供给制，取消自留地和集市贸易。（3）搞所谓“积极平衡”，即计划留缺口，违背综



合平衡的要求。(4) 批资产阶级法权, 取消计件工资和奖金。(5) 提高积累率。认为积累率越高越好, 1958 年积累率达 33.9%, 1959 年达 43.8%。(6) 用政治运动的办法搞生产。批“右”倾, 拔白旗, 鼓吹阶级斗争为纲, 搞阶级斗争扩大化。

上述战略实行三年就难以再实行了。因此, 1960 年下半年就开始改变战略。不过这个战略在整个“二五”时期都有影响。实践证明这个战略有严重的错误, 给生产发展和人民生活带来多方面的消极后果。

1. “大跃进”后生产急剧下降。

“二五”时期工农业总产值的变动情况如表 3。

表 3

单位: %

年份	工农业 总产值	农 业 总产值	工 业 总产值	轻工业 总产值	重工业 总产值	国民收入
1958	32.2	2.4	54.8	33.7	78.8	22
1959	19.5	-13.6	36.1	22	48.1	8.2
1960	5.4	-12.6	11.2	-9.8	25.9	-1.4
1961	-30.9	-2.4	-38.2	-21.6	-46.6	-29.7
1962	-10.1	6.2	-16.6	-8.4	-22.6	-6.5
“二五”平均	0.6	-4.3	3.8	1.1	6.6	-3.1

可见, 工业“大跃进”带来整个国民经济的急剧下降, 5 年合计农业是负增长, 工业也发展很慢, 国民收入也是负增长。

2. 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

例如工农业之间的比例严重失调。工农业总产值中农业的比重 1957 年为 43.3%, 1960 年进一步下降为 21.8%; 工业的比重 1957 年为 56.7%, 1960 年进一步增加为 78.2%。又如轻重工业的比例也严重失调。工业总产值中轻工业的比重 1957 年为 55%, 1960 年下降为 33.4%; 重工业的比重 1957 年为 45%, 1960 年为 66.6%。再如积累和消费的比例严重失调。1959 年积累率高达 43.8%, 1961 年被迫下降到 19.2%, 1962 年下降到 10.4%。

3. 经济效果大大下降。

我国每百元积累增加的国民收入, “一五”时期为 35 元, “二五”时期为 1 元。表 4 是国营工业企业经济效果大幅度下降的情况。



表 4

年份	每百元资金实现的 利润和税金 (元)	每百元产值 实现的利润 (元)	全员劳动 生产率 (元/人)
1957	34.7	17.1	6 336
1961	15.9	11.2	4 161
1962	15.1	12.5	4 797

4. 人民生活下降。

人民收入减少，消费品供应紧张，生活发生极大困难。全民所有制职工的年平均工资 1957 年为 637 元，1961 年下降为 537 元，1961 年和 1957 年相比，城乡居民的粮食消费水平下降很多。

值得提出的是，这一阶段（主要是后期）也提出了一些新的有价值的战略思想。主要有：

1. 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一五”时期也重视农业，但是没有明确提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和以农业为基础。

2. 农轻重为序。计划工作要以农轻重为序，即先安排农业，再安排轻工业，再安排重工业。优先发展重工业也要这样安排，这符合生产是为了满足需要的要求。

3. 先生产后基建，先简单再生产后扩大再生产。陈云同志一再强调这一点，这是经验的总结，是符合再生产规律的。

4. 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毛泽东同志提出“价值规律是个大学校”，正确回答了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后要不要利用价值规律的问题。

5. 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这里包含有多种经济形式、多种经营方式的思想。但是这个时期过于追求“一大二公”，同时把所有制划分等级并由上一级管下一级（如由公社所有制管大队所有制、大队所有制管生产队所有制）也是不妥当的。

6. 用经济办法管理经济。刘少奇同志一再提出这一点，例如提出组织托拉斯。这些思想也是可贵的。

三、三年调整时期（1963~1965 年）的经济发展战略

三年调整时期的经济发展战略体现在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



字方针中。提出八字方针有一个过程。1959年冬到1961年春这段时间，李富春同志通过各个典型调查提出要按“调整、巩固、提高”的精神来改进企业管理和工业管理，并向周恩来同志作了汇报。周恩来同志在“提高”之前加了“充实”二字，并且提出作为当时党关于整个国民经济工作的方针。这个提法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批准，正式成为党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1963~1965年继续贯彻这个方针，取得了成效，完成了调整的任务。

这个时期战略目标的主要内容是：（1）调整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即克服严重比例失调现象。（2）调整生产关系，进一步克服共产风、平均主义等现象，使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状况相适应。（3）恢复和发展生产，在此基础上保证人民的最必需的生活水平。在当时条件下，保证人民这样的生活水平也要做出极大努力的。

这个时期战略措施的主要内容：（1）压缩基本建设规模。“大跃进”时期基本建设规模远远超出了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陈云同志曾说：这样的建设规模，不仅在农业遇到灾荒的时候负担不了，即使正常年景，也维持不了。国家的基本建设投资1960年为297亿元，1963年下降为80亿元，1965年恢复到154亿元。（2）减少城市人口，精简职工。陈云同志曾说：这是克服困难的一项根本性措施。无论从当时之计看，还是从长久之计看，都必须如此。几年之内下乡的职工达2000万人。（3）加强农业。包括调整农村生产关系，增加农业劳动力。1957年全国农业劳动者19310万人，1958年减少为15492万人，经过调整，1963年增加到21968万人，1965年增加到23398万人。工农业劳动者比例（以工业劳动者为1），1957年为1:13.8，1958年为1:13.6，1965年恢复到1:12.5。（4）搞好综合平衡。陈云同志强调：计划指标必须可靠，而且必须留有余地，当时提出要搞好财政平衡、物资平衡、信贷平衡，要采取一切办法制止通货膨胀。为此，还加强了国家的集中统一。陈云同志曾提出：物资管理应该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更集中。（5）整顿和调整企业，实行关停并转。全国工业企业数1959年达31.8万个，其中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9.9万个，集体所有制企业21.9万个，1962年分别为19.7万个、5.3万个、14.4万个，1965年分别为15.8万个、4.6万个、11.2万个。（6）尽力保证城市人民的最低生活。如陈云同志提出每人每天供应一两豆子、每人每月有半斤鱼吃，搞点高价糖、高价馆子等。



“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很快取得了成效，证明这个阶段的战略是正确的。

1. 经济恢复和发展的速度比较快。工农业总产值每年平均增长 15.7%，其中：农业总产值 11.1%，工业总产值 17.9%，轻工业总产值 21.2%，重工业总产值 14.9%。国民收入每年平均增长 14.7%。

2. 克服了严重的比例失调，经济结构趋于合理。工农业之间、轻重工业之间、积累消费之间的比例关系都逐步协调起来。主要情况如表 5。

表 5

年份	工农业总产值比重 (%)		轻重工业产值的比重 (%)	
	农 业	工 业	轻工业	重工业
1960	21.8	78.2	33.4	66.6
1963	39.3	60.7	44.8	55.2
1965	37.3	62.7	51.6	48.4

1963 年积累率为 17.5%，1964 年为 22.2%，1965 年为 27.1%。逐步趋于正常和合理。

3. 经济效果显著提高。每百元积累增加的国民收入，1963 ~ 1965 年平均达 57 元。国营工业企业的经济效果提高很快（见表 6）。

表 6

年份	每百元资金实现的 利润和税金 (元)	每百元产值实 现的利润 (元)	全员劳动 生产率 (元/人)
1963	20.5	18.1	6 078
1965	29.8	21.3	8 943

4. 人民收入增加，生活有了改善。全民所有制职工的年平均工资由 1961 年的 537 元增加到 1963 年的 641 元，1965 年的 652 元。农业社员平均每人从基本核算单位分得的收入 1962 年为 46.1 元，1965 年为 52.3 元。居民每人每年消耗的粮食斤数见表 7。

表 7

单位：斤

	全国居民	城镇居民	乡村居民
1963	329	380	319
1965	368	436	354



四、“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经济发展战略

三年调整时期的战略思想本来是应该贯彻执行到“三五”计划时期的。1964年4月拟定的《第三个五年计划初步设想》，根据贯彻八字方针的情况，曾提出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的基本任务是：第一，大力发展农业，基本解决人民的吃穿用问题；第二，适当加强国防建设，努力实现尖端技术；第三，与支援农业和加强国防相适应，加强基础工业，继续提高产品质量，增加产品品种，增加产量，使经济建设进一步建立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相应地发展交通运输业、商业、文化、科学研究事业，使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向前发展。并且提出：“把计划工作也转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经济发展又发生了转变。原来正确的战略思想不仅难以贯彻，而且受到批判。一些错误的东西又盛行起来。更加严重的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了政治斗争，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完全背离了经济建设作为中心任务的要求，有些年甚至没有把经济建设放在重要地位。这个时期的经济发展战略更难概括，这里准备作些尝试。

这一时期战略目标的主要内容可否概括为：（1）主要搞阶级斗争，经济上则要求高速度，尤其是重工业的高速度。（2）生产关系上又追求“一大二公”。（3）把战备放在第一位，加快三线建设。第四个五年计划提出：“集中力量建设大三线战略后方，建立不同水平、各有特点、各自为战、大力协同的经济协作区”。这样做同当时对国际形势的估计有关。国防建设和战备当然重要，但现在看来，当时放在第一位并不妥当。

这一时期的主要战略措施有：

1. 优先发展重工业，以钢为纲。“三五”、“四五”时期重工业投资在基建投资中的比重远远超过“一五”时期，和“二五”时期差不多。冶金工业投资在基本建设投资中的比重也超过“一五”时期。

基本建设投资中农轻重和冶金工业的比重见表8。



表 8

单位：%

	“一五”	“二五”	1963 ~ 1965 年	“三五”	“四五”
农业	7.6	11.4	18.4	11.4	10.3
轻工业	6.8	6.5	4.1	4.7	6.1
重工业	38.7	54.9	48	54.5	52.1
冶金工业	8.5	14.3	8.4	10.8	10.3
黑色冶金工业	5.4	11	4.4	7.7	8.2

2. 加强三线建设。从 1966 年到 1979 年，三线地区基本建设投资额占全国总投资额的比重超过 40%。由于加强三线建设等原因，基本建设又不正常地扩大了。1966 年全国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为 199.42 亿元，1970 年增加到 294.99 亿元，1975 年增加到 391.86 亿元。基建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以及积累率又不正常了（见表 9）。

表 9

年份	基建拨款占财政支出的比重（%）	积累率（%）
“一五”	37.6	24.2
“二五”	46	30.8
1963 ~ 1965 年	30.1	22.7
“三五”	38.7	26.3
“四五”	40.2	33

3. 反对利用外资和引进先进技术。20 世纪 70 年代初曾经引进过一批先进技术装备，以后“四人帮”就攻击什么洋奴哲学、爬行主义。关于利用外资，则更是不允许的事。“四人帮”鼓吹的是一种闭关锁国的战略。

4. 取消自留地、集市贸易，搞“穷过渡”。农村除了试图取消自留地、集市贸易和搞基本核算单位由生产队向大队过渡，还反对多种经营，片面实行以粮为纲。通过学大寨运动，贯彻这些错误的战略措施。

5. 冻结工资。生产发展受阻，人民收入也就难以提高。实行的是冻结工资的方针，全民所有制职工的年平均工资 1965 年为 652 元，1975 年下降为 613 元，还不断批所谓资产阶级法权，实质是反对按劳分配，鼓吹平均主义。

6. 批判唯生产力论，搞阶级斗争为纲。林彪、“四人帮”疯狂破坏



生产建设，不断搞夺权，反对搞生产，反对搞管理，反对提高经济效果。他们还胡说搞了阶级斗争生产就自然而然上去了，诬蔑经营管理是管卡压，攻击“科学是生产力”这一马克思主义原理。

贯彻以上战略的结果是：（1）生产速度下降，到1976年国民收入已经是负增长了（见表10）。

表 10

单位：%

年份	工农业 总产值	农 业 总产值	工 业 总产值	轻工业 产 值	重工业 产 值	国民 收入
“三五”	9.6	3.9	11.7	8.4	14.7	8.3
“四五”	7.8	4	9.1	7.7	10.2	5.5
其中：						
1974	1.4	4.2	0.3	2.7	-1.6	1.1
1976	1.7	2.5	1.3	2.4	0.5	-2.7

（2）国民经济比例又进一步严重失调。合理的经济结构又受到破坏，工农业、轻重工业的比例关系、积累消费的比例关系又严重失调（见表11）。

表 11

年份	工农业总产值中（%）		工业总产值中（%）	
	农 业	工 业	轻工业	重工业
1965	37.3	62.7	51.6	48.4
1975	30.7	69.9	44.1	55.9

（3）经济效果严重下降。全国每百元积累增加的国民收入，“三五”时期为26元，“四五”时期为15元。“四五”时期不到“一五”的一半，就是说要用一倍以上的积累才能增加同样数量的国民收入。国营工业企业的经济效果变动情况见表12。

表 12

年份	每百元资金实现的利润税收（元）	每百元产值实现的利润（元）
1966	34.5	21.9
1975	22.7	14.2
1976	19.3	12.6

（4）职工实际工资下降，农民收入增加不多，人民生活有很多困难。这个时期全民所有制职工的货币工资和实际工资都是减少的。每个



职工的年平均货币工资由 1966 年的 636 元下降为 1975 年的 613 元，实际工资由 535 元降为 508 元，如果以 1952 年的平均实际工资为 100，1957 年为 130.3，1966 年为 120，1975 年为 113.9。平均每个农民收入的变动情况如表 13。

表 13

单位：元

年份	平均每个农民全年 纯收入	其 中		
		从集体得到的	家庭副业生产的	其 他
1965	107.20	63.17	33.24	10.74
1976	113.05	78.35	26.23	8.47

可见，11 年内平均每个农民每年增加收入不到 1 元。总的来说，“文化大革命”十年中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失误严重，我国目前经济中的很多困难的根源就在这里。

五、粉碎“四人帮”以后的经济发展战略

粉碎“四人帮”后，我国经济发展战略又发生了转折，应该说，从此以后，我国才又具备条件制定和贯彻科学的切实可行的经济发展战略。

概括粉碎“四人帮”以后的经济发展战略也有困难。第一，粉碎“四人帮”后一段时间里，原来的经济发展战略还有相当大的影响。第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提出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这是新的战略决策。但实现调整的任务还要用几年时间，实现改革的任务所需时间更长。据估计，“六五”时期才能基本完成调整任务，“七五”时期才能基本完成改革任务。第三，过去的战略时期有的是三年，有的是五年，“文化大革命”时期是十年，也并非都是事先确定的。而且作为一个完整的战略时期，应该包括比较长的时间，这样，经济建设的规划才不至于受到时间过短的局限。自从邓小平同志提出 2000 年我国要达到小康水平后，普遍认为应该把从目前到 2000 年作为一个战略阶段，研究应该达到的目标和需要采取的措施。根据以上情况，从粉碎“四人帮”到现在可以说是一个战略转变的过渡阶段，即一方面总结过去的战略，肯定正确的东西，清算错误的东西；另一方面



制定今后的战略，酝酿新的战略思想，确定今后二十年的战略目标和战略措施。因此，这几年也许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战略阶段。

不过，回顾总结一下这几年经济发展战略思想的演变还是必要的。

粉碎“四人帮”后，党领导全国人民对他们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罪行进行了批判，但是，错误的经济发展战略不是立刻得到纠正的，提交给1978年2月召开的五届人大一次会议的十年规划，提出1985年粮食产量达到8000亿斤，钢产量达到6000万吨，要求建设十个钢铁基地，十个大油气田，就反映了继续盲目追求高指标的错误战略思想。

1978年实行这种错误的战略，加剧了原先已经存在的国民经济比例失调。例如1978年基本建设投资480亿元，其中国家投资396亿元，比1975年增加102亿元。1978年积累率达到36.5%，超过“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积累率。进口钢材800多万吨，仍然感到供不应求。这次冒进，增加了经济建设中的困难。

党及时发现和纠正了这一错误。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克服比例失调的任务。1979年党中央和国务院提出“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调整”就是调整经济结构和比例关系，“改革”就是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由于原来我国经济结构和经济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比较多和比较复杂，完成这些任务需要很长时间。但是四年来贯彻八字方针已取得了明显成效。主要的成绩有：（1）工农业的比例关系基本趋于协调。尤其是经济作物增长较快，有利于轻工业的发展。（2）轻重工业的比例关系基本趋于协调。1981年轻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已超过重工业产值，占51.5%。（3）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基本趋于协调。积累率已降到30%以下。（4）市场供应情况大为好转。有些商品已由卖方市场改变为买方市场。（5）基本建设规模得到了控制，非生产性建设投资的比重增加了。1981年全民所有制单位的建设投资比上年减少20.6%，非生产性建设投资的比重由上年的33.7%上升到41.1%，其中住宅投资的比重由20%上升到25.5%。（6）地方和企业有了一定的自主权，国民经济开始搞活起来。（7）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利用外资也取得了一定成绩。（8）人民收入增加较多，生活有了改善。虽然，现在经济中还存在很多问题，还有相当大的困难，但是以上成绩说明“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方针的战略思想是正确的。



五届人大四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我国要“围绕着提高经济效益走出一条经济建设的新路子”，同时提出了十条方针。在新路子和十条方针中，既包含了过去行之有效的战略思想，又包含着很多新的科学的战略思想。包含哪些过去行之有效的战略呢？例如：（1）坚持社会主义方向；（2）坚持计划经济；（3）自力更生为主；（4）正确处理农轻重关系；（5）正确处理生产和生活、积累和消费的关系；等等。包含哪些新的战略思想呢？例如：（1）把经济效益放在第一位；（2）重视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重视科学技术的作用，走内含扩大再生产为主要的道路；（3）不再片面优先发展重工业，而要建立起适合我国国情的经济结构；（4）实行以扩大企业自主权为中心的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5）对外开放，对内搞活；（6）把一切为人民作为经济建设的出发点。这些都已为党的十二大所肯定和发展。胡耀邦同志在党的十二大所作的报告中，提出了今后20年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战略步骤和战略重点，将保证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地健康地迅速地发展。

最后，对于30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战略作个小结。第一，30多年来我国经济战略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经验教训是很多的，只要善于吸取经验教训，我们就一定能够顺利实现党的十二大提出的正确的经济发展战略，实现光明的前景。对此，应有充分的信心。第二，30多年来对于我国经济发展有两种根本不同的战略思想。一种是“持久战”，一种是“速成论”。它们的分歧不在于要不要“快”，要不要“高速度”，而在于是否实事求是。它们几经较量，最终证明“持久战”战略是正确的，“速成论”战略是不正确的。第三，30多年来的经验还有待很好总结，很多问题还需要认真研究，如战略时期的分期和各个战略时期战略的内容，如何评价各个时期的战略，以及“持久战”、“速成论”战略的特点等等，都需要进行研究。



论我国经济发展“翻两番”的战略目标*

党的十二大报告中指出：“从1981年到本世纪末的20年，我国经济建设总的奋斗目标是，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实现这个宏伟的奋斗目标，是历史赋予全党全国人民的重任，是极其光荣艰巨的任务。

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重大意义

实事求是地制定今后20年的奋斗目标是非常必要的，是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要求。

我国人民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是，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生产力比较落后的国家里，全面完成四个现代化的任务是十分艰巨的，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因此，必须分阶段提出有科学根据的奋斗目标。过去我们在年度计划中规定了每年的奋斗目标，在5年计划中规定了5年的奋斗目标，这都是必要的，但是还不够。例如，为了解决经济结构合理化的任务，按照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建立合理的经济结构和协调的比例关系，就需要制定长期规划和长远奋斗目标。为了建设现代化农业，做到合理种植和维护生态平衡，以5年为期是不够的，需要10年、20年甚至更长时期的规划。为了建设现代化工业，包括解决当前比较突出的能源、交通运输等问题，

* 原载《经济研究》1983年第1期。



也需要较长时期的建设规划。过去我们基本建设工作的一个重要缺点是缺少长期规划和目标，因而不能保持建设的连续性和重要项目的同步配套，以致造成盲目重复建设，并导致建设周期长和投资效果下降。现在，党中央经过充分的调查研究，提出20年内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的战略目标，意味着我国将制定科学的长期建设计划，更好地指导现代化建设事业。

提出20年奋斗目标之所以必要，最主要的是由于科学技术进步对国民经济发展有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实现现代化就是在国民经济中运用现代科学技术。依靠科学技术，我们才能不断提高经济效益和加快经济发展速度，才能使人民生活不断得到改善。而一般来说，从科学思想的提出到在生产中采用科学成果，需要一定的周期。现在我们有条件在较短时期内从国外引进一些先进技术，但把这些引进的先进技术和本国具体情况相结合，使之在较大的范围内生根和开花结果，对国民经济现代化发生较大的作用，也需要有一个过程。我们必须预测一个较长时期内科学技术发展的前景及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根据科学技术发展的前景来制定经济建设计划，为此，也必须有一个长远的战略目标。

提出20年奋斗目标也有利于正确处理生产和生活、积累和消费的关系。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是满足人民的需要，我国人民生活水平还比较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是极其重要和迫切的任务。而发展生产则是提高人民生活的基础。我们必须贯彻陈云同志提出的“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的方针，处理好生产和生活、积累和消费的关系。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为正确处理这些关系提供了有利条件，我们要在年度计划和5年计划中对这些关系做出妥善的安排，但这还不够，还要求有更长时期的规划。根据以往的经验，处理好这些关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由于生产和生活、积累和消费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矛盾，逐一解决这些矛盾要求有更长的时间来进行统筹安排。党中央提出的宏伟战略目标，不仅使全国人民认清了幸福生活的美好前景，极大地鼓舞了大家的斗志和积极性，而且为正确处理生产和生活、积累和消费的关系提供了明确的方向和科学的依据。

工农业总产值增长速度是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个综合指标，它的变动是很多因素共同发生作用的结果，同时又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多方面的影响。我国实现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目标，意味着在现代化过程中跨



进了一大步，发生了多方面的重要变化。

第一，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国防实力将有很大的增长。伴随着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国民收入也将有较快的增长。翻两番要以不断提高经济效益为前提，要求缩小工农业总产值和国民收入两者增长速度的差距，使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接近工农业增长的速度。今后 20 年要求工农业总产值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 7.2%，如果我们努力提高经济效益，国民收入可以和工农业总产值同步增长。按照保守一点的估计，国民收入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也可以达到 6.5%。我国 1980 年国民收入总额为 3 667 亿元，如果每年增长 6.5%，2000 年国民收入总额将增加到 13 000 亿元，为 1980 年的 3.5 倍。国民收入达到这个增长速度是相当艰巨的，但又是可能的。1952 年以来，我国国民收入增长速度超过 6.5% 的有 17 年，国民收入增长速度超过工农业总产值增长速度和低于工农业总产值增长速度但差距不超过 1% 的有 9 年。到 2000 年时，估计我国能源总量、钢、水泥、化肥、棉纱、纸等工业产品将比 1980 年增长 1 倍，机械工业的主要产品将增长 3~4 倍，发电量将与工业生产增长速度同步增长，有些工业品将增长更多。目前我国有些农产品产量已进入世界前列，如粮食占世界第二位，肉类占第三位，今后 20 年也将有很大的增长。

第二，国民经济的现代化水平将有很大的提高。现在我国工业生产技术大体上相当于经济发达国家 20 世纪 50 年代末或 60 年代初期的水平。到 20 世纪末，我国工业交通的主要领域将实现初步的现代化，生产技术多数达到经济发达国家 80 年代的水平，少数接近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我国农业现代化也会有相当的发展。那时候，虽然手工操作和手工业还将保持一定的比重，但是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我们将建立起适应现代化技术基础的经济结构，逐步实现产业结构的现代化。一些新兴的工业部门，如电子、信息、核能、石油化工、新型材料等等，将得到迅速的发展，成为推动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

第三，人民的收入将有较大幅度的增加。党的十二大报告中说，实现了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目标，城乡人民的收入将成倍增长。这也是有科学根据的论断。1980 年我国按人口平均的国民收入为 375 元，如果 2000 年国民收入总额达到上述估计的 13 000 亿元，按当时有 12 亿人口计算，每人平均的国民收入为 1 083.3 元，为 1980 年的 2.9 倍。1980



年我国城乡居民平均消费水平为 227 元，如果 2000 年时增长 1 倍，则为 454 元，按 12 亿人口计，居民消费总额为 5 448 亿元。设想当时社会消费占消费基金的比例由 1980 年的 12% 提高为 15%，2000 年消费基金总额约为 6 400 亿元，不到当时国民收入的 50%。就是说，今后 20 年如果实现了工农业总产值增长 3 倍和国民收入增长 2.5 倍多，居民消费水平有可能增加 1 倍以上。究竟可以增加多少呢？我们经过试算，初步结果是，城乡居民平均消费水平可望由 1980 年的 227 元增加到 2000 年的 600 元以上，增长 1.5 倍以上，每年大约递增 5%。乡村居民的消费水平可以比城市居民的消费水平增长得稍快一点，积累和消费可以保持合理的比例关系。

第四，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将达到小康水平。达到以上生产和收入水平，我国城乡人民普遍可以过一种小康的生活。什么是小康水平？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理论和实际问题。我认为，20 世纪末我国可以达到的小康生活将有如下一些主要特征：（1）不仅能吃饱，而且能吃得好一点，营养比较全面，可以满足合理的生理需要和健康需要。（2）穿着也比较好，可以做到四季衣着基本齐全。（3）住宅紧张的状况基本克服，城市居民人均居住面积可望达到 8 平方米左右，农村居民人均住宅面积可以更多一点。（4）经济比较宽裕，有条件购置必要的耐用消费品和参加文化娱乐活动。（5）疾病得到及时治疗，平均寿命进一步提高。（6）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水平有显著提高。（7）城乡公共设施包括供水、供电和交通邮电设施有较大改进，生活环境有明显改善。（8）共产主义思想道德有较大提高。尽管当时我国按人口平均的国民收入和经济发达国家相比还比较低，但这毕竟是一种相当幸福的生活了。这种幸福生活是我国人民千百年来梦寐以求的愿望，它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实现，而且将在 20 世纪末实现。我们绝不能把它的意义估计低了。

不断提高经济效益是翻两番的前提和关键

党的十二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不断提高经济效益是 20 年内全国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前提，这一点是极为重要的，是建国 30 多年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我们在实现战略目标的过程中，



应该认真注意这个问题。

过去我国的工农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总的来说是比较快的，但是在一段长时期内不重视提高经济效益，因而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后果。一是速度波动大，有时甚至是负增长。速度下降既是经济效益差的表现，也是它的必然结果。二是人民得不到应有的实惠。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以后，到粉碎“四人帮”为止的近20年内，我国人民收入增加得很少，生活改善得很慢，这固然是由于指导思想上忽视了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不重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同时也是由于经济效益差，客观上不具备较快地增加人民收入、改善人民生活条件。

我们过去忽视提高经济效益是有深刻的原因的。一个长时期内存在着盲目追求速度的“左”倾指导思想，在确定发展速度时不认真考虑客观条件和综合平衡，认为速度越快越好，而把经济效益看成是不重要的。与这种指导思想相适应，还有一套鼓吹盲目追求高速度的“理论”，例如认为比例应该服从速度，主张所谓的“积极平衡”即按长线搞平衡，鼓吹“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等等。我们知道，20世纪50、60年代以来世界上很多国家采取的“传统的发展战略”，是单纯以国民生产总值作为目标的，认为只要有国民生产总值的高速增长，其他问题如分配问题、就业问题、人民生活问题就能得到解决。事实证明这种发展战略有很大的缺陷。过去我们盲目追求高速度，和这种“传统的发展战略”思想不是没有联系的。同时，忽视提高经济效益也同我国经济管理体制上的缺陷有关。由于长时期来我国经济管理体制过分集中，企业缺乏必要的相对独立性，企业和职工的利益同经营成果没有紧密的联系，因而不能促使企业和职工努力提高经济效益。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认真清理了“左”的指导思想，日益重视经济效益问题，国务院领导同志在五届人大四次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今后，我们考虑一切经济问题，必须把根本出发点放在提高经济效益上”；要“围绕着提高经济效益，走出一条经济建设的新路子”。党的十二大提出了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奋斗目标，同时把不断提高经济效益作为前提，这就既肯定了生产建设速度问题的重要意义，又同过去盲目追求高速度的“左”倾指导思想严格地划清了界限，从而为正确处理增长速度和经济效益的关系规定了明确的准则。

当前强调提高经济效益是非常必要的。这不仅是因为现在经济效益



还比较差，而且是因为有些人对经济效益还不够重视甚至很不重视，还存在着盲目追求速度的现象。有些同志仍旧只是热心于追求速度，而不注意增加品种、提高质量和使产品适销对路，不注意节约消耗和降低成本，不注意改进经营管理和提高科学技术水平，从而导致成本增加、利润减少、产品积压、财政减收等后果。应该看到，现在还存在着一些导致盲目追求速度忽视经济效益的因素。例如有些人还弄不清经济效益和增长速度的关系，不认识提高经济效益的重大意义；经济部门和企业的经济责任制还不够健全，经济管理体制中不利于正确处理速度和效益关系的因素还没有完全消除，等等。这些都是需要设法逐步加以解决的问题。

党中央明确地把提高经济效益作为翻两番的前提，也是启示我们，只有不断提高经济效益，才能保证 20 年内翻两番。就是说，我们必须向经济效益要速度，通过提高经济效益来达到翻两番的目标，这是惟一正确可行的道路。如果说，在过去的有些时期里，虽然经济效益不好，我们还可以维持一定的速度，那么，在今后 20 年内，如果不努力提高经济效益，力争有较好的经济效益，我国国民经济就不可能实现较高的发展速度，不可能达到翻两番的要求。提高经济效益也是实现翻两番的关键。

第一，提高经济效益才能解决能源问题。能源紧张是目前制约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也是今后相当长时期内制约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过去 30 多年我国能源弹性系数平均在 1 以上。今后假定以 1 计算，到 2000 年时能源生产总量也需要翻两番，需要达到 24 亿吨标准煤。显然，要求那时生产这么多能源，在资金、技术上都会有难以克服的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应该怎样解决能源问题呢？就是要在努力增加能源生产的同时，提高能源利用的经济效益。如果经过努力，到 2000 年时工农业产品的单位能耗平均比现在降低一半，能源弹性系数降低为 0.5，这样，在能源生产总量翻一番的条件下，工农业总产值就可以翻两番。我国今后 20 年使能源生产总量翻一番是可以的。可见，解决能源问题必须不断提高经济效益。

第二，提高经济效益才能解决资金问题。资金短缺是目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我们也只有不断提高经济效益，才能解决翻两番所需要的资金。一方面，提高经济效益可以增加



资金积累。例如 1981 年我国全民所有制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共有资金 3 800 多亿元，每百元资金实现的利润税金为 23.8 元，如果提高到历史较好水平即 1957 年的 34.7 元，则可以多为国家提供 400 亿元收入。另外，提高经济效益可以减少资金需要。例如每增加 1 亿元国民收入，“一五”时期需要的投资（包括基本建设和挖潜等新的投资）为 1.68 亿元，“四五”时期提高到 3.76 亿元，增加 1 倍以上。根据前述估计，2000 年国民收入总额为 13 000 亿元，比 1980 年增加 9 333 亿元，按“四五”时期的投资系数计算，需要投资 35 000 多亿元，按“一五”时期的投资系数计算，需要投资 15 000 多亿元，前者比后者要增加投资约 20 000 亿元。如果不努力提高经济效益，翻两番的资金问题也难以解决。

第三，提高经济效益才能保持工农业生产和整个国民经济有持续的稳定的较高速度。20 年翻两番要求平均每年增长 7.2%。从当前情况看，前 10 年增长速度不可能很高，但也要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七五”期间的速度要比“六五”期间高一点，后 10 年进入新的经济振兴时期，则可能有比较高的增长速度。如果前 10 年每年平均增长 5% 至 6%，则后 10 年要求达到 8% 至 9% 的速度，才能在 20 年内翻两番。从过去经验看，增长速度大起大落会给总的增长速度带来消极影响，是不利于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怎样才能保证国民经济有持续的、稳定的、较高的增长速度呢？这就要求不断提高经济效益。提高经济效益不仅有利于解决能源问题、资金问题，而且意味着经济结构的合理化和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保持协调的比例关系，意味着重视技术改造和主要依靠内涵的扩大再生产来发展国民经济。不断提高经济效益，才能促进新的经济振兴时期的到来，并保证它长期持续下去。

第四，提高经济效益才能使人民真正得到实惠，较快地改善生活。从价值形态看，提高经济效益意味着更多地增加国民收入，国民收入增加了，就有利于正确处理积累和消费的关系，在保证必要的积累的同时较多地增加消费基金。在工农业总产值发展速度既定的情况下，如果经济效益提高得快，国民收入增加得更多些，积累和消费就可相应地都增加一点。从实物形态看，提高经济效益意味着生产更多适销对路、价廉物美、丰富多彩的产品，来满足人民的消费需要。



宏伟的战略目标一定能够实现

党中央提出的今后 20 年经济发展的目标既是宏伟的，又是完全具备条件因而是可以实现的。为什么说可以实现呢？

首先，从建国以来的历史看。从 1950 年到 1981 年我国工农业总产值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 9.2%。除去发展速度特别快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1953 年至 1981 年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 8.1%。以上速度都高于今后要求的 7.2% 的平均增长速度。“一五”时期以来，除了“二五”时期以外，工农业总产值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也都超过 7.2%，进行“文化大革命”的“三五”、“四五”时期，虽然经过折腾，工农业总产值也分别达到 9.6% 和 7.8% 的增长速度。这里有一些“水分”。为了避免盲目追求速度的错误，避免增长速度中有“水分”，党中央经过了详尽的调查研究，在科学预测的基础上，确定今后 20 年工农业总产值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 7.2%。

我们应当看到当前发展国民经济的有利条件。就政治思想条件来说，我们已经有了一个能够长期持续下去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经济建设已真正成为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经济工作已有了正确的指导思想和一系列符合实际情况的方针政策。就物质条件来说，和过去相比，我国的物质技术基础大大加强了，科学技术队伍也扩大了。充分利用这些条件，必将推动生产建设事业健康迅速地发展。

有一种看法，认为基数大了增长速度就一定要降低，因而怀疑今后 20 年翻两番的可能性。这种看法是缺乏充分根据的。诚然，生产基数对增长速度是会有影响的。斯大林曾说：“在研究产值增长速度时不能只限于考察增长的总的百分数，还必须知道每增长 1% 所包含的内容和全年产值增长的总数。”^① 基数大了，同样的增长速度，增长的绝对量也大了，在技术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需要追加的资金和劳动力的绝对量相应地也大了，对资源的需求相应地也大了，这在某种情况下会使增长速度受到更多的限制。但是，绝不能说基数大了增长速度就一定要降

^① 《斯大林全集》第 13 卷，第 171 页。



低。因为，增长速度决定于多种因素，而不是只受基数的影响。即使就基数的影响而言，基数大也意味着物质基础加强了，国民收入增多了，这些方面会给增长速度带来有利的影响。这里的关键问题是怎样实现扩大再生产。如果单纯或主要采用外延的形式，即扩大再生产主要依靠在原来技术基础上增加新的生产能力，那么，基数到了一定水平，发展速度是会下降的。而如果主要采用内涵的形式，即扩大再生产主要依靠发展和应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则基数大了，发展速度不仅不会下降，而且在具备条件时有可能提高更多。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很多国家的工业增长速度大大快于战前时期。例如 1871 ~ 1913 年、1914 ~ 1949 年、1950 ~ 1976 年三个时期，日本工业的年平均增长速度分别为 9.2%、4.8%、14.1%；英国分别为 1.5%、1.5%、3.1%；联邦德国分别为 3.9%、2.1%、7.6%；法国分别为 2.2%、0.4%、6.1%。这些国家虽然生产基数大了，但一定时期内速度还是加快了，它们的经济增长速度所以能加快，一个重要原因是科学技术发展了。我国今后主要依靠科学技术、依靠内涵的扩大再生产来发展经济，因此没有理由说速度会越来越低。还应看到，和过去相比，我国工农业生产的基数是大了，但如果把按人口平均的产值产量和其他很多国家相比，我国的基数不仅不算高，而且是比较低甚至是很低的。据世界银行《1982 年度世界发展报告》，1980 年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 290 美元，所有发展中国家平均为 730 美元，全世界平均为 2 510 美元。所以，认为目前我国生产基数高了因而难以实现翻两番的目标，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

其次，从外国经济发展的经验看。一些资本主义国家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经济实际的年平均增长率是：美国 1950 ~ 1978 年为 3.7%，日本 1953 ~ 1978 年为 8.3%，联邦德国 1954 ~ 1978 年为 4.7%，法国 1951 ~ 1978 年为 4.9%，英国 1950 ~ 1978 年为 2.6%，意大利 1961 ~ 1978 年为 4.3%。以上增长率的口径和我国工农业总产值增长率不同，但也可以看出我国今后 20 年的计划增长速度虽然高于以上很多国家的增长速度，但是还低于日本的增长速度。可见我国计划增长速度虽然是先进的，但是在国际上不是没有先例的。战后日本经济增长率高自有其原因，但也要看到，我国和日本相比存在着不少有利条件。例如，我国自然资源丰富，不像日本主要矿产资源大都依赖国外。再如，我国社会主



义制度有巨大的优越性，消灭了剥削关系和阶级对立，有利于调动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又如，我国有广阔的国内市场，这是任何资本主义国家所不能比拟的。考虑到以上情况，我们有理由说，今后的计划增长速度是完全可以达到的。

人们通常说技术改造和经营管理是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两个轮子，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战后日本利用国内外技术上的差距，积极引进先进技术，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现在我国坚持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也在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加快科学技术的发展。我们争取用 20 年的时间赶上经济发达国家过去 20 年达到的水平，是应当也是可能做到的。战后日本也积极引进国外的先进管理经验，建立适合本国情况的经营管理制度和方法，这也是生产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目前我国经营管理水平还不高，但通过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和整顿企业，通过加强经济科学和管理科学的研究和应用，经济管理水平也会逐步提高起来。因此，技术改造和经营管理也将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再次，从提高经济效益的潜力看。翻两番是否可能，还要看提高经济效益的可能性和潜力。我国提高经济效益的潜力很大。以能源的使用来说，1980 年我国一次能源总产量居世界第四，而国民生产总值约居世界第八，每吨标准煤提供的国民生产总值，仅及日本的 1/4。如果把单位产值的能耗降低一半，即使能源不增加，总产值也可以成倍增加。以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的使用来说，全民所有制独立核算工业企业 1981 年每百元固定资产（原值）实现的产值为 96 元，历史较好水平的 1956 年则为 151 元，如果恢复到 1956 年水平，工业依靠现有的固定资产就可以增加产值一半以上；1981 年每百元产值占用的流动资金为 30.2 元，历史较好水平的 1956 年则为 17 元，如果恢复到 1956 年水平，工业企业可以节省 40% 以上的流动资金。其他如缩短建设周期、提高投资效果等方面也都有很大潜力。

经过这几年的努力，已经扭转了经济效益下降的趋势，出现了经济效益提高的好势头。一是农业经济效益显著提高。从 1979 年至 1981 年，全国平均每个农业劳动力生产的农业总产量增长 12.9%，平均每年递增 4.1%，增长速度不仅超过前几年，而且也高于“一五”时期每年递增 3.3% 的水平。二是能源利用效果有所改善。1981 年和 1978 年相比，能源消耗总量增长 4.5%，而国民收入按可比价格计算增长



15.9%。三是工业的经济效果也有提高。每亿元工业产值消耗的能源由1980年的8.15万吨减少为1981年的7.62万吨；重点企业78项主要产品质量指标中，1981年比1978年提高的有67项，占86%；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的流动资金周转次数由1978年的2.94次提高为1981年的3.18次。基本建设的经济效果也有改善。虽然现在我国的经济效果还很不理想，但是只要继续努力，是会不断提高的。

最后，从克服困难的可能性看。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必然会遇到许多严重困难。但是，这些困难经过努力是可以克服的。例如，农业问题可以靠政策和科学等办法来解决，能源紧张可以靠加强能源开发和节约能源来解决，交通运输紧张可以靠加强交通建设来解决，教育科学落后可以靠发展教育科学事业来解决，等等。我们对待经济建设中的困难要有正确的态度。轻视困难是错误的，“速胜论”就是犯了低估和轻视困难的错误。害怕困难也是错误的，“悲观论”就是犯了夸大和害怕困难的错误，我们今后要避免犯这两种错误。

党中央全面分析了我国的经济情况和发展趋势，在提出战略目标的同时，还规定了实现战略目标的战略重点和战略步骤，提出了要特别注意解决的几个重要原则问题。党中央对于实现翻两番中可能遇到的困难作了认真考虑和周密安排，通过调查研究提出了克服困难的正确方针政策和办法。这也表明，实现这个宏伟战略目标是完全可能的。



战略目标和经济效益*

党的十二大报告中，提出了今后 20 年我国经济建设的战略目标、战略重点和战略步骤。这个战略部署符合我国实际情况，反映了全国人民的意愿，必将鼓舞广大群众，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而努力奋斗。

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

为了实现宏伟的战略目标，必须正确处理经济效益和发展速度的关系。党的十二大报告中说：“从 1981 年到本世纪末的 20 年，我国经济建设总的目标是，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把不断提高经济效益和实现翻两番作为战略目标的内容，并把前者作为后者的前提，这是对于我国经济建设经验的科学总结，是处理经济效益和发展速度关系的准则，对今后工作有着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

我国“一五”时期的经验表明，有了较好的经济效益，才能有持续的较快的经济发展速度，才能使人民从经济增长中得到实惠。“一五”计划要求 5 年内工农业总产值增长 51.1%，即平均每年递增 8.6%，其中工业总产值每年平均递增 14.7%，手工业生产总产值每年平均递增 9.9%，农业总产值每年平均递增 4.3%。这个计划是超额完成的，执行结果，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 10.9%，其中工业总产值（包括手工业）为 18%，农业总产值为 4.5%。“一五”计划规定的生

* 原载《中国经济问题》1983 年第 1 期。



产速度所以能顺利实现，是同经济效益不断提高分不开的。“一五”期间，国民收入平均每年递增 8.9%，而且是逐年持续增长，和上年相比，1953 年国民收入增长 14%，1954 年增长 5.8%，1955 年增长 6.4%，1956 年增长 14.1%，1957 年增长 4.5%。“一五”期间基本建设投资总额达 549.96 亿元，每年平均增长 26%，没有国民收入较快的增长，是不可能进行这么大规模的基本建设的。“一五”时期的投资效果也较好，每百元固定资产投资新增国民收入 58 元，比“五五”时期的 34 元增加 70%。“一五”期间全民所有制工业每百元固定资产原值实现的产值都在 130 元以上，而“五五”期间只有 100 元左右。由于经济效益好，“一五”在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同时，人民生活也有了明显的改善。

“二五”时期从反面说明了经济效益对发展速度的制约作用。由于“大跃进”时期盲目追求高速度，忽视经济效益，短时期内工业发展速度虽然加快了，但经济效益大大下降了。例如 1958 年农业部门创造的国民收入几乎没有增加，1959、1960 年还大幅度下降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的全员劳动生产率，1958 年下降 8.5%，1959 年又下降 7.5%。虽然 1958~1960 年积累率高达 30% 以上甚至 40% 以上，但由于积累效果下降，1959 年每百元积累增加国民收入 19 元，不到“一五”时期平均 35 元的 60%。因此，国民收入从 1960 年到 1962 年连续 3 年下降，1961、1962 年财政收入也大幅度下降。1961 年被迫大幅度压缩基本建设，国家基建投资 1961 年比 1960 年减少 2/3 以上，1962 年又减少 1/2。这样 1961、1962 年工业总产值和工农业总产值也大幅度下降了。“二五”时期每年平均工农业总产值仅增加 0.6%，其中农业每年平均下降 4.3%，工业平均每年增长 3.8%。1962 年全国居民平均消费水平比 1957 年下降很多，还稍低于 1952 年的水平。这就是说，如果忽视经济效益，即使有短时期的高速度，也难以持续下来，甚至会导致生产下降，人民也得不到实惠。

我国其他时期也有类似的经验教训，说明只有处理好经济效益和发展速度的关系，才能保证国民经济健康迅速地发展。值得指出的是，我们必须十分自觉地注意这个问题，才能把它解决好。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在工业、农业、运输、商业等章中分别提出了它们各自须注意的经济效益问题，除此之外，还专门有一章规定了“提高



劳动生产率和降低成本的计划指标”，并专设一章提出了“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要求和措施。因此，“一五”时期在经济效益和发展速度问题上处理得比较好。“二五”时期开始后，由于片面强调速度而忽视了经济效益，提出“比例服从速度”，“要算政治账不要算经济账”等错误口号，结果经济效益降低了，总的速度也下降了。

从其他国家的历史看，经济发展速度快也是同经济效益好密切联系着的。日本高速增长的原因之一是经济效益比较好。据有的作者计算，日本1968年的最终产品为442 876亿日元，为1954年97 526亿日元的454.1%，年平均增长率为11.4%，生产费用则分别为312 885亿日元和78 870亿日元，前者为后者的396.7%，年平均增长率为10.35%。产品的年平均增长率超过了生产费用的年平均增长率，结果是节省了一笔资金，其中的很大一部分是用以保证经济增长的。^①资本主义国家重视经济效益当然是为了资本主义的利益，但他们的经验教训也是值得注意的。

有的同志担心提出翻两番的奋斗目标会使得人们忽视经济效益。从历史上的教训看，这种担心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是，没有足够的理由认为把生产增长速度作为目标必须忽视经济效益。我们之所以要把工农业总产值增长速度作为目标，是由于它是反映生产发展的最主要的指标之一，由此可以看出一个时期内生产的总规模及其对劳动力、原材料的需求，可以用来分析社会再生产的过程和产品及国民收入的结构。提出20年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要求和与此相联系的一系列设想，可以使我们看得更远一些，避免过去走一步看一步的弊病，也可以更清楚地认识到，做好当前各项调整工作，正是为以后经济振兴打下基础。

问题还在于，党中央提出翻两番的要求，是经过认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地确定的。实现这个目标要求每年平均增长7.2%。从1950年至1981年，我国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9.2%，除去发展特别快的3年恢复时期，1953~1981年每年递增8.1%，都高于7.2%的增长速度。同时，经过长期的动乱，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也曾有过严重失误。现在我们已实现了全国的安定团结，全党的工作重点已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经济工作有了正确的指导思想和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

^① 见〔苏联〕多勃罗文斯基著：《日本经济效益问题》，北京出版社，第300~301页。



策，这种局面必将长期巩固发展下去。和过去相比，现在物质技术基础也大大加强了，科学技术力量也加强了，国际条件也对我们有利，因此，20年实现翻两番是完全可能的。过去是由于要求不切合实际的高速度，才导致经济效益下降，现在要求的速度是切合实际的，同时明确规定不断提高经济效益是翻两番的前提，这就能够避免重犯由于盲目追求速度而忽视经济效益的错误。

也有的同志认为，把生产速度作为经济建设的目标会背离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这种看法也没有充分的根据。过去有一段时期内，我们的经济工作是背离了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但这主要是由于指导思想忽视了社会主义生产目的问题，同时也由于追求不切合实际的速度，追求过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势必导致积累挤消费，从而难以保证人民收入在生产发展基础上逐步增加，这是会妨碍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实现的。但是如果实事求是地确定增长速度，同时重视经济效益问题，把增长速度作为奋斗目标并不会妨碍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实现。“一五”时期的经验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事实上，只有生产发展了，人民的生活才能得到改善。我们绝不能把生产目的和实现目的的手段割裂开来。而且，一定的增长速度也是提高经济效益的条件。正如历史经验所表明的，只有生产有持续的较高的增长速度，也才能全面地较快地提高经济效益。因此，十二大提出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实现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也是按照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办事的。实现了这个目标，我国城乡人民的收入就能成倍增长，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就能达到小康水平。

经济效益怎样制约工农业增长速度

把提高经济效益作为翻两番的前提，意味着我们要向提高经济效益要速度。为此，必须研究经济效益怎样制约工农业增长速度，以及提高经济效益要解决哪些关键问题。长时期来我国经济效益差的主要表现有：国民收入增长速度慢于工农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尤其是两者的差距有扩大的趋势；生产中能源浪费严重，加剧了能源供应的紧张状况；基本建设周期长，投资效果差；流通领域占用资金多，周转速度慢。针对这些问题，当前提高经济效益要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第一，使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接近于工农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

国民收入是农业、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和商业等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者在一定时期内新创造的物质财富，它是社会总产品除物质消耗以后的净产值。国民收入增长速度快，增加的国民收入多，才有可能在增加人民收入的同时增加资金积累，使社会有更多的资金来进行扩大再生产。马克思曾说：“生产逐年扩大是由于两个原因：第一，由于投入生产的资本不断增长；第二，由于资本使用的效率不断提高。”^①今后20年翻两番需要大量的资金，例如建设一个年产100万吨的煤矿需要近2亿元投资，时间要7年；建设一个年产2000万吨的露天煤矿需要30多亿元投资，10多年时间；建设一座100万千瓦装机的水电站，至少要10亿元投资，工期要10年左右；修建铁路1000公里需要20多亿元投资。为了保证翻两番的资金需要，应该努力设法使国民收入有较快的增长速度。

在工农业总产值增长速度既定的情况下，使国民收入增长速度快一点是有可能的。因为，工农业总产值增长速度和国民收入增长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从1952年到1981年，后者超过前者的年份有2年，两者基本接近的年份有5年，前者略微超过后者的年份有9年，前者超过后者在3%以上幅度的年份有10年，有4年是两者同时下降的。1950~1981年间，工农业总产值的年平均增长率为9.2%，国民收入的年平均增长率为7.1%，前者超过后者2.1%，1953~1981年间，工农业总产值的年平均增长率为8.1%，国民收入的年平均增长率为5.9%，前者超过后者2.2%。如果在工农业总产值既定的情况下，使国民收入更多一点，就可以为以后年代扩大再生产提供更多的资金，有可能加快以后年份的经济发展速度。“一五”时期和1963~1965年调整时期工农业增长速度较快，同国民收入增长速度较快是有关系的。

理论界曾讨论今后20年国民收入增长速度有没有可能接近工农业总产值增长速度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要研究影响工农业总产值和国民收入两者增长速度不一致的因素以及这些因素的发展趋势。

影响工农业总产值与国民收入两者增长速度不一致的直接因素，是各部门净产值占总产值的比重的变化和部门结构的变化。一般地说，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第598页。



部门总产值中净产值比重下降以及部门结构中净产值比例低的部门所占比重增加，则国民收入增长速度将慢于工农业总产值增长速度，如果各部门总产值中净产值比重增加以及部门结构中净产值比例高的部门所占比重增加，则国民收入增长速度将快于工业总产值增长速度。但实际上有极复杂的情况。过去30年我国各部门产品中物质消耗所占比重有增长趋势，如农产品中物质消耗“一五”为26.2%，“五五”为30.2%；工业产品中物质消耗“一五”为65.6%，“五五”为65.9%，同时物质消耗比例大的工业部门在社会总产品中比重增加了，因此，工农业增长速度和国民收入增长速度的差距有扩大的趋势，“一五”时期前者比后者快2%，比“四五”、“五五”时期快2.2%。今后我们注意提高经济效益，设法降低各部门产品中物质消耗的比重，同时注意使经济结构日趋合理，上述趋势是可以改变过来的。

影响今后两者增长速度的因素是比较复杂的。概括起来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有些因素将使得工农业总产值增长速度快于国民收入增长速度，如有些产品的物质消耗比重将提高，工业的比重将增加；另一方面是有些因素将使得国民收入增长速度快于工农业总产值增长速度，如节约物质消耗将减低产品中物质消耗的比重，劳动密集型产业和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增长速度将加快。总的来说，由于目前我国原材料和能源消耗过多，浪费十分严重，以及一部分生产能力没有得到充分利用，降低物质消耗的潜力是很大的。加上现有经济结构还不合理，通过改善经济结构来加快国民收入增长速度的潜力也相当大。值得指出的是，我国有富裕的劳动力资源，现在劳动力远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劳动生产率比较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潜力很大。而社会劳动量的增加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是影响国民收入增长的重要因素。今后使国民收入增长速度更加接近工农业总产值增长速度的客观可能性是存在的。只要做好各项工作，努力提高经济效益，我们一定能缩小工农业总产值和国民收入两者增长速度的差距，多增加一些国民收入。

第二，提高能源的利用效果，努力节约能源。

能源是生产发展的重要物质条件，是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期内制约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的主要因素。现在我国能源供应比较紧张，每年因缺少能源而影响工业产值达几百亿元，对增长速度的影响是很明显的。解决能源问题的办法，一个是加强能源工业的建设；一个是提高能源的利



用效果。如果只依靠增加能源产量而不注意提高利用能源的效果，那么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要求能源产量也翻两番，即由1980年的6亿多吨标准煤增长到24亿多吨。要求今后20年内增加这么多能源产量，无论从资金还是技术方面看，都会遇到难以克服的困难，几乎是不可能的。有关部门预测今后20年能源产量可以增长一倍或者更多一点，在这种情况下，就要求单位产值的能耗减低一半，例如每万元产值的能耗由1980年的8.2吨降低为2000年的4吨左右，才能实现翻两番的目标。

我国“一五”计划所以能顺利完成，同当时能源利用效果较好有密切关系。每吨能源生产的国民收入，“一五”为1167元，“二五”为517元，1963~1965年为654元，“三五”为707元，“四五”为576元，“五五”为527元。如果“一五”时期能源利用效果没有这样好，“一五”计划也难以实现。

现在，我国通过节能提高能源利用效果的潜力是很大的。我国产值能耗比大多数国家高得多。据估算，1980年我国每亿元国民生产总值平均耗能为21.11万吨，比印度1978年的9.55万吨高1.21倍，比日本1979年的4.27万吨高3.94倍。如果我国产值能耗达到印度水平，同样的能源可以增加产值一倍，如果达到日本水平，可以增加更多。再从国内看，各省市的工业产值能耗相差十分悬殊。1980年每万元工业产值平均能耗上海为2.41吨，天津为4.15吨，浙江为4.27吨，广东为4.29吨，江苏为5.04吨，这些是偏低的省市，偏高的几个省则在20吨以上，比上海高10倍左右。如果全国的工业产值能耗达到江苏水平，估计可节约能源1.5亿吨，达到上海水平，估计可节约能源近3亿吨。由此可见，通过节能提高能源利用效果是完全可能的。

节能可分为直接节能、间接节能两种。直接节能是指直接减少各种产品的能源，例如减少每度电的煤耗。间接节能是指通过直接节能以外的各种办法减少单位产品、产值的能耗。例如把分散的工业锅炉改为大锅炉，搞集中供热，热电结合，用蒸汽先发电，后供热。这样做每增加1千瓦发电能力，一年发6000多度电，可直接节能3吨，而充分利用6000多度电还可增加1.3万元工业产值，间接节能比直接节能更多。

我国目前不少工业产品的能耗还低于历史较好水平，而有些较好水平还是技术比较落后状况时的水平，可见直接节能的潜力是相当大的。间接节能的潜力也很大，主要途径有：（1）调整产业结构。例如调整



轻重工业结构，同样的产值重工业耗能为轻工业耗能的4倍。这几年节能主要依靠调整轻重工业的比例和部分产品的生产结构。但调整产业结构包括的内容很多，今后可挖掘的潜力仍相当大。（2）改进产品性能，延长产品寿命。如汽车轴承寿命，我国为15万公里，日本为30万~40万公里。如果寿命延长到日本的水平，可间接节能一半以上。（3）提高加工深度，增加高档产品比重。如我国合金钢只占钢产量的4.9%，而联邦德国为15%，美国为16%，合金钢1吨可顶普通钢2吨用。增产高档产品将成倍增加产品产值，从而成倍减少间接能耗。又如将一些煤油厂从生产重油为主的浅度加工改为深度加工，全国可增加产值二三十亿元，产值能耗可降低20%~30%。（4）减低产品的原材料消耗。如1980年我国钢材成材率为73.2%，比日本低14.7%，如提高到日本水平，按年产量计可增产钢材500多万吨，1吨钢材耗能2吨多，合计间接节能1000多万吨。（5）搞好物资综合利用。例如不少矿产资源是共生的，现在勘探开发单打一，如综合勘探开发，不仅可增加生产，而且可间接节能。其他如充分利用现有企业的生产能力，提高劳动生产率等等，也都是间接节能的重要途径。

直接节能和间接节能都要依靠改进经营管理和提高科学技术水平。现在很多企业不注意能源管理，或者管理水平很低，工厂里普遍存在漏气、漏水、漏油，电力热力浪费严重等现象，因此必须加强能源管理，建立起一套切实可行的管理办法。我国能耗高也由于设备陈旧、技术水平低。例如很多工业锅炉热效率低，估计全国每年多耗煤几千万吨。我们要十分重视发挥先进科学技术在节能中的作用，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以节能为中心的技术改造。日本由于重视经营管理和技术改造，节能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国民生产总值与能源增长之比，1973年以前为1比1，现在为1比0.7，20世纪90年代将为1比0.4。我们只要在思想上真正重视节能，努力改进能源管理，进行技术改造，并采取其他必要的措施，节能任务是一定能完成的。

第三，缩短建设周期，提高固定资产投资的效果。

实现翻两番的目标，要求搞好重点建设。尤其是前10年能不能集中必要的财力和物力保证国家的重点建设，是能否打好基础，使后10年进入新的经济振兴时期的关键之一。重点建设任务是否能胜利完成，既决定于积累的资金能不能同建设的规模相适应，也决定于投资效果能



否有较大的提高。基本建设投资效果如何，对于重点建设需要的资金量影响极大。例如增加同样数量的国民收入，投资系数（这里说的投资系数是指每增加一元国民收入需要的投资数）高则需要的投资多，投资系数低则需要的投资少。基本建设还有这样的特点，即它“在较长时期内取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而在这个时间内不提供任何有效用的产品”。^①因此，建设周期长，投资不能提供产品的时间就长，建设周期短，投资不能提供产品的时间就短。现在我国固定资产投资效果较差，建设中占用了大量过多的资金。我们很有必要十分重视投资效果对工农业总产值增长速度的影响。

我国“一五”时期投资效果是比较好的。据有的同志计算，“一五”时期平均每百元固定资产投资新增国民收入 58 元，“五五”时期下降为 34 元。“一五”的投资效果与外国比较也是好的，如 1971 ~ 1978 年美国、日本每百元固定资产投资新增的国民收入为 49 元，英国、法国为 52 元。“一五”时期投资效果好不是偶然的，它既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优越性的表现，也是自觉地提高投资效果的结果。《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曾明确规定：“在基本建设方面，国家要求各部门、各地方的领导机关合理地分配资金和节约地使用资金，避免资金的分散和浪费，要求每个新建、改建的企业都能够最大限度地降低工程造价，尽快地和充分地发挥投资的效果，完成国家规定的降低成本的指标”。这些规定对现在也是有重要指导意义的。

我国投资效果差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建设周期长。“一五”时期全国大中型项目的建设周期平均为 6.5 年，“五五”时期延长到 13.2 年，增加 1 倍以上。据 1982 年对当时正在建设的 463 个民用大中型项目分析，建设工期 10 年以上的 129 个，8 ~ 10 年的 103 个，5 ~ 8 年的 153 个，5 年以下的 78 个。这种建设工期拉长的现象在重工业、轻工业、农林水利和民用建筑中普遍存在。即使是应该当年见效的技术措施项目，现在也要二三年甚至更多时间才能完工。建设周期长是工程造价高、资金占用多、投资回收期长的重要原因。据计算，全国平均建设工期拖长一年，仅全民所有制企业施工队伍工资一项，就要增加开支 55 亿元。“一五”时期在建工程占用的投资相当于当年投资的 62.9%，1980 年提高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4 卷，第 396 页。



到149%，按此计算，多占用资金400多亿元。可见，缩短建设周期是提高投资效果的一项重要任务。

另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是不少新建投产企业的经济效益很差，有的项目建成后长期形不成生产能力或达不到设计能力，有的投产后盈利很少甚至亏损。据对1970年以来新建投产的503个大中型企业的统计，每百元固定资产提供的产值只有54元，比原有大中型企业低38.5%，每百元资金提供的利润和税金为13.2元，比原有大中型企业低56%，投资回收期达9年4个月，比原有大中型企业3年7个月多1.6倍。另据一机部调查，“一五”时期建成的大中型项目，建成投产后3年半即可收回投资，而1970年以后建成投产的项目，到1979年止还没有一个全部收回了投资。到1979年止，该部“三五”时期建成投产的单位，净亏损的占1/7，“四五”建成投产的单位，净亏损的占1/4。

为了提高投资效果，应当从各方面进行工作。当前尤其要注意加强对基本建设的计划管理。固定资产投资要统一计划，分级管理。中央要集中必要的建设资金，目前国家预算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以保持在30%左右为宜，中央安排预算内投资必须集中使用，保证把重要能源基地、铁路干线、重要港口、原材料基地等建设好，其他方面的建设应当主要由地方、部门和企业根据可能条件进行安排。要继续注意控制基建规模，克服盲目建设和重复建设。确定项目一定要进行可行性研究，加强基本建设的前期工作。要认真整顿施工企业，提高其经营管理水平。还要十分重视科学技术的作用，充分发挥先进科学技术对提高投资效果的作用。

第四，提高流通领域的经济效果，节约流动资金。

马克思曾经说过：“资本在流通时间内不是执行生产资本的职能，因此既不生产商品，也不生产剩余价值”；“资本的各组成部分在流通领域不断停留的时间越长，资本在生产领域不断执行职能的部分必定越少。因此，流通时间的延长或缩短，对于生产时间的缩短或延长，或者说，对于一定量资本作为生产资本执行职能的规模的缩小或扩大，起了一种消极限制的作用”。^①这段话虽然直接是指资本主义生产而言的，但也说明，社会主义经济中流通领域的经济效果对生产发展速度的制约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141-142页。



作用是不能忽视的。

长期以来我国流通领域的经济效果也比较差，而且迄今没有扭转过来。突出的表现是流动资金占用过多。据计算，1981年底国营企业占用的流动资金达3545亿元，再加上集体工商业占用217亿元，流动资金总额达到3762亿元，比1980年增加350亿元，增长10.3%。而同期全国工业总产值增长4.1%，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后实际增长7.2%，流动资金增长大大超过了生产和流通的增长。1981年全国流动资金总额和同年国民收入几乎相等。据了解，有些国家（如联邦德国）社会库存约占国民收入总额的1/3，我国目前的社会库存总额则接近于国民收入总额。

1981年流动资金总额中属于不合理占用的有多少？据有关方面估计：工业企业流动资金不合理占用约170亿元，物资供销企业不合理占用约100亿元，内贸外贸方面不合理占用约100亿元，集体工商企业不合理占用约30亿元，以上合计为400多亿元。这是把1981年主要产品库存量和正常库存定额相比较得出来的数字，而这里所谓的正常库存定额是按我国过去习惯确定的，和先进国家比较，定额的标准是很低的。如我国钢材周转时间在7~9个月内就算正常状况，这个周转时间比联邦德国、日本要长2~3倍。所以实际上不合理占用的流动资金还要多。即使以400亿元计，假定这些资金形成固定资产，每年约可增加工业产值400亿元。另外按国营工业每百元资金实现利润和税金约25元计，国家一年可以增加利润和税金约100亿元。

目前流动资金占用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一是企业产成品积压增加。据有关部门1981年对317个工业企业调查，这些企业产值比上年增长3.4%，产成品资金占用却增加21.9%。过去生产企业一般是原材料储存过多，现在又加上了产成品积压过多。二是消费品积压增多，前两年是钢材、机电产品等生产资料库存增加较多，1982年消费品库存也有较大增加。

流动资金占用多反映了我国生产领域、流通领域存在的种种问题。它说明我国生产结构和需求结构还很不适应，还存在着盲目建设、盲目生产等现象；说明一部分产品质量差，成本高，不适销对路；也说明商品流通渠道不畅通，尤其是工业品下乡的渠道不畅通。流动资金占用多还妨碍有些部门的再生产顺利进行。例如1982年化纤布积压很多，



1983年不得不强制限产，如果能打开农村销路，既能满足农民需要，又有利于纺织工业的发展。可见，流通领域占用资金多不仅是浪费资金，还意味着生产过程受到阻碍。

国务院领导同志曾指出：“我们的国家，仓库积压一年比一年多，这成了一种顽症”；“全国流动资金，大大地超过了应该拥有的数量，如果能加速周转，减少2%~3%的占用量，就可以节省出70亿~100亿元的资金。”我们必须找到流通领域经济效益差的原因，治好这个顽症，减少物资积压，加速资金周转，保证战略目标的胜利实现。



关于经济发展战略的几个问题*

自从邓小平同志提出要在 20 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目标以后，需要研究如何把这个目标具体化和如何实现这个目标，这就是经济发展战略要解决的课题。过去 30 年我国也是有经济发展战略的。虽然没有用这个概念，而是用的路线，方针等等，但是实质上是经济发展战略问题。

国外对这个问题研究得很多，而且早就作为一门科学研究了。据有的同志考证，美国经济学家赫希曼较早使用经济发展战略这个概念，1958 年他出版了一本名为《经济发展战略》的书，主张国民经济部门“不平衡发展”，即先发展直接生产部门，然后发展基础设施部门。这门科学主要是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这是广大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紧迫问题，也是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学者关心的问题。但是不能认为只是发展中国家才有经济发展战略问题。发达国家同样有经济发展战略问题，如日本就正在研究 20 世纪 80 年代的经济发展战略。

一、什么是经济发展战略

战略原来是一个军事用语，现在则常被借用于其他领域，如革命战略、经济发展战略、科技发展战略、社会发展战略等等。斯大林曾说：“战略就是规定无产阶级在革命某一阶段上的主要打击方向，制定革命力量（主要的和次要的后备军）的相应的布置计划，在革命这一阶段的整个过程中为实现这个计划而斗争。”^①毛泽东同志说过：“战略问题是研究战争全局的规律的东西”；“凡属带有要照顾各方面和各阶段的

* 原载《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1983 年第 1 期。

① 《列宁主义问题》，第 60 页。



性质的，都是战争的全局”；“研究带全局性的战争指导规律，是战略学的任务”。^①

经济发展战略有不同的定义。一种定义是：经济发展战略是一个国家由生产力落后转变为生产力较为发达的过程中所要采取的总的方针政策。这个定义把经济发展战略限制在发展中国家，这是根据不足的。另一种定义是：经济发展战略就是为实现经济发展目标所规定的总的方针和基本原则。这个定义认为一切国家都有经济发展战略问题。但是经济发展战略不仅包括实现发展目标需要采取的措施，而且包括发展目标本身。我认为经济发展战略简单地说，就是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经济发展所要达到的主要目标和实现这些目标的主要措施的设计。

根据斯大林关于革命战略的说明和毛泽东同志关于战争战略的说明，同时，根据各国经济发展战略的一般内容，作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有如下四个特点：第一，具有全局性，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全局和整体。第二，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在战略时期内是相对稳定的。第三，具有综合性。经济发展战略不是一个孤立的单独的政策，而是由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组成的政策体系。第四，具有自觉性。是有意识地提出来的计划、纲领或设想。这些特点当然也是相对的，例如长期性，可以是10年20年，也可以是三五年。再如自觉性，有些战略开始并不很明确，而是在实行过程中逐步明确的。

经济发展战略主要包括战略目标和战略措施两方面的内容。

制定经济发展战略首先要确定战略目标。有人认为经济发展战略的内容不包括战略目标，这是不妥当的。目标就是要达到什么要求，完成什么基本任务。没有战略目标，也就无从考虑战略措施。有人也许认为制定战略目标不是什么重要问题或者不存在需要研究的问题，其实问题很多很复杂。例如经济发展应该单纯以经济发展速度为目标，还是应该以满足人民需要为目标，就是一个要明确的问题。目标有质的规定性和量的规定性，如何明确量的规定性，如我国2000年以前生产增长多少，人民生活改善多少，也是很复杂的问题。

经济发展战略目标是由社会制度的性质制约的。有人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区分为传统的发展战略和变通的发展战略，认为前者强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68页。



调经济增长而后者强调满足人民需要。这种看法给人一种印象，似乎任何社会制度下都可以把满足人民需要作为经济发展的目标。不能否认有的资本主义国家也强调满足人民需要，但最终还是为了巩固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下把满足人民需要作为生产目的是不同的。总之，不能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可以有完全相同或本质相同的战略目标。它们当然会有某些共同点，但也要看到本质的区别。

战略目标一般包括发展生产力方面的任务，变革和完善生产关系方面的任务，提高人民生活方面的任务，也包括发展科学技术和解决一些重要社会问题方面的任务。过去有一段时期我们只重视发展生产力的任务，对于提高人民生活重视不够，这几年我们正在克服这个缺点，但是也不能由于强调提高人民生活而忽视其他方面的任务。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提高人民生活是个生产目的问题，当然是应该重视的。但也要看到其他方面的任务。除了努力提高人民生活以外，有时其他方面的任务由于客观要求也会提到非常重要的地位上来。

战略措施是经济发展战略的内容，这是没有分歧的。那么何谓战略措施？概括说，这是指那些涉及全面的，在整个战略阶段必须实行的重大措施。我们通常说的方针，一般是属于战略措施范围的，重大的政策也属于战略措施的范围，仅仅涉及某一方面的具体政策，则不一定属于这个范围。战略措施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处理生产关系问题的战略措施。第二，处理生产力问题的战略措施。第三，处理上层建筑问题的战略措施。以上是就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发展战略而言。再就科技发展战略社会发展战略而言，则还包括处理科技发展和重大社会问题的战略措施。每个方面也有不少内容，如处理生产力包括处理产业结构、就业结构、资金问题、技术问题等内容。最近我们考虑我国实现工业现代化在战略措施方面有哪些问题要研究，认为最少有以下一些问题，即：（1）如何解决资金问题；（2）如何解决技术问题；（3）如何解决能源问题；（4）如何解决原材料问题；（5）如何解决劳动力问题；（6）如何解决市场问题；（7）如何解决工业内部结构问题；（8）如何解决工业生产力配置问题；（9）如何处理基建规模和投资方向问题；（10）如何克服农业交通运输落后对工业的限制；（11）如何提高工业经济效益；（12）如何解决工业管理体制问题。我们在制定发展工业战略措施时必须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



二、研究经济发展战略的意义

研究经济发展战略的意义，是由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性决定的。由于经济发展战略规定了一个较长时期内奋斗的目标和重大措施，因此，对于经济发展乃至社会发展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主要的影响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影响经济发展方向。经济发展战略不仅影响生产力发展的方向（如把经济发展的重点放在农业还是工业上，工业中又放在哪个工业部门上等等），而且影响生产关系发展的方向（如对各种经济成分采取什么态度，经济管理体制如何变化等等）。

第二，影响经济增长速度和人民生活。战略目标中一般都规定经济增长速度并规定了相应的措施，不管目标是否能实现，都对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起着重要的作用。同时，经济发展战略对经济结构的变动做出规定并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第三，影响国际经济关系。现在任何国家都不能孤立起来搞经济建设，而采取何种经济发展战略，对国外经济关系也是有很大影响的。例如，一个国家实行开放政策还是闭关自守，不仅对国内的影响不同，对国外的影响也不一样。

第四，影响社会安定团结。经济发展战略由于影响经济发展，最终也影响社会的安定团结，这种影响来自很多方面，如就业状况（是否充分就业）、分配状况（分配是否合理，是否过分悬殊）、收入状况（各阶层收入水平和差别）、生活状况（生活是否改善，是否安定）都受经济发展战略的影响，并影响社会的安定团结。

从历史上看，比较正确的经济发展战略能够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而错误的经济发展战略则阻碍经济发展，甚至导致社会动乱。

例如，日本 20 世纪 60 年代的经济发展战略就对经济发展起了促进作用。这个战略体现在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中，倍增计划的目标是：到 1970 年国民收入为 1960 年的 266.8%，每年增长 7.8%，按人口平均的国民收入为 1960 年的 237.8%，每年增长 6.9%，每人平均个人消费支出为 1960 年的 232.4%，年增长 6.7%。主要措施有：（1）增加经



济和社会的基本设施；(2) 促使实现高度工业化的经济结构；(3) 促进进出口，加强同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合作；(4) 发挥人的才能与发展科学技术；(5) 削弱双重结构及确保社会安定。这个战略考虑了日本当时的情况和问题，估计到了高速增长的潜力，用适当增加居民收入和消费来促进生产，同时努力增加积累，建立现代化的经济结构，克服薄弱环节，因此取得了成效。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是提前完成的。

伊朗巴列维王朝的经济发展战略则是相反的一个例子。1973 年底石油大幅度涨价后，伊朗国王规划了一幅壮观的建设蓝图，要求 1985 年达到法国 20 世纪 70 年代的工业水平，90 年代成为世界第五工业大国，20 世纪末赶上同时期的欧洲水平，以“大跃进”速度跨入现代工业强国行列。建设开始时百业俱兴，接着各种矛盾就发展起来，终于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巴列维王朝的灭亡当然主要是由于社会制度的弊病，但经济发展战略上也有很多错误。主要错误有：(1) 指标过高，基建规模过大。(2) 忽视交通、港口和原材料工业。(3) 忽视农业发展，导致城乡关系紧张。(4) 盲目引进外国技术，贪大求洋。(5) 搞过多的福利措施，导致物资短缺，通货膨胀。这个例子从反面说明了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性。

以上主要是就整个国家来谈经济发展战略的，但是不仅国家有发展战略问题，地区部门企业都有发展战略问题。它们是研究一个地区、一个部门、一个企业经济发展的目标和主要措施的。

三、怎样借鉴外国经济发展战略的经验教训

为了制定好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借鉴外国的有益经验是很必要的。经济发展战略涉及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发展生产力，而各国生产力的发展是有某些共同规律的，这是外国经验可以借鉴的原因。但是生产力的发展又受生产关系的制约，所以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积累的经验，我们也可以借鉴和需要借鉴，但不能照搬。即使同样的社会经济制度，由于国家大小不同，自然资源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历史传统不同，国际环境不同等原因，经济发展战略也有很大区别。这是在借鉴外国经验时必须注意的。



外国经济发展战略的经验，值得借鉴之处很多。这里提出以下几点供参考。

1. 关于确定发展战略目标。

长时期来很多国家都仅仅把经济发展速度作为战略目标，单纯追求国民生产总值的提高，希望早日实现工业化。这样做取得了成绩，但也带来一些问题。主要是即使生产发展了，人民的基本需要也没有得到较好的满足。后来有人提出要以满足基本需要作为经济发展战略的目标。美国《科学技术与全球问题》一书中说：“过多地拿国民生产总值进行国与国之间的比较，会引导发展中国家去追求不切实际的发展目标，结果只会受到挫折”；“对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弄清人民的基本需要是什么，以此来规定本国所要达到的目标，会显得更为富有意义”；“会引导发展中国家走向更切合实际的发展道路”。

现在把前一种战略称为传统的发展战略，把后一种战略称为变通的发展战略。美国健康协会提出的 ASHA 指标，被认为可用来反映变通发展战略的要求。ASHA 包括六个项目，即：就业率，识字率，平均估计寿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出生率和婴儿死亡率。他们提出一个公式，认为按照公式计算结果达到 2 022，就是达到了理想值。根据他们的计算，如果经济全面发展，每人平均国民生产总值 800 美元，就能达到 2 022，如单纯追求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而不注意全面发展，则要 2 000 美元才能达到 2 022。

在很多国家里，人民需要得不到满足，主要是由于资本主义制度、封建主义制度和帝国主义制度的残酷剥削。但是同经济发展战略也有关系。从仅仅把国民生产总值作为目标到把人民生活需要作为目标，不能不认为是战略思想上的进步。上述 ASHA 指标，也可供我们参考。

2. 关于发展工业的途径。

这个问题可以从多方面进行总结。例如可以从我们通常说的优先发展轻工业还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角度进行总结。资本主义国家一般从优先发展轻工业开始工业化，苏联则从优先发展重工业开始工业化。发展中国家情况不同，有的实行优先发展轻工业，有的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它们各有利弊，不过片面地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往往带来比例失调。这方面的经验教训还值得深入探讨。

我们也可以从国际贸易的角度进行总结。发展中国家有所谓进口替



代工业化战略和出口替代工业化战略。前者主张实行保护贸易，生产替代进口的制成品。拉美及亚洲一些国家的实践表明，实行这种战略使消费品工业得到了发展，一定程度上加强了民族经济的能力。但由于国内市场有限，加上实行贸易保护政策，以及原材料和设备进口的增加，使得国内产品成本上升、效率下降，国际收支状况恶化，如有的国家实行一段时间进口替代以后，由于转向资本密集型工业，导致资金需要剧增，出口减少，进口增加。后者主张以新的出口产品（制成品）取代传统出口产品（初级产品）。实行这种战略由于面向国际市场，因而能注意生产效率与产品质量，可以促进出口产品竞争力的提高，扩大国外市场，从而促进国内工业的发展。不过这种战略也会导致过分依赖国际市场，使本国经济随着国际经济的变化而波动。

国外还有平衡发展战略与不平衡发展战略的争论。有人认为，基础设施包括交通能源通讯等部门对直接工业部门有着重要的作用，应该使直接生产部门和基础设施部门平衡发展。有人认为，不应过分重视基础设施部门建设，否则会浪费资源，降低发展速度，应该先发展直接生产部门，到一定程度后，再发展基础设施。看来前一种意见是比较正确的。

3. 关于发展农业的经验。

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农业不发达，也难以适应发达的工业和发展的国民经济。这方面经验教训也很多。据统计，目前大约只有1/4的发展中国家，农业生产平均增长率接近或超过4%，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粮食生产远远不及人口增长率。战后，发展中国家农业和粮食生产萎缩，原因很多，一个关键是战略上有偏差，即过分重视工业而忽视农业。

以印度为例，第二、第三个五年计划经济发展战略的重点是优先发展重工业，忽视了农业发展，结果导致工农业比例严重失调，农业减产，“三五”粮食减产998万吨，粮食平均增长率为-2.6%，缺粮严重，进口增加，进口粮食高达2900万吨，花去外汇13.6亿美元，使整个经济陷于困难。从1966~1967年度开始，印度战略的重点从优先发展重工业转到了优先发展轻工业，进行了绿色革命。主要措施有：（1）对重要农作物进行研究。（2）增加灌溉设施，改进灌溉方法。（3）增加供应化肥、农业机械物资的农业信贷。（4）采用各种高产品种。（5）精耕



细作，提高单产，增加商品粮。（6）改良土壤和增加土壤肥力等等。同时提高了粮价，对农业进行财政补贴，增加农业投资和化肥等使用量，重视农业教育和研究。绿色革命后粮食产量的年平均增长率超过了人口的增长率。

4. 关于根据国内外形势改变产业结构。

经济发展战略必须随着国内外形势变化而变化。战后日本劳动力多，因此开始是重视发展劳动集约型产业，后来资金多了，就重视资本集约型产业。到了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新情况新问题，一是能源危机，能源供应紧张了，价格提高了；二是环境污染，化学工业的高度发展使环境严重污染了；三是外国的竞争，不仅轻工业品有人竞争，重工业品也有人竞争了，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出口这些产品了。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提出了“从以重化学工业为中心的增长至上路线转向以知识集约型产业为中心的灵活增长路线”。他们准备大力发展知识集约型产业，使重化学工业和知识集约型产业并存。

什么是知识集约型产业？日本产业结构审议会举的例子有：（1）研究开发集约产业，包括电子计算机，飞机，电气汽车，产业机器人，原子能装置，集成电路，高级化学制品，新合成化学，新金属，特殊陶器，海洋开发。（2）高度组装产业，包括通信机械、数控机床，防止公害机器，教育机器，自动仓库，高级成套设备。（3）流行型产业，包括高级成衣类，高级家具，住宅用器具，电子乐器，电气音响器具。（4）知识产业，包括处理情报和提供情报的服务，电视录像录音服务，程序系统，总体设计，咨询业务。

日本这样做，能够克服一些困难，其经验也有可取之处。

5. 关于利用本国的优势。

在经济发展战略中考虑充分利用本国优势，也是一个重要问题，有些国家做得比较好。例如新加坡经济发展快就同充分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大有关系。新加坡是个岛国，面积600多平方公里，人口230多万。不利条件很多，但也有有利条件，如地处太平洋与印度洋东西方海运咽喉要道，是传统的贸易集散地，独立前已拥有较完善的港口、交通和商业、金融等设施。新加坡充分利用了有利条件。一是发展炼油、造船工业，这是利用地处石油海运要道，便于取得原料和便于销售的地理条件。二是发展电子工业、精密机器工业和品种繁多的手工艺品生产，这



是避开国土面积少、资源缺乏的不利条件，利用工人勤劳灵巧，教育比较普及的优点。三是发展转口贸易，这是利用原有商业、金融、海运等业务基础和设施。四是从国际资本市场吸取资金，取得跨国公司的技术、管理人才和市场，这也是利用经济和地理条件的优势。五是利用优越的地理环境，积极建造旅游地、风景区、高级旅馆，促进旅游业的发展。新加坡 1965 年独立后，每年制造业以平均 10% 以上的速度增长，1960 ~ 1976 年按人口平均国民生产总值每年增长 7.5%，1978 年国民生产总值每人平均已达 3 150 美元。

我国的优势是很多的，向国外借鉴利用本国本地区优势的经验，是很有意义的。



战略转变和经济发展*

——谈谈“六五”时期的经验

1985年9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提出了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期间的主要奋斗目标。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七五’这五年很重要。如果经过这五年，使改革基本就绪，经济又能够持续稳定协调地发展，我们实现十二大提出的本世纪末的目标，就有了充分的把握”。为了顺利实现“七五”期间的奋斗目标，需要认真地总结和吸取“六五”时期的经验教训。下面就这个问题，谈一些不成熟的看法。

“六五”时期是一个战略转变时期

我国“六五”时期在经济建设和体制改革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创造了丰富的经验，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和教训。为了总结“六五”时期的经验，有一个如何认识这一时期特点的问题。这就是要用历史观点看问题，要把“六五”时期和以前的时期以后的时期联系起来看。这样看问题，我认为可以说，“六五”时期是一个经济发展战略转变的时期。“六五”时期的成就和问题，经验和教训，都同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有关，都要从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得到科学的说明。

说“六五”时期是战略转变时期有两层意思。一层意思是说，“六五”时期已经开始实行新的发展战略，取得了成绩和经验。另一层意思是说，这个时期还没有完成由传统经济发展战略向新的发展战

* 本文写于1985年12月，原载《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1986年第1期。



略的转变。转变还在继续进行着。以上估计涉及对“六五”时期经济工作的基本估价，也涉及我们面临的基本任务。

“六五”时期由旧战略向新战略的转变主要表现在以下一些方面：（1）在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上，过去一个很长时期内忽视增加人民的收入和改善人民的生活，存在着为生产而生产的偏向，“六五”时期开始强调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是努力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重视增加劳动者的收入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2）在速度和效益的关系上，过去很长一段时期内重视产值增长速度而忽视提高经济效益，存在着盲目追求速度的偏向，“六五”时期开始扭转这种偏向，强调要实事求是地确定速度，速度要以提高效益为前提，开始重视提高经济效益了。（3）在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关系上，过去片面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致使重工业挤了农业和轻工业，实行的是不平衡发展战略，“六五”时期纠正了这个偏向，实行农轻重平衡发展的战略，农业、轻工业得到了较快的发展。（4）在扩大再生产的方式上，过去重视基本建设而忽视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实行的是以外延形式为主的扩大再生产，“六五”时期强调并开始重视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扩大再生产开始转向以内涵形式为主。（5）在积累消费关系上，过去长时期内重视积累而忽视消费，存在着积累挤消费的偏向，“六五”时期端正了对生产目的的认识，注意克服积累率过高的现象，改善了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6）在经济体制问题上，过去是坚持传统的过分集中的国民经济管理体制，“六五”时期开始着手改革传统经济体制，坚决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方针。

需要强调的是，“六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战略虽然已经转变并取得了成绩，但是这个转变还没有完成。确切地说，战略转变还在进行中。我们既不能忽视和低估已经实行的转变，又不能把已经进行的转变估计过高，看不到转变还必须继续坚持下去。

为什么说“六五”时期是战略转变时期呢？我认为有四个方面的理由：

第一，党和政府做出了一系列决定，要求“六五”时期实行新的经济发展战略。

1978年12月举行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根据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总结了建国以来经济建设的一些



重要经验教训，重新考虑了一系列重大战略问题。全会要求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要求改变国民经济中一些重大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的状况，切实做到综合平衡；要求集中主要精力把农业尽快搞上去，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生活。全会指出，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并提出了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的要求和原则。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在党的指导思想上，经济发展战略已经开始转变了。

为了实行新的战略，1979年4月，党中央提出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六五”时期继续贯彻执行了这个方针。1981年6月，党中央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清理了过去经济建设中的“左”的严重错误，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从我国国情出发，量力而行，必须坚持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重视经济效益的提高。《决议》中说：“我们过去在经济工作中长期存在的‘左’倾错误的主要表现，就是离开了我国国情，超越了实际可能性，忽视了生产建设、经营管理的经济效果和各项经济计划、经济政策、经济措施的科学论证，从而造成大量的浪费和损失。”《决议》为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1981年11~12月，五届人大四次会议上提出了今后经济建设的方针：“要切实改变长期以来在‘左’的思想指导下的一套老的做法，真正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走出一条速度比较实在、经济效益比较好、人民可以得到更多实惠的新路子”。为了走出一条经济建设的新路子，还提出了十条方针。这样，我国经济发展的新战略第一次有了比较全面比较具体的概括。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报告中，又提出了到20世纪末的20年中我国经济建设的战略目标、战略重点和战略步骤及一系列正确方针。并强调指出：实现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要以提高经济效益为前提，要把全部经济工作真正转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

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规划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前景和蓝图，要求适时地开展以城市改革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

邓小平同志曾说：“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



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经济发展的新战略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从以上列举的事实可以看到，“六五”时期我国在总结过去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已经形成了比较全面、比较完善、比较具体的经济发展新战略。整个“六五”时期，全国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是努力贯彻新战略的。

第二，“六五”时期我国经济建设和体制改革的成就，也说明我国已经实行新的经济发展战略。

例如，由于开始纠正盲目追求高速度的偏向，强调提高经济效益的意义和采取了一些必要措施，“六五”时期改变了过去增长速度时高时低、起伏极大的状况，出现了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新局面，虽然从多数年份看，速度并不特别快，但平均增长速度却比过去高。工农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1953~1978年平均为8.2%，“六五”期间每年平均预计为10.6%；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1953~1978年平均为6.0%，“六五”期间每年平均预计为9.7%。“六五”期间经济效益也有所提高。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由过去28年平均的3.5%提高到近4年平均的5.8%；每百元积累所增加的国民收入由过去26年平均的20元提高到近4年平均的35.6元；每百元国民收入消耗的能源1980年为16.3吨，以后逐年减低，1984年减少到13.5吨；国家财政收入也增长较快。

又如，由于克服了片面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偏向，加快了农业轻工业发展的步伐，农、轻、重的比例关系日趋协调。1978年我国工农业总产值中农业占27.8%；工业占72.2%；工业总产值中轻工业占43.1%，重工业占56.9%，农业和轻工业的比重都嫌过低。1984年工农业总产值中农业的比重提高为34.8%，工业的比重相应降低为65.2%，工业总产值中轻工业的比重提高为47.4%，重工业的比重相应降低为52.6%，1985年农业和工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比例关系仍保持基本协调。

再如，由于端正了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克服了重积累轻消费的偏向，“六五”期间积累和消费的比例也趋于协调，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1978年我国国民收入使用额中消费占63.5%，积累率高达36.5%，显然积累率过高。经过调整，1983年积累率下降为29.7%。1984年提高到31.2%，虽然高了一点儿，但由于国民收入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居民消费水平仍有较快的提高，没有再出现积累挤消费的问题。“六



五”前4年，农民家庭平均每人生活费纯收入年递增率为15.6%，而1958~1978年间的年递增率不到3%；城市职工家庭人均生活费收入年递增率为8.5%。扣除物价变动因素后，农民人均生活费纯收入每年平均增长14%，职工人均生活费收入每年平均增长6%，城乡差距趋于缩小。

再如，由于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出现了多种经济形式多种经营方式并存和共同发展的局面。到1984年，农村99%以上已实行大包干责任制；城镇集体所有制职工人数由1978年的2048万人增加到3216万人，城镇个体劳动者由15万人增加到339万人。乡镇企业和城镇集体企业迅速发展，个体手工业也发展很快。一些国营企业实行了国家所有集体经营或由集体、个人承包经营以及租赁等方式。通过改革，还增强了企业的活力，加强了横向经济联系，扩大了对外经济交流。“六五”期间，地区之间、部门之间、行业之间、企业之间广泛开展了经济技术协作与支援，协作的内容由以物资协作为主逐步转向技术协作经济联合和技术、资金、人才、物资四位一体的协作。“六五”期间坚持了对外开放政策，打破了过去闭关锁国的状态，由封闭型经济开始转向开放型经济，对外贸易和技术经济交流都取得了显著的进展。

总之，“六五”期间我国经济发展的巨大成绩，都是同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分不开的，是实行新的发展战略的结果。

第三，在实行战略转变的过程中，还有不够坚决不够自觉的现象，有的时候还有反复。

尽管在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上已坚决地摒弃了旧的发展战略，确立了战略转变的思想。但是，实际工作中有些人实行战略转变的自觉性还不够。因此，有的问题上口头转了，实际未转；有的问题上中央转了，地方未转；有的问题上方针转了，措施未转；有的问题上转转停停，甚至出现反复。

突出的表现在速度问题上。“六五”计划规定“保四争五”的速度，在指导思想上是正确的，虽然也有对形势发展估计不够的缺点。但是后来有些地方和部门又出现了盲目追求速度、互相攀比速度的现象。有的人错误地理解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要求，忽视翻两番必须以提高经济效益为前提，不顾条件地提出提前翻番，例如要求翻两番半、翻三番、甚至翻更多。这就导致1984年底开始的经济过热现象，给国民经济发展带来了消极后果。



战略转变不够自觉也表现在产业结构问题上。“六五”时期农轻重虽然趋于基本协调了，但是在农业内部，在轻工业内部，在重工业内部，还有不够协调甚至很不协调的现象。能源供应始终比较紧张，交通运输则越来越紧张。这些现象当然不都是由于战略转变不够自觉，但是确实部分地或主要地同旧战略仍在发生作用有关。问题在于，并不是所有的干部对于产业结构中这些不协调现象已有了足够的认识，从而通过自觉地实现新战略而克服这些现象。而且，产业结构不只是农轻重之间以及它们各自内部的关系问题，其他如一、二、三次产业之间的关系，基础设施和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关系，都是我国当前产业结构中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问题。而我们还没有十分自觉地把这些问题提到战略的高度来认识。有些人还往往把农轻重比例和产业结构混同起来，错误地认为农轻重比例协调了也就是产业结构合理了。

战略转变不够自觉还表现在现有企业技术改造的安排上。尽管和过去相比也开始强调和重视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但是实践中重基本建设轻技术改造的情况还普遍存在。“六五”计划要求更新改造措施投资占全民所有制固定资产投资的36%，但前三年计划执行的结果只占30%左右，相当一部分名义上用于技术改造的资金实际上也是用于基本建设。这也就是仍旧偏重于外延扩大再生产而忽视内涵扩大再生产，因而不利于加快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

经济工作还没有真正转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尽管“六五”期间经济效益有所提高，但是也有不少经济效益指标没有得到应有的提高，有的指标还下降了。这说明不少人对提高经济效益的重大意义还没有足够认识。提高经济效益是新战略的关键，当人们思想上还没有彻底完成从重视速度到重视效益的转变时，实现新战略也就很难十分自觉。

战略转变不够自觉在经济体制改革上也有表现。例如，对于社会主义是不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有一个短时期曾经有过尖锐的争论，有的同志只同意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提法，而不赞成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提法。

第四，当前国民经济中存在的问题也说明战略转变尚未完成。

首先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还很重。经过这几年的改革，现在小企业一般比较活了，但是很多大中企业还没有搞活，有人估计大中企业中已经搞活的只占20%，其他80%要通过进一步改革来增强活力。同时



我们还面临着建设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任务，这不仅包括建立和完善资金市场、劳务市场，鉴于我国生产资料市场也远没有建立起来，因此还迫切需要建立和完善生产资料市场。迄今为止我国价格体系还很不合理，而如何有步骤地完成价格体系的改革，在保持物价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实现价格体系的合理化，也是十分艰巨的任务。现在投资失控和消费基金失控的现象也还存在，间接的宏观控制体系还未完善地建立起来，这些都是进一步改革要解决的问题。

其次是产业结构和国民经济比例方面存在很多问题需要解决。例如，产业结构和人民消费水平消费结构的变化很不适应，和扩大再生产的要求也很不适应。尤其是基础设施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很不适应，一、二、三次产业之间的关系很不协调。近年来由于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大，积累率又有升高的趋势。

再次是现有企业技术改造必须加快步伐。现在我国工业企业的设备普遍比较陈旧，多数行业的装备大体上是20世纪50、60年代的水平，冶金、化工、电力、机械、纺织、轻工等行业多数设备陈旧，性能差，效率低。以上海和沈阳两个我国最大的工业基地来说，由于长期忽视技术改造，设备老化技术陈旧的情况十分突出。上海的轻纺工业设备中80%属于40、50年代，辽宁工业企业具有70年代水平的技术装备只占10%，有1/3的设备“超期服役”。这种情况是造成产品质量差、物质消耗高、经济效益低的重要原因，迫切要求加快现有企业技术改造的步伐，以改变这种情况。

最后是提高经济效益的任务仍很艰巨，很紧迫。当前尤为重要的是要提高质量和减低成本。“六五”后期，一些地方和企业片面追求产值、忽视质量的情况相当严重。据对江苏苏北地区三个城市轻纺食品等行业的调查，83个产品中质量不合格的占78%。一些原来“信得过”产品也变成了“信不过”产品。“六五”计划要求工业可比产品成本每年降低1%到2%，除1981年降低1.2%以外，其他年份都没有完成任务，多数年份成本都有上升，1984年上升1.97%，1985年1月至7月上升4.1%。投资效益也改善不大，甚至还有下降，例如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下降，工程造价普遍上升。

以上这些问题当然有很多主客观原因，但是也足以说明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还没有完成。只有继续实现战略转变，坚决贯彻和不断完



善新战略，才能使这些问题得到较好的解决。

战略转变的若干经验教训

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可以分为两个主要方面：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和经济体制模式的转变。前一个转变是经济建设问题，后一个转变是体制改革问题。下面从战略正在转变这个角度，对经济建设和体制改革中的若干经验教训，作些粗浅的说明。

1. 经济发展战略转变的核心问题是提高经济效益。

“六五”时期的经验表明，经济发展从以速度为中心到以效益为中心，是经济发展战略转变的核心。抓住这一条，是保证战略转变顺利实现的关键。“六五”时期不少经济效益指标有所提高，尤其是社会劳动生产率和能源利用效益的提高，才使得国民经济能够持续均衡稳定地发展。但是经济效益提高的情况并不十分理想。经济效益提高较快的只有少数项目和少数部门，而且有些指标增长不稳定，有些指标还下降了。当前我国经济效益水平和历史上较好水平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和国外相比差距更大。以物质消耗来说，每生产1 000美元国民生产总值所消耗的公吨煤当量，我国为2.13，印度为0.80，日本为0.37，巴西为0.33；每年产100万美元工业产值所消耗的钢材（公吨），我国为451，印度为435，日本为213，巴西为203。由于各国产业结构不同，以上指标不完全可比，但也大致可以反映出我国和世界其他一些国家在经济效益上的差距。从“六五”的情况来看，我国经济效益还处于粗放经营的低效益型向集约经营的高效益型过渡的起步阶段，这个过渡是十分艰巨的。正如《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所指出的：“产品质量差，物质消耗高，经济效益低，是我国生产建设中长期普遍存在的痼疾，目前这个问题还远远没有解决。只有坚决改变这种状况，才能充分有效地利用各种资源，以较少的投入创造出更多的财富，也才能更好地满足人民多方面的需要和扩大出口。”我国提高经济效益有不少有利条件，但是也有很多不利条件。例如我国劳动力多，使得外延扩张和粗放经营较为容易；传统经济体制在相当一段时间还将存在并发生作用，使得提高经济效益缺少有利的社会经济机



制；其他如传统经济发展战略的影响以及自然经济观念的影响等等，也都不利于经济效益的提高。我们要足够估计这些不利条件，采取各种必要的措施，努力促进国民经济尽快过渡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

2. 要十分警惕盲目追求工业产值高速度的现象。

“六五”时期经验表明，在速度和效益的关系上，尽管党的指导思想已经转变，强调要实事求是地确定速度，把效益放在第一位，但是，广大干部思想的转变还需要一个过程，现在仍有可能出现片面追求速度尤其是片面追求工业产值高速度的现象，需要十分警惕这个问题。1985年1~6月份工业产值累计比上年同期增长23.1%，这种超高速增长包含着不正常的因素。但是有的同志却认为这是体制改革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必然带来的正常现象，提出要抛弃老经验，不再用传统经验对待当前的速度问题，并提出“要为高速度正名”。这就充分说明人们对速度问题的认识还不一致。应该看到，片面追求速度有相当广泛和深厚的社会经济原因。经济落后使人们要求尽快发展经济，传统体制也会产生一种追求数量增长的倾向。而且，这是一种带有国际性的传统战略思想，至今在国际上也还有影响。同时当前我国还存在着其他可能导致盲目追求速度的因素。例如，经过改革，企业有了发展生产的自主权和积极性，地区、部门、企业为了增加收入而努力提高速度，速度高了可以得到表扬、奖励和提升，因而大家互相攀比速度，缺少严格的责任制，速度过高产生了消极影响也不受惩罚，等等。

为了防止盲目追求高速度，要加强计划的科学性，使计划尽可能符合实际情况，发挥指导作用。制定计划时，对于各地区、各部门、各企业，要按照它们的地位和具体情况，在速度上区别对待。计划的贯彻执行也十分重要。“六五”时期的速度过快就全国来说不在计划的制定而在计划的执行。制定计划时强调留有余地，这是正确的，但制定计划后不加分析地号召提前和超额完成计划，这就不正确了，会导致片面追求速度。对计划应有不同的要求，有的要求提前和超额完成，有的则不应这样要求。还要建立和完善考核经济建设成绩的指标体系。工农业总产值这个指标虽有简明易行的优点，但缺陷也很多，以此为主要考核指标，必然导致片面追求产值而忽视效益。今后不宜再把这个指标用做考核选拔干部的主要指标。



我们反对盲目追求工业产值速度，并不是说工业不应该有一定的发展速度。速度和效益是相互制约的，速度过高不利于提高效益，速度过低也不利于提高效益。我们要把工业发展速度和整个国民经济的经济效益联系起来考察，在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争取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以较快的速度持续协调稳定地发展。

3. 不仅要重视农轻重的比例关系，而且要重视整个产业结构的合理化。

“六五”期间重视农轻重的比例关系，通过调整使农轻重比例趋于协调，这是一条成功的经验。但是，不仅农轻重各自内部的关系需要进一步调整，当前农轻重各占1/3的结构状况以及农业增长快于工业、轻工业增长快于农业的增长格局也带有经济大调整的烙印。需要根据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改造的要求进一步改进，在一段时期内大致形成工业增长稍快于农业、重工业增长稍快于轻工业的格局。

还要看到，产业结构包括多方面的内容，农轻重关系是其重要内容之一，但是不能取代产业结构的全部内容。过去习惯于用农轻重的分类法分析产业结构，这种分析法虽是必要的，但是也有局限性。它来源于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中关于两大部类的分类方法。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时，为了揭露其内在矛盾和经济危机的必然性，利用两大部类的分类方法就够了。但是，现在我们的任务是组织和指导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改造，仅仅把社会生产分为两大部类和农轻重部门就远远不够了。我们必须突破传统分析方法的局限，寻求一套新的理论和方法。

长时期来，我国一、二、三次产业之间比例失调，突出的表现是第三产业发展缓慢。1953~1980年第三产业平均年增长率为5.3%，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大大下降。“六五”时期开始重视发展第三产业，其增长速度开始加快。1981~1984年平均增长率为11.5%。从1961~1982年一、二、三次产业增长速度对比关系来看，低收入国家为1:2.3:1.9，中等收入国家为1:2:1.7，发达国家为1:2.4:2.3。“六五”时期我国为1:0.68:1.05。相对来说，我国第三产业的发展还是慢了。《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要求：“加快发展为生产和生活服务的第三产业，逐步改变第三产业同第一、第二产业比例不相协调的状况”。这是完全正确的。

产业结构中另一个突出问题是基础设施远远落后于直接生产部门。



根据一些国家的经验，基础设施的发展需要保持一定的超前系数。我国由于基础设施欠账过多，更需要加快发展。“六五”时期我国电力消耗系数为0.64，铁路货运系数为0.31，而按照要求，前者不能小于1，后者不能小于0.7。这些数字充分反映我国能源和交通运输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要求：“集中必要的财力、物力和技术力量，高质量、高效率地增设一批能源、交通、通信和原材料工业的重点工程”。这也是十分必要的。

现在我国还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在人口中占大多数，随着现代化事业的发展，将有几亿农业劳动者转变为非农业劳动者，这对产业结构将产生重大影响，必须及早研究和安排。根据“六五”的经验，农转非是历史的必然趋势，又是一个长过程。农转非的速度取决于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生产专业化、社会化、商品化的发展程度。正确地引导农转非将促使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就要求农转非的速度要以不影响农业的稳定增长为前提，离开农业的劳动力不要单纯往工业中挤，更不要过多地往大中城市转，而要走“离土不离乡”、三次产业协调发展的道路。

4. 在消除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上不能要求过高过急。

“六五”时期在地区布局的战略上也有明显的转变，纠正了过去偏重三线建设忽视东部地区的倾向，注意发挥东部沿海地区的潜力，并开始有步骤地开发中西部地区的资源。“六五”期间，在是否应该实行“梯度开发”上有过争论。我认为，机械地理解和实行“梯度开发”是不可取的，但是又不能否认，我国经济分布客观上存在着东、中、西部三大地带，并且在发展上呈现出逐步由东向西推进的客观趋势。正确的原则是，把东部地区的发展和中、西部地区的开发很好地结合起来，使它们互相支持，互相促进。有的同志提出“逆梯度发展”、“后进地区跳跃发展战略”，同样是不可取的。应该看到，在我国这样疆域辽阔、各地区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大国，在经济建设的地区布局上必须确立有先后、有重点的指导思想，不可能也不应该齐头并进，全面开花。实行地区平衡发展作为方向是可以的，但做到这一点需要长时期的努力，绝不能要求过高过急。

东部沿海地区已得到重视，但面临着一个转变生产方向的问题。正如《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所要求的那样：“东部地区，要着力采用



新工艺、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开发新兴产业，发展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和新型的高档消费品工业”。东部地区要主动考虑如何带动中部和西部的的发展。中部和西部要吸收东部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优势，促进本地区经济的发展，并加速全国经济布局的合理化。

5. 技术改造要增加投资比重，走出一条新路子。

如前面所说，为了加快现有企业技术改造的步伐，必须增加更新改造投资在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重。以往固定资产投资的分配，首先考虑基本建设的需要，其次才考虑技术改造的需要，现在为了适应内涵扩大再生产的需要，应该首先考虑技术改造的需要，同时考虑国民经济的投资能力，在保证社会固定资产更新周期逐步缩短的前提下，确定技术改造投资和基本建设投资的适当比例。我国当前技术改造投资的比重同国外相比也是低的，例如苏联 1960 年用于技术改造的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 55%，1970 年占 58%，1980 年达到 70%。美国 1947 ~ 1978 年投资总额中，技术改造的投资占 69%。我们设想，有必要在 2000 年以前，把社会固定资产的综合更新周期逐步缩短到 10 年左右，为此目的，“七五”期间需要把国家所有制单位技术改造的投资比重提高到 45% 左右。

企业技术改造还要走出一条新路来。过去长时期内，企业的技术改造由国家包办，企业缺乏改进技术的动力和压力。其结果原来比较先进的技术，过了一段时间也变得落后了。例如，“一五”时期兴建的一批技术比较先进的企业，现在技术已十分陈旧，只好由国家安排和帮助进行改造。显然，企业技术改造不能再走过去的老路。否则，即使国家帮助企业改进了技术，但技术仍不能不断地进步，若干年后，技术又严重落后了，又要国家来安排改造。我们要在体制改革中增强企业进行技术改造的动力和压力，使之经常主动地努力改进技术。“六五”期间首都钢铁公司等企业在技术改造上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他们的经验值得认真总结和因地制宜地推广。

6. 避免和克服国民收入超分配是一项重要而艰巨的任务。

“六五”时期的经验表明，正确处理积累和消费问题仍是一项重要任务。“六五”期间积累和消费的比例趋于协调，但是出现了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共同膨胀、国民收入超分配的现象。在超分配的国民收入使用过程中，存在着挖用往年库存、多余货币购买力不能实现以及通货膨



胀价格上涨等现象。

为了避免和克服国民收入超分配，首先要建立和完善投资调节机制，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六五”时期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情况是，1981年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减少，规模比较适当。1982年投资开始膨胀。1983年严格控制投资规模，收到一定效果。但1984年以来固定资产投资又以更大的幅度增长。1982~1985年间，固定资产投资平均每年增长22%，大大超过同期国民收入、工农业总产值和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结果又导致积累率上升。这是国民收入超分配的最重要的原因。

应该充分估计建立投资机制的艰巨性。现在和过去相比。投资主体、投资形式和投资决策都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经过改革，过去以中央为主体的局面已有改变，开始形成中央、部门、地方、企业以及全民、集体、个人和外资纵横结合的多层次的投资主体结构。投资形式也改变了单纯由国家财政拨款方式，形成了贷款、自筹、集资、合资、股份投资以及利用外资等多种投资形式的格局。与以上变化相适应，投资决策也有分散化的趋势。“六五”计划执行的结果，预算内投资超过计划14.2%，而预算外投资则超过85.2%。这种变化增加了控制投资规模的困难和复杂性。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说过，现在可能导致投资失控的因素很多。例如：（1）企业有了更多的资金；（2）企业有了扩大再生产的权力；（3）企业有扩大再生产的必要性；（4）投资多了生产发展就快，利润就多；（5）以进行技术改造名义扩大基本建设规模；（6）领导上强调速度，促使企业多投资；（7）速度快了光荣，而投资多才能速度快；（8）资金使用上的“大锅饭”制度依然存在，地区、部门、企业仍然热衷于争投资、等项目，等等。可见，控制投资的任务十分艰巨。

为了避免和克服国民收入超分配，还要注意控制消费基金增长幅度。这也不是容易的事情，因为也存在很多可能导致消费基金失控的因素。例如：（1）企业有了一定的分配权，可以多发工资奖金；（2）企业有了一定的定价权，可以通过提价增加收入；（3）在当前双重价格条件下，企业和个人有谋取更多收入的可能性；（4）领导为了讨好职工而发放过多的奖金和实物；（5）企业在工资上互相攀比；（6）职工收入和企业经营好坏挂钩后，客观控制没有跟上，导致职工收入过多；



(7) 职工生活还不富裕, 提高生活水平要求很多, 而收入高了就降不下来; (8) 多种经济形式经营方式共同发展, 也可能导致消费基金增加过多。此外, 宣传工作的片面性也会助长消费基金失控。可见, 控制消费基金也是相当艰巨的。

当前消费基金的分配中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例如, 在克服平均主义的同时如何防止收入差距过分悬殊, 如何处理好物价和收入的关系, 等等。这些问题都要认真研究和妥善解决。

7. 在改革中要紧紧抓住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这个增强企业活力的中心环节。

“六五”期间在增强企业活力上取得了明显的成绩, 但是如何估计改革的成就, 也有不同的看法。1985年讨论速度问题时, 有的同志认为, 工业高速度主要是新经济体制的作用, 传统体制已经无足轻重了, 产生片面追求产值动机的体制环境已在改革中逐渐消失。不久前又有人说, 我国经济机制已取得实质性进展, 经济的运行和发展正在摆脱旧模式, 开始在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基础上运转。我认为, 从一些重要方面看, 这种看法可能是把改革的成就估计高了, 不完全符合实际情况。首先, 从企业的自主权看, 虽然经过改革, 一部分企业有了自主权, 开始活起来了, 但是如前所说在国民经济中起骨干作用的大中型企业绝大多数还没有真正活起来。其次, 从市场的作用看, 尽管这几年发挥市场调节作用收到了相当大的成效, 但对市场的作用也不能高估了。例如生产资料市场还处于形成阶段, 严格来说许多重要的生产资料还没有形成正常的市场, 而且现在价格体系仍旧很不合理, 难以充分发挥促使生产力要素配置合理化的作用。再次, 从企业对于盈亏的责任看, 国有企业一般还没有实行自负盈亏, 资金“大锅饭”的情况依然存在。最后, 从企业的行为看, 尽管企业的利润动机、市场意识等都增强了, 但是, 由于政企职责不分、企业尚未实行自负盈亏以及卖方市场的普遍存在和市场上缺乏必要的竞争等原因, 传统体制下企业行为的特征并未根本改变, 可见, 绝不能说传统经济体制已经无足轻重了。

根据“六五”时期的经验, 一定要坚持把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说: “要使企业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 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主



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一切改革的措施都要有利于这个问题的解决。应该看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企业不自主经营固然不行，不自负盈亏同样不行，只负盈不负亏更加不行。企业实行了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才能真正成为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在这种情况下，企业才能具有提高经济效益的强大动力，并经受强大的压力，国家才有可能利用各种经济杠杆促进企业不断提高经济效益。企业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当然需要一个过程，但改革中要不断把这个过程推向前进。要环绕这个中心任务进行改革，防止离开这个中心任务，更不能和这个中心任务背道而驰。

8. 改革要力争配套。

“六五”期间，我国在大体明确了改革目标和方向的基础上，采取谨慎从事积极稳妥的方针，渐进地、分步骤地把改革推向前进。这种做法，在搞活经济的同时，避免了大的经济振荡，造成了有利于改革的形势。但是，由于改革没有一个周密可行的总体方案，有些改革措施不相衔接和配套，甚至相互矛盾，产生了消极作用，由于改革采取渐进的方式，势必一个较长时期内既有传统体制又有新的体制发生作用。由于新旧体制在运行机制、调控手段等方面存在着根本差别，也会产生很多矛盾。双重价格的矛盾就是突出表现。为了解决以上矛盾，要求在改革的各个阶段上力争各种改革措施协调一致，配起套来。这就要求认真研究各项措施的作用和利弊，研究如何使它们减少摩擦，发挥合力。

整个国民经济是一个巨大而复杂的社会经济系统，经济体制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为了保证改革顺利地、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在条件具备时需要制定改革的总体方案。在中国这样情况复杂的大国里，要求在开始改革时就有一个周密可行的总体方案，是不现实的。“六五”期间采取“摸着石头过河”的办法。但是，这几年来改革已取得了许多经验，方向和目标也更加明确了，实践中也有很多问题要求从总体上加以考虑和解决。因此，现在已有条件着手制定改革的总体方案。我们要在认真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深入研究改革的目标和步骤等问题，尽快制定出有科学根据并且切实可行的总体改革方案，更好地指导经济体制改革工作。



加快战略转变的过程

总结“六五”时期经济建设和体制改革的经验，概括为一句话，就是要继续坚定不移地进行战略转变，并且加快战略转变的过程。

为什么必须继续坚定不移地进行战略转变呢？因为，这样做，才能巩固成绩，发展成绩，才能较好地解决当前国民经济中存在的很多问题。只有这样做，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才有希望。“六五”时期的实践又一次表明，我国只有走提高经济效益的路，走技术改造的路，走以内涵扩大再生产为主的路，才能保证国民经济迅速健康地发展，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要求，加快现代化的进程。而为了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就必须同时实现经济体制模式的转变。从根本上说改革是为建设服务的。现在改革已成为世界潮流，社会主义各国都在进行改革。不改革，没有希望，不进一步改革，也没有希望。从我国当前情况看，已具备了把改革放在首位的条件。“七五”时期我们要坚持把改革放在首位，使改革和建设互相促进。这是继续进行战略转变的要求，也是加快战略转变过程的要求。

完成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是需要一个过程的。早在“六五”时期开始以前我国已经开始实行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而经过了“六五”时期，今后还必须继续实现这个转变。这就说明，完成战略转变需要一个比较长的时间。首先，产业结构的合理化需要一个过程。产业结构合理化不仅限于协调农轻重的关系，还包括改善一、二、三次产业的关系、改善基础设施和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关系，等等。从各国产业发展的历史看，建立一个比较合理的产业结构的任务都不是短时期所能完成的，而我国原来产业结构极不合理，同时面临着现代化的任务，要在逐步现代化的基础上完善产业结构，这样实现产业结构合理化就更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其次，完成经济体制改革也需要一个过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实质上是一次革命，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按照社会主义原则完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从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历史看，没有比较长的时间也难以完成改革的任务。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起点比较低，完成改革也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再次，传统的战略还有影



响。传统的经济发展战略有世界性，在我国又宣传执行了近30年，可以说是深入人心，影响是不能低估的。比较彻底地消除这种战略的影响，也需要一个过程。最后，新的经济发展战略需要充实和完善。以产业结构的改造来说，从过去片面优先发展重工业到重视农轻重协调发展，在战略上无疑是重大的进步，但现在看来，这个进步仍远不足以解决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任务。改革传统经济体制同样有一个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任务。而充实和完善新的经济发展战略也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还应该看到，我们在进一步实行战略转变中会遇到一些不利因素。例如，存在着有利于外延扩大再生产的主客观条件；双重体制使得有可能用老框框老套套来解决矛盾和问题；战略转变涉及人们的利益，有的人会由于暂时的利益给转变增加这样那样的阻力；随着经济发展模式和经济体制模式转变的深入，会遇到一些更加困难的问题，等等。但是，尽管有这些不利因素，我们还是一定能够加快战略转变的过程，胜利完成这个转变的。因为，一方面党的指导思想已实现了转变。事实证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而且一定能够保持党的马克思主义方针政策的连续性。另一方面，广大群众已经从战略转变中得到了很大的实惠，衷心拥护转变，决心把转变进行到底。继续实行新的经济发展战略是人心所向，而人心所向的事业是必定要胜利的。

怎样才能加快战略的转变过程呢？这要求在多方面努力。当前最迫切的，是要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第一，努力学习。战略转变过程中出现不够坚决不够自觉的现象，有些是同学习不够有关的，因此，很有必要对全体干部进行一次新战略的再教育。要组织干部重新学习党的十二大开幕词和报告、五届人大四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和《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等文件。第二，认真总结经验，尤其要总结“六五”时期贯彻执行新战略的经验教训，通过总结，加深对新战略的认识，增强实现新战略的自觉性。第三，重视研究理论问题。“六五”时期的经验也表明，研究理论问题十分重要。《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个理论概括突破了传统理论否认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框框，克服了很多模糊的乃至错误的认识，指明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和道路。这个事例充分说明，弄清理论是



极其重要的。为了加快战略转变我们也要更加重视理论研究工作。此外，还要保持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不论经济建设还是体制改革，都需要一个比较好的经济政治社会环境，安定团结则是最基本的条件。我们要消除一切不利于安定团结的因素，保持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保证和促进战略转变的完全实现。



我国沿海城市的经济发展战略问题*

沿海城市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为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必须制定正确的沿海城市经济发展战略，充分发挥沿海城市的作用。现在对于沿海城市经济发展战略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认为沿海城市应该采取出口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战略，要求以外贸为主攻方向，集中力量发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并按照这个要求调整经济结构；另一种看法则不同意上述主张，认为对外贸易虽然十分重要，但是笼统地提倡沿海城市采取出口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战略是不妥当的。分歧的根源在于对沿海城市经济的作用有不同的认识，本文拟就此谈一些粗浅的看法。

主张沿海城市经济应该采取出口主导型战略的同志，大都把沿海城市看成主要是海港，强调它们作为海港的作用，认为海港对沿海城市经济发展起着主导作用。例如有的同志认为：沿海城市的其他优势可以取代，惟独作为海港的地位优势则是不可取代的；沿海城市经济比内地经济发展快，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种地理位置上的优势；因此他们主张，沿海城市应该充分利用地理位置上的优势，主要发展出口或加工出口的外向型工业，采取出口主导型战略。有的同志还认为，目前我国大部分沿海城市已经具备了实现出口主导型战略的条件。我认为，这种看法是值得商榷的。

我们记得，1981年召开的中心城市座谈讨论会上，曾明确了我国大中城市一般都起着一个地区的经济中心的作用，少数大城市还起着全国的经济中心的作用。这个科学论断，既适用于内地城市，也适用于沿海城市。当然，沿海城市有其特点：地处沿海，起着海港的作用，海运

* 本文写于1982年12月，曾载拙著《中国式社会主义经济探索》（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



事业发达，是内外交流的枢纽。但是，这些特点并不否定沿海城市和内地城市的共性。只是沿海城市除了起着一般城市所起的那种经济中心的作用外，还起着某些特殊的作用。确切一点说，沿海城市作为经济中心，包含的内容更多一点。

沿海城市作为经济中心究竟有哪些作用呢？从我国沿海城市目前的情况看，它们的主要作用是：（1）工业生产中心。一般来说，沿海城市工业比内地城市更为发达，生产的社会化水平更高一些。（2）国内外贸易中心。沿海城市的商业比较发达，首先是所在地区的贸易中心，有些也是所在地区对外贸易的基地，即对外贸易中心。（3）交通运输中心。沿海城市的海陆空交通一般比较发达，是所在地区的交通运输中心，有些也是对外交通运输的中心。（4）财政金融中心。沿海城市的财政收入多，资金集中，大多是我国的财政金融中心。有些沿海城市也是经济信息中心。（5）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中心。沿海城市的文化教育事业比较发达，科学技术水平比较高，起着所在地区文化教育中心和科学技术中心的作用。

有些同志把沿海城市经济的作用，概括为对内和对外两个方面，并探讨这两个方面的关系。在一定意义上，这样概括是可以的，但是应该明确这两个方面的作用都是十分重要的。哪个方面更重要呢？我认为，这个问题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就目前情况看，一般地说，除了有些沿海城市是对外的作用更为重要外，多数沿海城市则应在重视发挥对外作用的同时，十分重视发挥对内的作用。沿海城市的发展离不开国内其他地区包括内地的支援，我们积极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是为了加快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现代化进程。从一些沿海大城市的具体情况来看，我国上海、天津、大连等沿海城市对外贸易是比较发达的，但目前出口额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也不是很高，有的不到10%，有的10%多一点，根据这种情况，怎么能说沿海城市对外的作用比对内的作用更加重要呢？

沿海城市作为经济中心，担负着支持和帮助周围地区及内地发展经济的义不容辞的责任。因为沿海城市经济比周围地区经济发达，比内地经济更发达，这就决定了沿海城市除了努力发展自己的经济外，还要推动、引导、促进周围地区和内地经济健康地迅速地发展。列宁曾说：“城市是经济、政治和人民的精神生活的中心，是前进的主要



动力。”^①毛泽东同志也说过：“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可以使我们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我国沿海城市促进周围地区和内地经济发展的潜力是很大的。近几年上海和河南开展了经济技术协作，这两个地区1980年的情况是，每百元固定资产实现的利润和税金，上海为83.5元，河南为19.9元，每百元固定资产实现的工业总产值，上海为285.1元，河南为89.9元，如果河南达到上海的水平，同样的固定资产可以使利润税金增加3倍以上，使工业总产值增加2倍以上。两地的经济协作已对河南经济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我们绝不能低估沿海城市作为经济中心带动内地经济发展的重大意义，绝不能低估沿海城市和内地开展经济技术协作的重大意义。这是促进我国整个国民经济健康迅速发展的正确途径，也是沿海城市经济健康迅速发展的正确途径。沿海城市要为今后20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多做贡献。应该怎样多做贡献呢？其一，是要使沿海城市本身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有较快的经济发展速度；其二，是要在帮助周围地区和内地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有较快的经济发展速度。这两个方面都是沿海城市可能和必须做出的贡献，我们不能把它看窄了，只看到前一方面而忽视后一方面。还要看到，沿海城市经济健康迅速的发展也依赖于周围地区和内地的支援。当然，沿海城市为了在翻两番中多做贡献，也应该在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但这也有赖于沿海城市和内地的加强联合和共同发展。只有沿海城市和周围地区及内地加强联合，才能更快地扩大出口，更好地引进先进技术，更有成效地利用外资。我们在贯彻执行“内联外挤”的方针时应该看到，内联是外挤的基础，外挤也是为了沿海城市经济和内地经济的共同发展和提高。

我们也不能忽视沿海城市的对外作用，即它们在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方面担负的任务。建设社会主义绝不能走闭关锁国的道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指出：大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在对外方针政策上是有原则区别的。但是社会主义生产也是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基础上的社会化大生产，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是十

^① 《列宁全集》第19卷，第264页。



分重要的。这样做，才能利用国际分工的优越性，才能利用国外的资金、市场、资源和科学技术，这对于加快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是十分必要的、有利的。

在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中，沿海城市处于特别有利的地位，担负着特别重要的任务。以扩大对外贸易来说，沿海城市由于地理位置、交通运输、生产技术水平、对外经济联系等有利条件，在全国进出口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利用外资和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方面，也有更为有利的条件和更重要的任务。过去由于帝国主义对我国进行经济封锁，加上在“左”倾指导思想下一度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使我国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受到了很大限制，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尤其是对沿海城市经济发展产生了消极影响。现在有些同志对于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的意义还认识不足，对沿海城市在这方面的重要作用 and 任务也认识不足，因此，我们有必要提高这方面的认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执行对外开放的方针，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党的十二大肯定了这个方针，指出：“实行对外开放，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则扩大对外经济技术交流，是我国坚定不移的战略方针。”我们一定要坚决贯彻这个方针，要努力创造条件，充分发挥沿海城市在扩大对外经济技术交流方面的作用。

但是，对于扩大对外经济技术交流也有一个正确理解的问题。例如有一种看法，认为沿海城市经济的首要任务是面向国际市场，往外挤，实行内联的目的也是为了外挤。这种理解是不全面的。

国务院领导同志曾指出：我国沿海地区和内地之间，在经济上应有合理的分工，发挥所长，使整个经济发展得更快。沿海地区要面向国际市场，发展对外贸易，加强国际经济合作和技术交流，以加快经济的发展，提高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水平；要同内地实行有效的经济联合，为发展内地经济服务，带动内地共同提高。又指出：在对外经济技术交流中，要注意发挥沿海城市的优势。中国东部和西部在经济上是存在着矛盾的。从长远看，完全靠内地供给沿海城市原料，加工成商品再销到内地，这个路子会越来越窄。要加强沿海和国际市场的联系，上海等城市要内联外挤，所需原材料逐步转向国际市场，商品要往外销售，以改变原材料紧张、销路有困难的局面。这深刻地说明了沿海城市实行内联外挤的必要性以及内联与外挤的关系。



国务院领导同志的指示告诉我们：发展对外贸易，扩大对外经济技术交流是沿海城市的一项重要任务。但是沿海城市还应该为发展内地经济服务，通过与内地实行联合，带动内地共同提高。这就是说，内联也是沿海城市的一项重要任务。由此可见，积极打入国际市场虽然是沿海城市的重要任务，但并不是全部任务，也不能说这是比内联更为重要的任务。同时，沿海和内地，东部和西部都要富裕起来，因此它们既要有合理的分工，又要有有效的联合，沿海城市在实行外挤时绝不能忽视内联的任务。内联当然有利于外挤，但内联的目的是为了使沿海城市和内地共同富裕起来，加快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而不仅仅是为了外挤。

有一种说法，认为实行出口主导型战略是沿海城市经济发展的一般趋势。这个问题值得认真探讨。世界上有些国家的沿海城市确实采取了出口主导型战略，对于某些资本主义国家来说，实行这种战略也是必要的。因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的目的是为了剩余价值，因此，国内市场还是国外市场，国内资源还是国外资源，国内各个地区的经济是否共同提高，对资本家来说都服从于追求剩余价值的目的。尤其是有些资本主义国家，国内既无必要的资源，又无广大的市场，发展经济必须采取出口主导型战略，因而必须利用其沿海城市作为推行这种战略的据点和基地。可见，对有些资本主义国家来说，这种说法是有一定的根据的。

问题在于，对有些资本主义国家的沿海城市适用的经济发展战略，未必适用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沿海城市，尤其是未必适用于我国的一切沿海城市。我国国土辽阔、资源丰富，有十亿人口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国内市场。当然我国需要扩大对外贸易，而且像深圳等经济特区城市采取出口主导型战略也是必要的，但是我国沿海城市不宜于都采取出口主导型战略。五届人大四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说：“我们要利用两种资源，首先是国内资源，其次是国际资源；开拓两个市场，首先是国内市场，其次是国际市场”。我认为，这里的“首先”和“其次”的次序，是有充分科学根据的，是非常正确非常重要的，对于全国来说是这样，对于许多沿海城市来说也是这样，这个“首先”、“其次”的次序在一般情况下是不能颠倒的，而主张沿海城市都实行出口主导型战略的主张则颠倒了这个次序。

主张我国沿海城市实行出口主导型战略的同志常常以新加坡等地为例，认为新加坡等地可以这样做，我们也就应该这样做。这里涉及到如



何看待新加坡等地的经验。毫无疑问，新加坡等地利用国外资源、面向国际市场、在国际市场上进行竞争的经验，很多是值得借鉴的，研究借鉴它们的经验也是必要的。但是，这不等于我国的沿海城市都应该和它们一样实行出口主导型战略。我国的沿海城市和新加坡等地相比有一些重要区别：一是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二是有广大的内地可以依靠，三是有广大的内地需要支援。这些区别决定了我国沿海城市不能都和新加坡等地一样实行出口主导型战略，显然应该学习它们扩大出口、利用国外资源的经验。如果我国沿海城市都采取出口主导型战略，一则会导致过分依赖国外的市场和资源，而且是不现实的；二则会脱离广大的内地，这些都是不利于社会主义四化建设的，也是不利于沿海城市经济的发展的。

认为我国沿海城市目前大部分已经具备实现出口主导型战略的条件，这种看法似乎是过于乐观了。目前我国沿海城市是具备内联外挤的条件，但是不能说都已经具备了实现出口主导型战略的条件。因为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如前所说，即以上海、天津、大连等外贸发达的沿海城市而论，出口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也还不大。沿海城市有些产品现在内销尚无竞争力，又怎么可能轻而易举地挤向国际市场，使国外市场成为主要市场？而且实行出口主导型战略并不仅仅是决定于自己的情况，还决定于国际市场的情况。从目前国际市场看，我国争取尽量多挤进一点是有可能的，而沿海城市都采取出口主导型战略则风险太大，是不合适的。国务院领导同志谈到沿海城市应该加强同国际市场的联系时，一再强调“只能逐步转”，“不要一下铺得很开，要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这是有深刻意义的。有些国家和地区由于对出口前景估计得过分乐观，因而盲目扩大利用外资和引进技术的规模，导致严重的后果，这方面的教训，我们也要引以为戒。

综上所述，从充分发挥沿海城市对内和对外两个方面的作用着眼，我国一般沿海城市的经济发展战略可以大致表述为：因地制宜，发挥优势，加快科学技术进步，提高经济效益，走内涵扩大再生产的道路；使本身经济健康迅速地发展，并带动周围地区和内地经济健康迅速地发展；在同内地实行有效经济联合的同时，积极扩大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发展对外贸易。



牢固树立持续稳定协调发展 经济的指导思想*

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明确了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经济的战略指导思想，要求我们坚决防止片面追求过高的发展速度，始终把不断提高经济效益放到经济工作的首要位置上来。这是总结我国 40 年来经济建设正反两面经验得出的正确结论，是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国情结合起来的范例，也是对我国经济学界一个时期来这个问题上争论的科学总结。坚决贯彻这个战略指导思想，并继续坚定不移地执行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方针，我们一定能克服当前经济困难，保证今后国民经济更加健康地发展。

经济发展速度是受一系列客观条件制约的。以我国工业发展速度来说，就受到以下条件的限制：（1）资金积累的限制。我国经济还不发达，积累率不能过高，积累的资金也要在各个部门合理分配，不能过多地用于工业。（2）农业和其他部门的限制。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我国工业还不能说已有了牢固的农业基础。农业的发展速度也受到限制，因而也在多方面限制着工业的发展速度。交通运输对工业发展速度的制约作用也是很明显的。（3）工业本身的限制。诸如采掘工业、原材料工业的落后和工业经济效益较差等情况都限制着工业的发展速度。（4）对外贸易的限制。如进出口能力也限制着工业发展速度，利用外资也受到很多因素的限制。这当然不是说我国经济发展不能有较高的发展速度。我国完全有可能实现 20 世纪末翻两番的目标，这个发展速度是不算低的。但是，我们不能不顾条件盲目追求过高的发展速度。

我国经济发展的历史一再表明，片面追求过高的发展速度必然导致

* 本文原载《光明日报》1989 年 11 月 24 日。



种种严重后果。一是经济过热，社会总需求膨胀，结果或者是积累消费相互挤压，比例失调，或者是国民收入超分配，或者是两者兼而有之。二是工农业比例失调，主要是工业挤农业，农业发展受到损害，难以支撑过快发展的工业，带来一系列困难。三是工业和能源、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比例失调，工业内部一些部门之间也比例失调，已有的工业生产能力也难以发挥出来。四是忽视经营管理和技术进步，企业经济效益下降，宏观经济效益也下降。这些后果累积到一定程度，由于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和经济效益严重下降，过高的发展速度也就再难维持，导致经济衰退，速度下降，甚至会出现大上后大下的局面。这种经济不稳定的局面在一定的条件下还会引起社会不稳定。所以，我们必须吸取历史教训，坚决克服经济建设中急于求成的指导思想。

经济改革也要有利于贯彻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方针。我们进行经济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的发展。长期持续稳定协调地发展国民经济也是我国发展生产力的惟一正确道路。因此，经济改革也要有利于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有的同志认为经济改革就是为了加快经济发展速度，这也是一种片面认识。我们不能把发展生产力和加快发展速度完全等同起来。从我国现实情况看，经济改革一定要有利于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合理化，有利于促进企业经营管理水平的提高，有利于促进科学技术进步，有利于促进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的提高。经济改革实现了这些要求，经济发展速度也就会加快，我国经济也就能够以较高的速度持续稳定协调地发展。这种平平稳稳地发展经济，看来似乎慢，实际上比大上大下要快，而且效益好，实惠多。我们常说要处理好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关系，这也要求在经济改革中贯彻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经济的战略思想。

在经济改革中也要注意克服急于求成的思想。邓小平同志说过：改革总要遇到障碍，所以我们要谨慎，不能太急，太急了要出毛病。我们往往忽视改革的困难，在改革中急于求成。我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经验都表明，绝不能低估改革的艰巨性和长期性。经济改革是包括企业改革、市场发育、宏观经济管理改革等分支系统的巨大系统工程，这些分支系统间又有错综复杂的关系，完成这个系统工程是极其艰巨的任务。经济改革还涉及到权责利的再分配，处理好改革中各种权责利关系也很困难。经济改革还是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会遇到很多新的理论和实践



问题，不能说所有的问题都有了明确的答案，这也是困难。这些困难决定了改革必然是长期的。因此，我们要牢记邓小平同志所说的：改革既要大胆坚决，又要细心谨慎。这样也才能够使改革有利于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地发展。

应该清楚地看到，牢固树立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经济的指导思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仅我国长期存在着一种速胜论思想，把经济建设看得过分容易，从主观愿望出发，提出脱离实际的高指标，而且在国际范围内也存在着一种急功近利的战略思想，表现为只考虑眼前而不顾长远，只顾局部而不顾全局。例如，为了发展工业而不考虑农业和生态平衡，强调当前消费而不顾积累和不为子孙后代着想，不顾一切地追求当前的高速度而不顾比例、效益和长期的发展速度。这种急功近利的战略思想，对我国也是有影响的。此外，我国当前还存在着片面追求高速度的一些客观条件。为了牢固树立正确指导思想，我们要认真学习五中全会公报和《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以及有关文件，而且要结合我国和其他国家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深刻认识这一指导思想的正确性和科学性，并认识急于求成思想的错误和危害。我们要认真领会五中全会所强调指出的无论是治理整顿期间还是治理整顿任务完成以后，都必须始终坚持长期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经济的方针，并坚决贯彻到经济工作和经济研究工作中去。



重视城乡经济关系战略问题的研究*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和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我国工业化、商品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大大加快。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的城乡经济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从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关系看，经济发展过程引起城乡经济关系的变化，而城乡经济关系的变动又反过来影响（促进或制约）经济发展的进程。因此，加强对我国城乡经济关系这一战略问题的研究，不仅有助于考察经济发展的结果，而且更重要的是有利于探索促进经济稳定和协调发展的途径。

一、城乡经济关系研究的内容

在国内外的有关文献中，对城乡经济关系的内容加以界定的论述并不多见，这方面的研究似乎还未能有一个相对确定的范围。因而要对这个问题进行系统研究，首先必须对它的研究内容加以讨论和明确，并以此为基础来构建相应的研究体系。

城乡经济关系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划分，而由此得到的每个方面，只要能够相对独立，就可以而且应当构成城乡经济关系研究的一个内容。以此为依据，我们必须选择几个具有普遍覆盖面又不交叉重复的划分口径。从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的关系看，符合上述要求的划分口径大概有社会再生产过程、产业发展关系和生产要素流动三个方面，它们反映了城乡之间经济变动的最基本关系。从这几个角度来进行划分，可以得到城乡经济关系研究的基本内容，再加上城乡经济关系与有关方面的

* 本文系作者与郭克莎合作，原载《中国工业经济研究》1993年第5期。



主要联系，就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体系。

从社会再生产过程看，在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四个环节中，城乡之间都有着密切关系。生产方面的关系主要表现为城乡分工关系，包括工农业关系和其他产业部门的分工关系。其研究内容主要是工农业的增长关系、相互依赖性，二者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模式，以及对于宏观经济协调发展的作用。城乡交换关系是以城乡分工关系为基础的，因此这方面的研究内容主要围绕着工农业产品的交换关系而展开，包括它们的比价关系（“剪刀差”问题）、供求相互制约关系、城乡流通渠道和市场结构等问题以及对于社会产品实现过程的意义。城乡之间的收入分配关系以城乡的分工和交换关系为基础，它的研究内容主要是城乡的不同收入分配形式和特点，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及其变动关系以及这方面对于整个收入分配关系的影响。城乡消费关系是指城乡居民生活消费方面的差异、联系和相互影响，它是以城乡的交换关系和收入分配关系为前提的，主要研究城乡居民的不同消费水平、消费特点和消费结构变动趋势，城乡消费趋同现象及其动因和影响以及协调城乡消费关系对于整个消费关系的意义。

从城乡之间的产业关系看，其研究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城乡工业的发展关系。研究乡村工业的发展及其在农村工业化、商品化和城市化进程中的地位，它对城乡经济关系的影响，乡村工业与城市工业的发展关系（尤其在技术、人才和部门结构方面的关系），城乡工业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模式及其与工业现代化的关系。（2）城乡产业结构的变动关系。研究农村产业结构与城市产业结构的联系和演变趋势，城乡投入结构的不同特点，农村产业结构（种植业结构、大农业结构和三次产业结构）变化对于城市产业结构的影响，特大城市的产业结构及其与城郊产业结构的关系，城乡产业结构变动（高度化和协调化）对于整个产业结构变动的意义。（3）城乡企业的发展关系。这方面的研究内容似乎不多，但仍有加以分析的必要。主要考察城乡企业的不同发展特点和相互关系，各类乡镇企业的发展趋势及其对城乡产业结构变动和城乡经济关系的影响，城乡企业协调发展的依据、条件和模式。

从生产要素的流动看，城乡之间的要素流动关系及其研究内容主要包括：（1）农业劳动力的转移。研究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其他产业转移的过程、方式和特点，揭示城乡就业形式的差异及影响，探索劳动力合



理转移的模式、条件和途径（对所谓“盲流”或民工潮问题加以分析），以及与劳动力资源总体配置的关系。（2）城乡的资本流动问题。研究城乡之间储蓄—投资的不同转化机制，城乡投资（总量和结构）的变动关系，城乡的资本融通问题，以及对于整个投资机制协调的意义。（3）城乡的技术和人才流动。研究城乡的技术联系和协作及其与技术进步的关系，城乡的技术流通渠道与技术市场，城乡的人才流动和人才市场以及对于人才资源有效配置的作用。（4）农村城镇化问题。研究农村城镇（市）化的方向、速度和模式，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和土地的使用问题，相应产生的“城市病”问题，市、镇、乡的经济联系问题，城乡市场的扩展和第三产业的发展问题，城乡经济一体化问题。（5）城乡要素流动与资源配置模式。研究城乡之间劳动力、资本和技术流动的协调关系，要素流动引起的城乡相对生产率（包括单一要素和综合要素生产率）的变化，城乡的相对资本与劳动力比率和资源配置模式的变动，同时也应探讨城乡之间要素密集产业的发展关系与社会资源的总配置效应。

从城乡经济关系与有关方面的主要联系看，大体可分为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城乡经济关系的外部条件，包括：（1）城乡经济关系与地区经济发展。研究不同地区（如发达与落后地区、沿海与内地等）城乡经济关系的特点，各地区经济发展（工业化进程）与城乡经济关系变动的关系，城乡之间与地区之间的协调发展问题及其二者的相互关系。（2）城乡经济关系与人口和环境。研究城乡人口的增长趋势、变动特点及其对城乡经济关系的影响，工业化过程中城乡环境条件的变化及影响，城乡经济发展与人口和环境的协调关系。（3）城乡经济关系与城乡社会关系。研究城乡社会关系的基本内容（城乡的差异和联系）及其在工业化、商品化和城市化过程中的表现，城乡社会与经济关系的相互渗透和相互影响，城乡经济关系与社会关系的协调和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统一。

另一部分是城乡经济关系与体制改革的关系，包括：（1）城乡经济关系与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城乡经济体制的不同特点，城乡经济体制对城乡经济关系的影响，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对经济体制改革的依赖作用。（2）城乡经济关系与教、科、文体制改革。研究城乡的教育、科研和文化体制及其对城乡经济关系的影响，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对教、



科、文体制改革的要求，教、科、文体制改革的进程。(3) 城乡经济关系与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城乡政治体制的不同形式和特点，城乡政治体制对城乡经济关系的作用和影响，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

以上五个部分的研究内容是具有逻辑关系并依次展开的。城乡之间在社会再生产过程（四个环节）的关系反映了城乡经济运行的基本关系；城乡之间的产业关系反映了城乡产业部门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变动关系；城乡之间的要素流动反映了城乡各类资源的投向和配置关系；这三者之间及其构成的各个方面，从城乡经济发展的角度看实际上都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把它们独立开来加以研究，只是为了使研究线索更加具体明确，从而提高理论分析的深度。而研究城乡经济关系的外部条件以及与各种体制改革的关系，则是为了考察城乡经济发展的社会经济条件和体制条件。因此，连接以上内容的一条主线，就是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问题，即经济发展过程引起城乡经济关系的变化，而城乡经济关系的变动必须有利于经济发展进程的加快，后者正是研究的中心内容。

同时，要对中国的城乡经济关系加以系统研究，上述各方面的研究内容一般都应包括以下几个层次：(1) 对历史演变过程加以考察（特别是考察改革开放以来的变化）。(2) 对现状、特点、问题和发展趋势加以分析。(3) 进行相应的国际比较（与发达国家的历史和发展中国家的现实相比）。(4) 考察改革开放带来的结果和影响。(5) 关于协调关系或协调发展的模式（原则）及其对于整个经济发展的意义。(6) 对相应政策和体制的分析。

二、城乡经济关系研究的特点

城乡经济关系研究的核心问题在于“关系”二字，它的研究特点就从这里产生。城乡经济关系通过很多方面表现出来，而每一个方面的研究都包括三个问题：一是城市的经济问题；二是乡村的经济问题；三是两者之间相应问题的关系。如果前两个问题都是较为明确的，那么研究过程就可以直接从“关系”展开。由于关系问题是研究的目的，因



而即使在论述城市问题或乡村问题时，也必须从二者共同的或相关的内容去加以考察，否则就等于偏离了研究主题。至于研究城乡经济关系与有关方面的关系问题，就更是以“关系分析”为重点。

正是城乡经济关系研究的上述性质或内在规定性，使它的研究过程具有以下几个明显特点：

第一，它重视对“差别”问题的研究。

在我们的研究中，城乡经济差别包括了工农业差别（即涉及到三大差别的两大方面），它是我们研究城乡经济关系的一个出发点。从历史上看，城乡经济差别的产生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并曾推动了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当社会生产力水平发展到相当高度时，城乡经济差别将会趋于缩小以至消失（如一些发达国家就开始出现这种现象），但在生产力水平尚未达到这个高度之前的一定发展阶段上，城乡经济差别还会有某种扩大的趋势。城乡经济差别的缩小或扩大都可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并非差别扩大就一定阻碍生产力发展。原因在于城乡经济差别的某些方面在一定限度上的扩大可以起到加快工业化进程和经济发展的作用；但如果差别不合理地扩大，则会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的因素。

研究城乡经济关系的“差别”问题需要考察城乡经济差别的具体表现形式，差别的程度，以及它对于经济发展作用如何。

在城乡经济关系的各个方面中，城乡经济差别是普遍存在的。在城乡分工关系中，它表现为工农业生产水平、生产条件和增长速度的差别；在城乡交换关系中，它表现为工农业产品价格水平、供求状况以及城乡流通渠道和市场结构的差别；在城乡收入分配关系中，它表现为城乡收入分配形式和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差别；在城乡消费关系中，它表现为城乡居民消费水平、消费结构和消费方式的差别；从城乡之间的产业关系看，城乡工业在技术、人才和部门结构方面存在着差别，城乡产业结构在产业构成和演变趋势上存在着差别，城乡企业在生产规模和发展方向上存在着差别；从生产要素及其变动看，城乡之间的差别就更加突出：城乡的劳动力素质和就业形式具有明显差别，城乡的资本形成和投资机制具有明显差别，城乡的技术和人才及其变动具有明显差别，城乡的人口增长和土地使用具有明显差别，相应地，城乡的要素生产率（劳动生产率、资本生产率和综合要素生产率）、资本与劳动比率、资本系数、劳动系数以及资源配置模式和它们的变动过程都具有明显差



别，如此等等。可以说，正是有了城乡经济差别，才产生了城乡经济关系问题，并使其成为一个重要的经济问题。因此，研究城乡经济关系必须从研究城乡经济差别开始，对“差别”问题的考察和分析不仅覆盖整个研究范围，而且贯穿于整个研究过程。

第二，它重视对“联系”问题的研究。

城乡经济联系是城乡经济关系的基本表现或存在形式。在城乡经济关系的各个方面以及城乡经济关系与其他方面的关系中，联系都是普遍存在和发生作用的。城乡之间在工农业生产、产品供给和需求、收入分配变动和生活消费过程等方面的联系，是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城乡经济关系展开的基础，同时也是城乡产业关系变动和生产要素流动的条件。我们研究城乡经济关系与地区经济发展、人口和环境、城乡社会关系以及与经济体制改革、教科文体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关系，也是以它们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内在联系为前提的。这样，离开了对“联系”的分析，对“关系”的研究就无从进行。

我们研究城乡经济关系，目的在于加快城乡经济的发展以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而城乡经济联系则是城乡经济发展的条件。如果这种联系被割裂，那么城市经济或乡村经济任何一方面的孤立发展都是不可能的。由于城乡经济构成了整个国民经济，联系成为发展的条件，所以城乡经济联系的脱节或破坏必然不利于或阻碍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就增加了研究联系问题的重要性。因此，像研究城乡经济差别一样，对城乡经济联系的研究也是具有普遍意义和贯穿始终的。

第三，它重视对“协调”问题的研究。

城乡经济关系的协调问题包括两层含义：其一是城乡经济运行过程的协调；其二是城乡经济发展过程的协调。城乡之间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关系主要表现为前一个层次的协调，城乡之间的产业关系和要素流动主要表现为后一个层次的协调，而城乡经济关系与有关方面的关系则包含着两个层次的协调。我们研究城乡经济的关系，实质上是研究城乡经济的运行机制和发展机制，其中心内容就是研究如何达到这两个层次的协调并实现两种协调的统一。城乡经济的协调运行是整个经济协调运行的一个重要方面，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则是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这就使城乡经济协调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城乡经济差别和经济联系的普遍存在，使协调成为必要，而且具有



普遍意义。因而城乡经济关系的每一个方面都有一个协调问题。同时，城乡经济关系的各个方面的展开，都可能出现失衡的情况，不论是运行关系失衡还是发展关系失衡，都需要协调。城乡经济关系的两个层次的协调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城乡经济的协调运行是协调发展的基础，而协调发展则可以反过来促进协调运行。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是城乡经济持续和稳定发展的重要保证，从而起着加快国民经济发展的作用。

正是协调问题的普遍存在和突出意义，使对它的分析和探讨成为城乡经济关系研究的一条主线，并成为体现“关系”研究特征的一个最根本方面。

城乡经济关系研究的以上三个特点，都是与“关系”问题的内在规定性密切相关的，因而它们之间是统一的。为了系统深入地研究城乡经济关系，必须把对“差别”问题的考察、对“联系”问题的分析和对“协调”问题的探讨结合起来，并贯通于研究内容的各个方面和研究过程的始终。

与研究过程的特点相适应的是研究方法的特点。

由于城乡经济关系研究属于实证研究的范围，尤其对处于工业化迅速演进阶段，商品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很快，并且各方面的变动都受到经济体制和其他体制变革影响的中国城乡经济关系的研究，需要对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加以概括和分析，对进一步发展演变的趋势、特点进行探索和揭示。因此，研究过程中运用的主要是实证分析方法。在这个基础上，与上面的研究特点相一致，我们应较多地采用以下几种具体的分析方法：

(1) 比较分析法。城乡经济差别的各个方面及其变动趋势是不一致的，只有运用充分的资料来对每个方面进行具体的比较分析，才能得出一些切合实际的判断和结论。同时，发达国家在这方面有不少历史经验可供借鉴，通过与其中大多数国家相同发展阶段（工业化和人均收入所处阶段）的有关情况进行比较，可以从中发现我国的特点和存在的问题。

(2) 联系分析法。城乡经济联系既普遍存在，又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只有对各个方面的经济联系及其变动特点加以细致考察和深入剖析，才能系统地揭示城乡经济的内在联系及其变化趋势。



(3) 协调分析法。即对城乡经济关系的协调过程加以全面分析的方法。包括揭示城乡经济运行过程和发展过程的不协调(失衡)表现及动因,阐明各个协调过程的基本原则和不同特点,分析实现协调目标所需的条件和可能遇到的问题,并探讨整个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的合理模式和可行途径(即分析协调模式的选择问题)。

三、城乡经济关系研究的意义

加强对城乡经济关系的系统研究,既是经济实践提出的一个迫切要求,又是经济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任务。它对于把握我国城乡经济关系的现状、特点、问题和发展趋势,对于弄清城乡经济在运行和发展过程中的内在关系,对于探索促进我国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的途径,以及为城乡经济政策和体制改革提供理论依据,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第一,有助于系统把握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城乡经济关系发生的变化。

经济发展带来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引起了社会需求结构和生产结构的变化。在工业化的过程中,上述结果同时表现为城乡经济关系的变化。由于工农业增长水平的不同和城乡交换关系的变动,城乡居民的收入关系和消费关系相应发生变化。在工业化的不同阶段,城乡经济差别经历了由不断扩大到逐渐缩小的过程。在工业化迅速发展的初期阶段,生产要素(劳动力、资本、技术、土地和人口)大量向城市集聚,这带来了城市工业的扩张、第三产业的发展 and 农村城市化的过程;但在工业化的中后期阶段,资本、技术和人才部分地向农村回流,它引起了农业部门资本与劳动比率的提高,生产技术水平的上升和农村产业结构的变化。这样,在上述过程中,城乡之间的生产水平、流通水平、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的差别就表现出一种从明显扩大到逐渐缩小的趋势,而在不同的国家(尤其制度条件不同的国家)中,这种一般趋势又具有一些不同的变动特点。

从建国后到改革前,在工业化迅速推进的过程中,我国城乡经济关系的变动是不协调的,城乡经济差别有不合理扩大的趋势,工农业关系



经常陷入失衡状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速度很快,人均收入水平在人口较快增长的条件下仍较大幅度提高,同时,工业化在程度较高的基础上继续演进,城乡的需求结构和生产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城乡经济关系的变动趋势和特点如何呢?工农业发展关系失衡和交换关系扭曲的状态有没有明显改善?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的差距是扩大还是缩小?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农村城镇化过程中存在什么问题?资本、技术和人才是否有向农村回流的表现?城乡之间各种生产要素的流动关系是否协调?城乡产业结构的变动关系是否合理?我国城乡经济关系的变化与其他国家相比有哪些不同特点?下一阶段的变动呈现出什么态势?对于这些问题,只有通过城乡经济关系进行系统的实证分析,才能有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和较为准确的把握。

了解了我国城乡经济关系的变化,便可以进一步分析我国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发展过程对于增进城乡居民的福利起了什么作用,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是否伴随着相应的社会进步。这对于认识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明确下一步经济发展的方向以及与社会进步的关系,具有明显意义。

第二,有助于深入认识城乡经济在运行和发展过程中的内在关系。

在经济理论研究中,城乡经济关系的研究可以说是一个薄弱环节。虽然对其中的一些问题,如工农业关系、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农业劳动力的转移等问题有过不少研究文献,但总体上说,对城乡经济关系缺乏一个系统的研究,因而没有从理论上揭示出城乡经济在运行和发展过程中的内在关系。

然而,城乡经济的运行和发展在国民经济的运行和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国民经济可以从不同的方面来划分,从块块的角度分,它由各个地区经济所构成;从条条的角度分,它由各产业部门或职能部门所构成;而从条块交错的角度看,它就由城乡经济所构成。国民经济的协调运行,依赖于地区经济、产业部门、职能部门和城乡经济的协调运行,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也取决于以上几个方面的协调发展;其中任何一个方面的运行或发展陷入失衡状态,都必然影响国民经济在运行和发展过程中的协调关系。由于城乡经济的运行和发展关系同其他方面一样,在国民经济中具有不容忽视的地位,因而要研究后者就必须研究前者。

另一方面,城乡经济的相互依赖性也决定了它们之间的运行和发展



关系的重要性。在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的条件下，城市经济与乡村经济之间，离开了一方的支持和依托，另一方的运行和发展都是不可能的。这样，城市经济的运行关系和发展关系还分别影响着城市经济、乡村经济的运行和发展。

根据上述分析，从理论上对城乡经济运行和发展的内在关系加以探索和揭示，就显得十分必要。而这就必须对城乡经济关系的历史、现状、变动特点和发展趋势进行系统研究和深入分析，才能从中发现城乡经济运行和发展过程中带有规律性和必然性的东西，从而上升到理论高度，去对它们的内在关系加以认识和把握。显然，认识和把握这种内在关系，对于促进城乡经济以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协调运行和发展，是有很大意义的。

第三，有利于寻找促进我国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的合理途径。

无论是了解城乡经济关系的变化，还是弄清城乡经济运行和发展的内在关系，目的都在于促进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这是系统研究我国城乡经济关系的根本出发点和最主要意义。了解变动过程是为了弄清内在关系，弄清内在关系则是为了促进协调发展，协调运行的作用也在于协调发展。而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则具有两个方面的意义：（1）有利于加快城市经济和乡村经济的发展并提高发展效率。（2）为更高层次的协调发展即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创造条件。

通过对我国城乡经济的各个方面进行系统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城乡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失衡表现及其动因，从而明确消除不协调因素的基本目标；通过研究城乡经济关系与其他方面的关系，如与地区经济发展、人口和环境、城乡社会关系以及城乡经济体制、城乡教科文体制和城乡政治体制的关系，我们可以弄清影响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的各种外在因素，从而明确协调城乡发展关系的主要内容；特别是，通过分析城乡现实关系存在的问题和矛盾，我们可以寻求促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的合理途径，从而加快城乡协调发展的进程。

第四，可以为城乡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城乡体制改革的推进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城乡经济的运行和发展是否协调，与城乡之间的政策和体制有密切关系。我国目前城乡经济关系中的一些扭曲状态和失衡表现，很大程度上就是由过去的政策失误和体制问题造成的。例如，工农业产品价格



“剪刀差”政策，使城乡交换关系长期处于扭曲状态，并影响了工农业协调发展以及城乡的收入分配关系和消费关系；“以粮为纲”的政策使农村产业结构单一化，农业产业结构失衡，同时就妨碍了城乡产业结构变动关系的协调；投资政策的不合理即投资过度向城市倾斜而农村资金投入相对太少，导致城乡经济的过度不平衡发展，农村经济发展过于缓慢，反过来制约了城市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城乡经济体制的巨大差异和有关的体制问题，限制了城乡之间人才和技术的合理流动，造成了城乡生产技术水平的极大差距，影响了城乡经济的协作关系；同样，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农村城镇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也有不少是由体制原因和政策原因直接引起的。

通过对城乡经济关系的各个方面进行实证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其中存在的政策问题和体制问题，以及促进城乡经济协调运行和发展对于相应政策和体制的要求，这就为城乡经济政策的制定（或调整）和体制改革的推进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同时，通过研究城乡经济关系与有关经济政策的关系，有助于明确政策调整的作用和力度；通过研究城乡经济关系与各种体制改革的关系，则有助于把握体制改革的方向和进程。



地区经济发展战略要把实现 “两个转变”作为指导思想*

我很高兴参加在郑州市举行的河南跨世纪发展战略研讨会。这是我向费孝通教授和与会的其他各位专家以及向河南省的同志们学习的极好机会。

我认真阅读了《河南省跨世纪发展总体研究报告》、《省会郑州跨世纪发展研究报告》、《新密市经济社会发展概况》等材料，收获匪浅。这几份战略研究报告具有以下特点：（1）都对本地的情况和面临的形势做了充分的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提出和研究了带有全局意义的重大经济社会问题。（2）内容全面，把经济、社会、科技结合起来，提出了鼓舞人心的目标。（3）实现战略指导思想上的转变，贯彻了或者力求贯彻党中央关于“两个转变”的要求。（4）富有新意，如河南省和郑州市提出的扩张需求、制造需求以及划出飞地、吸引投资和技术，新密市提出的公司+农户等设想，都既有新意，也有实践价值。

据我所知，经济发展战略问题早就提出来了。“七五”时期我承担过国家重点课题“中国工业发展战略问题”的研究。当时，许多省市都曾制定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不过，现在制定经济发展战略和那时又有很大不同。这主要是因为，党的“十四大”提出了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又提出经济增长方式要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现在制定经济发展战略，要遵循市场经济的规律，要贯彻党中央提出的实行“两个转变”的要求。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经济发展战略不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指令性计划，而是建立在科学预测基础上的带有指导意义的长期规划。

* 本文系作者1995年5月1日在郑州“河南跨世纪发展战略研讨会”上的发言。曾载拙著《中国经济的两个根本转变》（经济管理出版社1997年出版）。



所以，应该说，现在制定经济发展战略更难了。为了制定好经济发展战略，要在调查研究基础上进行科学预测。这就是要研究经济发展的现状和趋向，包括产业结构、所有制结构、企业组织结构、技术结构、收入分配、居民消费和国内外市场等方面的现状和趋势，研究影响这些趋势的主要因素，而且要研究得尽量周密一些，具体一些。这种调查研究和预测工作是很艰巨的，又是非常重要的。

战略不仅是预测，而且体现人们的一种主观要求，是决策的结果。为了制定经济发展战略，还要在科学预测的基础上进行正确决策。因为经济发展的趋势往往有多种可能性，我们需要哪一种可能性，不需要哪一种可能性，是有一个选择问题的，也就是要正确决策。正确的战略要建立在科学预测基础上，可是战略正确与否不只决定于预测，而且决定于决策，尤其决定于支配决策的指导思想。

所以，在制定经济发展战略时，必须处理好科学预测和正确决策的关系，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忽视调查研究，忽视科学预测，显然制定不好战略。但是采取客观主义的态度，或者指导思想不科学、不明确，使得决策不科学、不正确，也制定不好战略。可见，正确的指导思想对制定经济发展战略是极其重要的。

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战略指导思想呢？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不过这里我不准备详谈这个问题，而只是强调一点，就是当前制定经济发展战略必须贯彻“两个转变”的要求，尤其要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作为战略指导思想，在制定战略目标和战略措施时认真贯彻。

第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含义。

什么是经济增长方式？现在有种种说法，例如，外延型和内涵型，粗放型和集约型，速度型和效益型，数量型和质量型，等等。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建议》中的提法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我认为这个提法比较确切和科学。

所谓粗放型经济增长，是指经济增长主要靠投入的增加；所谓集约型经济增长，是指经济增长主要靠投入要素效率的提高，即靠提高要素生产率，或者说提高效率。

现在我国经济增长的70%是靠投入的增加。国外有的国家经济增长中70%靠科学技术进步，而我国科学技术（包括管理）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只有30%。因此，我们说中国现在还是粗放型为主的经



济增长方式，需要向集约型为主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我认为，不能把粗放和外延，集约和内涵等同起来。笼统的说外延就是粗放，内涵就是集约，是不确切的。因为，外延扩大再生产可能是粗放的，也可能是集约的，内涵扩大再生产可以是集约的，也可以是粗放的。我们通常把建设新企业视为外延型扩大再生产，把改造老企业视为内涵型扩大再生产，并强调要改变重视新建忽视改造的现象。现在强调内涵这是必要的，但有些新建也是需要的，而且内涵也可能是复制古董。所以，应该全面认识粗放和外延之间、集约和内涵之间的联系和区别。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要求是多方面的，正如江泽民同志所说：“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把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战略。要把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到重要位置，使人口增长与社会生产力发展相适应，使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良性循环。”^①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关键则是提高效率，即提高生产率在经济增长速度中的贡献份额。经济发展战略和长期计划中应该提出这方面的具体要求和指标，真正落实和体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要求。

为了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需要进一步提高对“转变”必要性、重要性、紧迫性的认识。现在有些人的认识还很不够。这并不奇怪，因为长时期来我们追求速度而忽视效益，习惯于粗放经营。改变这种习惯并不容易。问题还在于，当前我们还缺少保证和促使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体制条件，至少这方面的很多条件还不充分和完善。所以，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强调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要靠经济体制改革。我们应该认真领会这个观点。

第二，经济体制要有利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要适合生产力并促进生产力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仍要用这个原理来认识经济发展问题。从我国经济发展的历史看，经济发展顺利总是由于生产关系比较顺当，即比较适应生产力的状况和要求，而经济发展受到挫折总是同生产关系的某些方面某些环节存在问题、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有关。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主义社会里生产关系还是一个根本问题。我认

^① 江泽民：《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问题》。《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文件》，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页。



为也要这样认识和处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问题。

经济体制是生产关系的重要表现。经济体制也要有利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才能保证这个转变的顺利进行。这里涉及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条件问题。现在理论界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问题讲得不少，但对其中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条件问题讲得不多。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需要条件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和苏联都曾面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任任务。结果是日本转变了，苏联没有转变。原因何在呢？我认为主要是条件问题。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需要哪些条件呢？我曾提出过六个方面的条件。（1）国民经济尤其是工业有一定的基础，产业结构适应集约型增长的要求，并有较高的积累率和投资能力。（2）科学技术有一定的水平，而且进步较快。（3）重视经营管理，不断改进经营管理。（4）有一支素质较高的职工队伍和企业家队伍。（5）经济体制有利于实现集约型经济增长。（6）政府实行促使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政策。这些条件都是很重要的，忽视任何方面的条件都会影响经济增长方式的顺利转变。

那么，我们是不是已经具备了这些条件呢？我的看法是，条件基本具备了，可是还有欠缺，还需要充实和完善。尤其是经济体制方面的条件，不能说已经非常充分了。

应该说，在自然经济条件下，在传统计划经济条件下，只可能实行粗放型或粗放型为主的经济增长，不可能实行集约型或集约型为主的经济增长。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条件下，一段时期内经济发展速度可以很快，有些部门技术进步也可以很快并达到很高的水平。但是就整个国民经济而言，技术进步受到很大限制，速度不快，水平也不高。到了一定时期，经济发展速度也会放慢，导致经济领域问题丛生，严重阻碍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

只有进行经济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在具备其他一些必要的条件时，才有可能实行集约型为主的经济增长方式。这是因为，实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主要要靠企业而不是要靠政府，企业有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动力和压力，才可能实现转变。这种情况，不管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都是一样，那种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不能实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资本主义制度才能实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观点是缺乏根据的，因而也是错误的。在这里，社会制度的性质并不是转变



的必要条件，但是说市场经济体制才能保证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则是根据的。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才能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制约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同时才能存在竞争而有序的市场体系，这样企业才会有实现集约经营的动力压力。加上其他必要条件，才能真正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现在我们还处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还没有建成这种体制，这是实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最主要的困难。因此，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建议》中强调：“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要靠经济体制改革，形成有利于节约资源，降低消耗，增加效益的企业经营机制，有利于自主创新的技术进步机制，有利于市场公平竞争和资源优化配置的经济运行机制。”这是说得非常深刻和正确的。

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建议》中说的企业经营机制、技术进步机制、经济运行机制等三个机制具体内容是什么，如何才能形成这三种机制？

我认为，形成这三种机制的基础是使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制约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制约简称“四自”。有人反对企业“四自”的提法。我不同意这种主张。我认为，企业必须“四自”。这样，才能是名副其实的企业。

要形成有利于节约资源、降低消耗、增加效益的企业经营机制，除了“四自”还要求企业善于管理，加快技术进步。当前，还要进行企业改组，即做到“三改一加强”。可以说“三改一加强”是企业集约经营之路。

要形成有利于自主创新的技术进步机制，企业“四自”也是基础和前提。尤其要重视解决企业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问题，使企业有扩大再生产的自主权和条件，成为技术进步的主体。此外，还要形成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使企业有技术创新的强大动力和压力。

要形成有利于市场公平竞争和资源优化配置的市场运行机制，则就要求更高了。因为，这不仅是企业的微观问题，而且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宏观问题。除了要求企业成为真正的企业，要求建立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还要求具有健全的市场法规和市场监督管理制度，即建立正确有效的宏观管理制度。而实行企业“四自”也是基础。



几份研究报告中都提到了要贯彻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这是完全正确的。我认为，还要对以下问题进行研究，即今后5年、10年、15年河南省各种所有制的演变趋势和将形成的所有制格局以及这种所有制格局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要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做出科学规划和提出对策措施。由于多种可能的前景，要针对这种情况提出正确的方针政策。

既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主要要靠企业，毫无疑问各种经济成分的企业都要成为有活力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成为市场竞争主体。为此除了重视国有企业的改革和管理问题，还要重视非国有企业乃至非公有企业的改革和管理问题。非国有企业、非公有企业也要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企业制度，这也可称之为现代企业制度。当前，尤其要重视集体企业的体制改革问题，做到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非国有企业、非公有企业也有改组、改造和加强、改进经营管理的问题，也有增加活力、增加竞争力的问题，对非公有企业还有加强管理监督使它们更好纳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轨道的问题。

不过，当前最繁重的任务还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在制定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时，不能回避而必须着力研究和解决如何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问题。如果我们不帮助国有企业解决面临的困难，不能在国有企业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不能把国有企业搞好搞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任务是难以顺利完成的。

我认为，要把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多种经济成分结合起来。国有企业不是可有可无，但现阶段只能要求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不能要求它起主体作用。主导不等于主体，现阶段国民经济的主体是包括国有经济、集体经济在内的整个公有经济。从目前存在的问题看，还要进一步调整国有经济范围，退出一些不该国有的部门，加强必须加强的国有部门。因此要认真贯彻“抓大放小”的方针。

国有企业改革必须加强领导，加强规划。改革中的有些问题看来需要最有权威的领导来解决。最近看到一个材料，反映上海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提出在建立了国有资产经营公司以后，仍难实行政企职责分开。例如，国资部门所有者职能仍难到位，国资公司行政职能仍难转移，运行方式仍难改变。这些问题，国资部门和各主管部门都解决不了，需要市的最高领导人来解决。河南和郑州在深化改革中可



能也会出现这类问题，这就要求最有权威的领导机构下决心和下工夫想方设法加以解决。否则，国有企业改革难以深化，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也会遇到极大困难。

这次研讨会上的有的研究报告中讲企业改革似乎过于原则，不够具体，难以落实。有些提法也值得商榷，如“管好国有、放开非国有”，“对非国有企业实行无为而治”等提法。我认为，对非国有企业也不能完全“无为而治”，而应该是有所为有所不为。对国有企业也不只是管的问题，对非国有企业也不只是放开的问题。当前对集体企业的改革就要加强领导，不能“无为而治”。

第三，正确处理速度和效益的关系。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上说：“多年来的经验表明，我们讲发展，难就难在把速度和效益有机结合起来。问题往往出在偏重数量扩张，单纯追求增长速度，而忽视经济质量，效益不理想，整体素质不高。这是我们今后经济工作中需要认真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解决这个问题难度也很大。据了解，全国省市制定的增长速度低于党中央《建议》的只有个别省市，其他的都超过《建议》，都在10%以上。因此，速度和效益的关系问题还是要注意的一个问题，要根据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要求来处理好这个问题。

我体会，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并不是不要高速度，而是要在提高经济效率经济效益的基础上争取高速度，要投入少、产出多的高速度，要持续稳定的高速度。现在不论就全国来说，还是就河南省来说，在一个较长时期内保持高速增长是有可能的，在基础、资源、资金、技术、市场等方面都具备长期高速增长的条件。研究报告关于速度问题的积极态度，我是赞同的。

不过，也要看到当前和今后增长速度受到制约的一面。例如，受基数高的制约，受资源供给的制约，受资金、技术、市场等方面的制约，以及受本地区竞争力的制约。所以，也不宜把增长速度定得过高。正确的做法是在提高经济效率经济效益的前提下争取高速度，这样的速度是越高越好。如果继续偏重数量扩张，单纯追求增长速度，把增长速度定得过高，势必会为了速度而妨碍提高经济效率和经济效益，仍旧走粗放经营之路，违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要求，也不会实现持续稳定的高速度。



第四，把城乡关系作为战略问题来抓。

有些人往往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看成只是工业部门的事情，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应该是整个国民经济的任务，也就是各个经济部门都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因此，我们不仅要在工业中而且要在农业中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不仅要在城市中而且要在乡村中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如果我国的工业是集约经营了，而农业还是粗放经营，不能说我们已完成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任務。

在农业中和在乡村中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很大程度上要靠工业发挥主导作用和城市发挥带动作用。这就涉及城乡关系问题。在长期规划中要把这个问题作为一个战略问题来研究和处理。

上面我曾说今后中国能够长时期维持高速增长。原因何在？我认为，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有一个广大而又不富裕并迫切要现代化的农村。现在我国还是一个工业农业国，按人口构成说还是农业工业国，农村人口还占多数。我国农民比较穷，随着经济发展，如果农民达到现在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由此引起的市场需求就会使我国有几十年的高速增长时期。现在经济发达国家增长速度很低，主要是受市场需求的限制。我国经济增长的最大潜力在于有无比广大的市场，这首先是而且主要是农村市场。

河南也是一个农业大省，在现代化过程中要十分重视城乡关系这个战略问题。这方面需要做的工作是很多的。河南争取高速增长也要着眼于扩大和开拓农村市场，尤其要重视开拓本省以及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市场，让广阔的农村市场带动全省经济迅速健康的发展。

除了以上四点，我还想提出的一点意见是：要促使大批企业家成长，并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不仅要培养工业企业家，而且要培养农业企业家、商业企业家、外贸企业家、金融企业家，等等。这对于完成河南跨世纪发展战略和实现“两个转变”都是必要的。

以上意见一定会有不妥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第二部分

中国经济结构的 调整和优化



三十年来我国经济结构的回顾*

当前，我国各族人民正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调整经济结构，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努力奋斗。为了吸取经验教训，顺利实现经济结构的合理化，回顾一下过去经济结构的演变过程是十分必要的。

建国以来，和整个经济发展的过程一样，我国的经济结构也经过了曲折复杂的变化过程。经济恢复时期和“一五”时期，我国经济结构的演变是健康的，把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畸形的经济结构逐步改造成社会主义性质的农轻重关系比较协调的经济结构，这一阶段经济发展既迅速又平稳，人民生活逐步改善，大家心情舒畅。1958年开始，主要由于发生了共产风，高指标，瞎指挥等错误，导致了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1962年至1965年坚决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才逐步克服比例失调，使农轻重恢复了协调，能够较快地发展起来。但这个健康发展的过程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中断了。1966年到1976年的十年间，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疯狂破坏，我国又出现了严重的比例失调，而且这一次比例失调持续的时期特别长。粉碎“四人帮”后，这种情况开始得到扭转，从1979年起贯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新的八字方针，情况才又逐步好转起来。

三十年来经济结构的变化

尽管经历过两次严重的挫折，在改造旧中国经济结构上还是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在生产关系方面，我国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已经消灭了剥

* 本文写于1980年8月，原载马洪、孙尚清主编：《中国经济结构问题研究》（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削制度，确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绝对优势。在产业结构等方面，和解放前相比，也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在工业方面：解放以来我国工业发展速度是相当快的。从1950年到1977年28年间的工业生产平均每年增长速度，我国为13.5%，苏联为9.7%，美国为4.5%，日本为12.4%，联邦德国为6.9%，英国为2.3%，法国为5.2%，印度为6%，我国比其他国家都快。我国全民所有制工业的固定资产（原值）1952年为149.2亿元，1978年增加为3193.4亿元。从1949年到1978年工业总产值增长38.2倍，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由30%提高到72.2%。原煤产量由0.32亿吨增加到6.18亿吨，发电量由43亿度增加到2566亿度，原油产量由12万吨增加到10405万吨，钢产量由15.8万吨增加到3178万吨，化肥产量由0.6万吨增加到869.3万吨，棉布产量由18.9亿米增加到110.3亿米，糖产量由20万吨增加到227万吨。从1952年到1978年，一些主要工业部门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冶金工业由5.9%提高到8.8%，石油工业由0.5%提高到5.5%，化学工业由4.8%提高到12.4%，机械工业由11.4%提高到27.3%。解放前我国不能制造飞机、汽车、拖拉机，现在不但都能制造了，而且出现了许多新兴工业部门，如高级合金钢工业、人造纤维工业、塑料工业、电子工业和原子能工业等等，这些部门不断发展，使我国工业部门进一步齐全，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我国工业布局有了很大的改变。旧中国工业地区分布极不合理，重工业主要集中在东北地区，轻工业则集中在沿海各大城市。现在全国东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各个地区都有了工业基地，沿海和内地的工业分布也有了改善，三线地区不少工业产品的生产能力已占全国1/3。我国已经大体上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已经由农业国变为农业工业国了。

在农业方面：从1950年到1977年的农业生产平均每年增长速度，我国为4.2%，苏联为3.3%，美国为1.9%，日本为2.7%，联邦德国为1.8%，英国、法国为2.2%，印度为2.7%，我国也比这些国家快。30年来我们大规模地进行了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初步治理了海河、淮河、黄河、长江等河流，新修堤防16.4万公里，相当于环绕地球四圈，建成了一大批旱涝保收的稳产、高产农田，1978年全国灌溉面积达6.7亿亩，占耕地面积的45%。解放前我国农业几乎全部为手工劳动，解



放后农业机械化、现代化也有了一定的进展，1978年全国拥有农用排灌动力机械6558万马力，拖拉机55.7万多台，手扶拖拉机137万台，机耕面积占耕地面积的40.9%，平均每亩耕地施用化肥（按100%有效成分计算）11.9斤，农村用电量达到253亿度，占全国发电量9.9%。到1978年年底，我国农村人民公社拥有农业固定资产849亿元，比1957年的155亿元增长447%，平均每年增长7.4%。由于农业生产条件得到显著改善，生产水平有了较大提高。1978年粮食总产量达到6095亿斤，比1949年的2264亿斤增产了3831亿斤，按耕地面积计算亩产548斤，比1949年的171斤增产377斤。1978年和1952年相比，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3.2%，粮食平均每年增长2.4%，超过了人口增长2%的速度。

在交通运输方面：经过30年的建设，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了由铁路、公路、水运、民航和管道各种运输方式所组成的、门类比较齐全的综合运输网。1949年到1978年，铁路通车里程由2.2万公里增加到5.04万公里，公路通车里程由8.07万公里增加到89.02万公里。内河通航里程由7.36万公里增加到13.6万公里，载货汽车由3.25万辆增加到100.17万辆，载客汽车由1.71万辆增加到25.9万辆，民航飞机增加了好几十倍。铁路、公路、水运货运量分别增加18.2倍、9.7倍和16倍。1950年民用航空线1.14万公里，1978年已达14.9万公里，其中国际航线12条，5.53万公里，已同10多个国家通航。我国远洋船队也已初具规模，已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往来。通讯邮电事业也有了重大发展。

在国内贸易方面：从1949年到1978年，全国商业部门收购商品总额由175亿元增加为1739.7亿元，其中工业品由84.5亿元增加为1263.4亿元，农产品由90.1亿元增加为459.9亿元；社会商品零售额由140.5亿元增加为1527.5亿元，其中消费品由133.8亿元增加为1233.8亿元，农业生产资料由6.7亿元增加为293.7亿元。1979年全国商业部门收购商品总额进一步增长为1992.4亿元，社会商品零售额进一步增加为1752.5亿元。

在对外贸易方面：1950年进出口总额41.5亿元，其中进口21.3亿元，出口20.2亿元，1979年进出口总额455亿元，其中进口243亿元，出口212亿元。进出口产品的构成也起了变化，改变了原来半殖民地经



济的特点。1978年进口总额中，生产资料占81%，消费品占19%；出口总额中，工矿产品占37%，农副产品加工品占35%，农副产品占28%。

在科学技术方面：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已有了大批机械化设备和一批自动化设备。例如武汉一米七轧机、上海金山化纤厂、辽宁辽阳化纤厂、北京燕山化工厂等工厂已拥有一批20世纪70年代最新技术装备。我国机械工业的制造技术也有了巨大进步，已经掌握了成套设备技术的，有第一套原子能反应堆和扩散机，年产150万吨的钢铁联合企业，年产250万吨井下煤矿和700万吨露天煤矿，年处理250万吨原油的大炼油厂，30万千瓦水发电机组和30万千瓦火发电机组，年产10万辆的汽车厂，年产30万吨合成氨和24万吨尿素厂，3万吨模锻水压机，5万吨油轮，2.5万吨货轮，4000马力电力传动内燃机车等。1978年全国国民经济各部门共有机床267万台，其中大型机床6.8万台，高精度机床2.28万台，数控机床0.53万台。上海纺织工业原以设备老、技术老、工艺老著名，目前棉纺织、印染、毛、麻、丝绸、针织等行业的中小工厂，机器大都已改造过。羊毛衫行业还采用了电子技术。纺织工业以外的轻工业部门原来以手工操作为主，现在机械化程度达到70%，自动化程度达到20%，并建成电子程序控制自动化、半自动化车间10个，生产流水线300条，正进一步推广运用电子、远红外线、微波等新技术。前面说过我国农业中也已经开始实现机械化、现代化。解放前我国的技术结构以手工劳动为特征，目前已发展成为自动化、半自动化、机械化、半机械化、手工劳动相结合的多重结构。原子弹、氢弹、导弹的试验成功，人造地球卫星的发射和回收，牛胰岛素的人工合成，集中地标志着我国科学技术的成就。当然，我国现在的科学技术同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还很大，但是毕竟从无到有地初步建立了一系列新兴科学技术部门。

在人民生活方面：解放前我国劳动人民生活极端贫困，亿万人民在饥饿死亡线上挣扎。解放后人民生活普遍有了较大的改善。城乡居民的消费水平，1952年平均每人76元，1979年达到200元。剔除物价上涨的因素约增加90%。1979年我国每10人有一只手表，每25人有一架缝纫机，每12人有一辆自行车，每11人有一台收音机。虽然近年来我国人民收入增加较慢，但现在人民生活和解放前相比，确有天壤之别。

有一种看法把我国当前经济结构看成一无是处，这种看法不符合实



际情况，因而是错误的。“一五”时期我国经济结构是比较合理的。和那时相比，当前经济结构也有很多先进的地方。1978年我国原煤产量仅次于苏联、美国，占世界第三位，钢产量次于苏联、美国、日本、联邦德国，占世界第五位，原油产量居世界第八位。20多年来生产进一步发展了，特别是工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了，这就为改善经济结构提供了比较有利的条件。我们要看到这些有利条件、树立起改善经济结构的信心和决心。

当前经济结构不合理表现在哪里

现在我国经济结构还很不合理，存在着不少严重问题。

（一）农轻重关系严重失调

我国农轻重关系在产业结构中占举足轻重的地位，农轻重关系是否协调，对国民经济中其他比例关系有决定性的影响。长期以来我国农轻重关系很不协调，这是经济结构不合理的重要表现。

在一些经济发达国家里，由于农业劳动生产率高，用较少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就能满足对农产品的需要。例如美国1976年平均每个农业劳动力生产粮食174 675斤，肉类13 607斤。鸡蛋3 032斤，牛奶43 275斤，农业人口占总人口3.8%，农业劳动力占总就业人数4.8%，不仅供应国内所需的农产品，而且还有大量农产品出口。我国1977年平均每个农业劳动力仅生产粮食1 932斤，肉类50斤，蛋类14斤，奶类7斤，农业人口占总人口84.9%，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75.7%。八亿人民搞饭吃，农产品仍远远不能满足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1978年我国按人口平均的主要农产品产量是，粮食636斤，棉花4.6斤，食油4.8斤，糖4.7斤，肉16.5斤，水产品9.8斤，都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我国农业结构也非常落后，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偏重种植业、偏重粮食的状况基本没有改变。农林牧副渔五业中，农业产值占70%，粮、棉、油、麻、糖、丝、茶、菜、烟、果、药、杂12类农产品中，粮食产值约占70%。由于片面强调“以粮为纲”，没有建立起一个合理的农业结构，不仅不能充分利用自然资源，而且使生态平衡遭到



破坏。目前全国森林覆盖率只有 12.7%。低于世界森林覆盖率 22% 的水平。南方有 10 亿亩草山、草坡没有很好地利用来发展畜牧业。全国可养殖浅海滩涂利用率不到 15%，淡水可养面积已利用的只占 2/3。我国有一段时期粮食的增长速度还低于人口的增长速度。如 1957 年到 1977 年每人平均粮食占有量从 603 斤降到 598 斤，1978 年还只略高于 1957 年的水平，没有超过解放前 1936 年 660 斤的水平。1978 年净进口粮食 139.2 亿斤，棉花 952 万担，动植物油 5.82 亿斤，食糖 132.8 万吨。这种情况同一个农业大国极不相称。超越于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是其他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基础。我国农业生产落后，整个国民经济是难以迅速而又健康地发展起来的。

我国轻工业长期处于被挤的地位。重工业和轻工业发展速度过分悬殊，1949 年至 1978 年重工业增长 90.6 倍，每年平均增长 16.9%，轻工业只增长 19.8 倍，每年平均增长 11%。轻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已由 1949 年的 73.6% 下降到 1978 年的 42.7%。轻工业投资占基本建设投资的比重，“一五”时期为 5.9%，以后不仅没有增加，相反还有减少的趋势。重工业和轻工业投资的比重，“一五”时期是 8:1，“二五”时期是 11:1，三年调整时期是 13:1，“三五”时期是 14:1，“四五”时期是 10:1，“五五”时期前三年是 8.3:1，仍高于“一五”时期的水平。轻工业的原料供应十分紧张。轻工业产值中，1952 年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占 87.5%，以工业品为原料的占 12.5%；1978 年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占 68.4%，以工业品为原料的占 31.6%。由于农业原料增长缓慢，严重影响到轻工业的发展。轻工业分配到的钢材比重也在下降，“一五”时期占 21.3%，“二五”时期占 13.7%，“三五”时期占 12.7%，“四五”时期占 11.3%，“五五”时期前三年占 12.4%。轻工业用电量在总用电量中的比重，1952 年占 28%，1978 年仅占 12.9%，减少一半还多。我国棉纱、棉布产量“四五”时期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仅为 0.5%，1978 年全国城乡居民每人平均棉布消费量为 23.2 尺，比 1956 年的 24.8 尺低 1.6 尺。我国有些轻工业产品不能满足人民的起码需要。不少市场奇缺的轻工业品，如纸张、家具、洗涤用品、啤酒、自行车等的供应长期得不到改善。轻工业产品直接为市场服务的部分还有减少的趋势。据 16 个省二轻局的统计，在二轻工业产品结构中，为市场服务部分 1965 年为 50.6%，1978 年下降到 43.4%；为大工业服务部



分则由 27.7% 增加为 34.2%。我国轻工业的生产技术水平和劳动生产率也很低。轻工业内部比例关系也不协调，如棉布印染能力只有坯布生产能力的 60%，其中印花能力只占 15%，丝绸、针织的印染后整理能力更为薄弱。和国外相比较，我国轻工业更显得落后。1977 年我国棉布按人口平均比苏、日、法等国少 50% 以上；食糖不到苏、美、法、联邦德国的 1/10；电视机年产量我国每万人平均 3 部，美国 360 多部，日本 1 340 多部。

我国重工业有脱离农业和轻工业而片面发展的倾向。由于重工业的规模和速度超过了国民经济可能提供的物力和财力，不仅挤了农业和轻工业，也妨碍自己的发展。重工业内部也比例失调，尤其是原材料工业和加工工业不相适应。我国机床产量的增长速度大大超过了钢材产量的增长速度，1978 年我国机床拥有量达 267 万台，比 1956 年的 70 万台增长 2.8 倍，而同一时期钢材产量只增长 1.5 倍。我国目前机床加工能力大于钢材供应能力 3~4 倍，1978 年生产机床 18 万多台，相当于美国、苏联年产钢 8 000 万吨时的机床产量。机床拥有量虽多，但构成落后，效率比国外低得多。我国现有 1 000 吨以上的水压机 34 台，相当于欧洲共同体国家的拥有量，但工艺配套不完整，水压机能力不能充分发挥，还要向国外买大型锻件。机械工业的综合能力也低，如发电设备，三大主机能力 500 多万千瓦，高压输变电设备能力只能配 400 万千瓦，配套的机、泵、阀和自动化仪表的生产能力更短缺。我国现在生产的农机产品，多数是结构陈旧，消耗高，效率低，适应性差，许多急需的农业机械还是缺口。1977 年汽车产量与钢产量相对量之比，法国为我国的 35 倍，美国为我国的 25 倍，日本、英国为我国的 15 倍，苏联为我国的 2.7 倍。我国冶金工业内部也不平衡。一是矿山落后。全国十大钢铁基地有 6 个铁矿石不能自给，28 个产铁的省、市、自治区有 16 个矿石不够，1978 年进口铁矿石 800 万吨。二是轧钢落后。我国轧钢能力与炼钢能力之比仅为 0.65:1，而国外为 1:1，因此，国外钢的出材率高，调剂品种的能力强。三是有色金属落后。我国很多有色金属的自给率很低，而且越来越低。进口的比例越来越大。有些传统出口的有色金属产品逐年减产。我国的建筑业和建筑材料工业也很落后。1953 年到 1978 年建材工业年平均增长速度为 11.8%，低于 13.6% 的重工业年平均增长速度。很多建筑材料长期供应十分紧张。以上情况表明，我国



重工业远没有充分发挥对农业、轻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主导作用。

(二) 能源供应紧张

能源是发展国民经济和保证人民生活需要的重要物质条件。没有足够的能源，生产和流通就难以顺利进行，人民的生活也无法得到保证。当前世界出现了能源危机，我国能源问题也非常严重。1953年到1978年我国工业总产值每年平均增长11.2%，而能源生产每年平均只增长9.6%。1977年、1978年两年，全国约有1/4的企业开工不足。据电力部门对冶金、化工、轻纺、机械几个主要用电行业，以及东北、华东、中南等几个主要缺电地区调查，全国缺装机约1千万千瓦，电量三四百亿度，一年约损失工业产值几百亿元。全国现有农田机械动力1.6亿马力，而国家一年只供应柴油800万吨，平均每马力供应柴油50多公斤，只够工作50多天，严重影响农机具的使用效率。我国生活用能源也很紧张。全国1.7亿多农户，每年平均缺烧3个月左右。有的地方扒树皮、挖树根、毁林木解决烧柴问题。四川省一年毁掉林木800多万立方米，为全省采伐量的一半。由于煤、油开采强度过大，火电超发，造成能源工业内部比例失调。近几年来，我国能源政策不稳，特别是用油用煤的结构多变，一会儿以煤为主，一会儿以油为主，改来改去，造成很大损失。工业结构不合理也加剧了能源的紧张。据计算，重工业每亿元产值耗能比轻工业多四倍，耗电比轻工业多二倍。按1978年工业总产值匡算，轻工业比重每增加1%，重工业比重减少1%，约可少耗能源600多万吨（标准煤）。如果轻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维持1957年的水平，则可少用能源5000多万吨（标准煤）。我国能源使用中浪费也很严重。目前，我国能源平均利用效率只有30%，而世界先进工业国家则达50%。从工业生产消费看，1978年我国每亿元工业产值消耗能源17.8万吨，1975年美国为6.5万吨，日本为5万吨。每万吨能源所生产的产值我国为562万美元，比美国低63%，比日本低72%。我国同日本相比，能源总消费量大体上相等，但社会生产总值只抵日本1/4左右。我国能源利用效率如果在现有基础上提高2%，就相当于增加2000万吨标准煤。

(三) 运输和生产发展不相适应

马克思曾说：“工农业生产方式的革命使交通运输工具的革命成为



必要。”^① 列宁也说：“运输是我们整个经济的主要基础”。^② 现在交通运输落后也是我国国民经济的薄弱环节。全国铁路有 120 个区段，占总数的 1/3，运输能力已达饱和状态。还有十多个区段只能满足运输要求的 45% ~ 70%，成为卡脖子区段。我国公路、水路运输也不能满足工农业生产发展的要求。全国现有公路能够晴雨通车的里程只占 67%。由于兴建水利不考虑综合利用，1962 年以来内河航运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二三万里。长江的重庆、上海间的运力不足，不能保证出川的煤炭、从武汉下运的煤炭和长江沿岸工厂运输的需要。特别是沿海港口吞吐能力严重不足，影响着对外贸易的发展。沿海港口万吨级的泊位仅 137 个，其中能供外贸使用的只有 90 个。1979 年上半年平均在港的外贸船舶达 220 艘，远不能满足需要。我方承运的外贸海运量、有 27% 需要租用外轮，每年要付租船费 1.5 亿美元。由于管理上的缺陷，各种运输工具之间没有合理的分工，造成航道空闲，铁路繁忙，汽车运输距离长，轮船经常窝两头等现象，带来不少损失和浪费。

（四）流通和生产发展不相适当

在社会化大生产的条件下，社会再生产顺利进行不仅要求各个生产部门相适应以及生产和运输相适应，而且要求流通和生产相适应。在一些经济发达国家中，随着经济的发展，从事商业、服务业劳动力的比重不断增加。美国批发商业和零售商业中的从业人数，1870 ~ 1950 年增长了两倍，比主要物质生产部门增长得快，其中 1900 ~ 1950 年增长得更快，1900 年有 1/10 的从业人员从事商业工作，1950 年占 1/5。我国商业服务业很落后，1977 年从事商业服务业的人数估计只占就业人数 3% 多一点。更为严重的是，20 多年来商业服务业的职工人数还有相对减少的趋势。1978 年比 1957 年全国人口增长 48%，职工总数增长两倍多，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增长两倍多，商业、饮食业、服务业人员只增加 6.6%。辽宁省商业服务业网点，1978 年比 1957 年减少 80% 以上，饮食业网点减少 90% 以上，造成有些城市十里长街无商店，职工普遍反映买粮、买菜、洗澡很困难；农村商业 1957 年有合作商店 28 500 个，合作饭店 11 800 个，1979 年年底只剩下 580 个，而且布局不合理，许

^① 《资本论》第一卷，第 421 页。

^② 《列宁全集》第 33 卷，第 125 页。



多公社没有网点。社员反映，赶集吃饭难，住店难，照相难。阜新市1953年人口14万人，有商业网点1020个，现在增加到50多万人，商业网点只剩下316个，人口增加3倍，网点减少2/3；商业系统的仓库、粮库、油库、冷库严重不足，因为仓库少，农民交售的猪多，宰杀后无处存放，仅1979年就停购了3次。该市由于商业网点少，全市有数万居民要到两里以外去买粮买菜，打瓶酱油要骑自行车上街。我国商业、服务业不发展固然是由于工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但主要还是工作中的缺点错误造成的，它妨碍社会再生产顺利进行，同时给居民生活带来很多困难。

我国对外贸易也很不发达。对外贸易总额在国际市场总贸易额中的比重很小，1973年、1974年我国占世界贸易第15位，1975年占第25位，1976年占第29位。我国出口商品（按外贸国内收购的出口商品总值计算）在工农业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也很小，按建国30年来平均计算为4%，1977年和1978年为3.9%。1976年联邦德国、日本、美国和苏联出口在其工农业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分别为55.4%、30.4%、22.8%和10.6%。出口商品结构也很落后，1978年出口商品中54%为初级产品，38%为轻纺工业品，8%为重工业产品。南朝鲜1978年出口商品结构是：初级产品占10.8%，轻纺工业品占54.6%，重工业产品占34.6%。我国这种情况同工业的发展很不相称，同现代化的要求也不适应。

（五）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失调

长期以来我国积累率过高，造成积累和消费比例关系失调，这是经济结构不合理的另一个重要表现。

“一五”时期我国积累率基本上稳定在23%到25%之间，这是比较适合当时情况的。以后长时期积累率偏高。1958年积累率为33.9%，1959年为43.8%。“二五”时期平均为30.8%，“三五”时期为26.3%，“四五”时期为33%，1976年为31.1%，1977年为32.3%，1978年为36.6%。“一五”以后积累率的升高，是积累额增长快和消费额增长慢的结果。1958年以后，除三年调整时期以外，积累额上升幅度不仅超过城乡居民消费额增长速度很多，而且超过国民收入总额增长速度很多。“四五”时期我国积累率除低于日本（36%）外，比苏联（28%）、法国（25.4%）、联邦德国（25%）和英国（18.2%）都高。



伴随着积累率高的是基本建设规模过大，超过了可能提供的财力、物力和人力。“一五”时期基建支出占财政支出37%，这个比例也比较合适，“二五”时期提高到46.2%，“四五”时期平均为40.2%，1978年达40.7%，远远超过了可能，对生产起了消极作用。1978年全国全民所有制在建项目65 000个，总投资达3 700多亿元，除已完成2 100多亿元外，全部建成还需投资2 600多亿元，按国家财政每年能够提供的投资额计算，即使一个新项目也不增加，需要六七年时间才能建成。1979年整顿基本建设取得一定成就，但是目前基建战线仍然过长，建设项目仍然过多，总规模仍然过大。加之用其他各种资金安排的建设项目日益增多，如不统筹安排和正确引导，战线还有进一步拉长的可能。

积累内部生产性积累和非生产性积累也严重失调。“一五”时期，生产性积累占59.8%，“二五”时期上升到87.1%，三年调整时期降低到65.5%，“三五”时期又上升到74.5%，“四五”时期继续上升到77.4%，1976年、1977年、1978年分别为83.2%、75.4%、75.9%。而非生产性积累的比重，从“一五”时期的40.2%，猛降到“二五”时期的12.9%，三年调整时期提高到34.5%，“三五”时期“四五”时期又分别降到25.5%和22.4%。这种情况导致“骨头”和“肉”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调。以住宅投资来说，“一五”时期占基本建设投资的9.1%，“二五”时期和1967~1975年下降到4%和5%。1977年全国城市平均每人居住面积只有3.6平方米，比1952年的4.5平方米还少0.9平方米。和外国住房面积相比，相差更为悬殊。例如，美国每人平均住房面积为18平方米（1974~1976年），日本为13平方米（1978年），苏联为7.14平方米（1974~1976年），罗马尼亚为9.6平方米（1977年），南斯拉夫为15.6平方米（1979年）。1977年我国城市缺房户约占城市总户数的37%。其他如城市供水设施不足、交通拥挤、文教卫生建设欠账多、校舍紧张等情况都很严重。

（六）三线建设遗留问题很多

1965年底我国开始大规模进行以军工建设为中心的三线建设。由于过急地提出要在“三五”期间把三线建设起来，大幅度地提高三线投资的比重，给整个国民经济带来不利影响，三线也没有建设好。“三五”和“四五”期间三线投资很多，但效果很差。许多工厂虽已建成，



但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实际产量和设计能力相差很远。如贵州六盘水地区的煤炭开发，1977年已建成21对矿井，设计能力1120万吨，由于不能配套，实际上只能生产720万吨。另据四川调查，由于军工实行独立的生产体系和“封闭式”的管理办法，尽管经常有40%~50%的闲余能力，却不能参加国民经济的生产活动，进行民品生产。由于军工任务大，地方为军工配套的任务很重，成为一个很重的负担。三线建设强调分散、进山、进洞，使布局极不合理。例如某省一个军工企业，已建成的43个单位，分散在3个市、3个专区、9个县，长350公里，山区道路难走、交通困难，给生产和生活带来难以克服的困难。三线建设项目都有比较长的尾巴。我们1977年在西南调查时，据有关方面估计，原有项目收尾配套，四川还要投资47亿元，贵州还要20亿元。不少项目进退两难，成了包袱。

经济结构不合理还表现在其他许多方面。例如我国教育、科学事业和经济建设的要求也很不适应。实现四个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是关键，教育是基础。现在我国的教育很落后，就普及小学教育来说，形式上有90%的人进了小学，实际上读完五年级的不过60%，真正达到小学毕业程度的只有30%，全国约有文盲1.4亿人。1976年每万人中的在校大学生人数，美国是550人，日本是210人，苏联是200人，印度是58人，而我国只有9人。1979年我国教育经费平均每人7.3元，而英国是366元，意大利是350元，荷兰是1266元。据教育部反映，仅中小学的危房面积即达5400多万平方米，占校舍总面积17.2%。我国科学事业也还没有放在应有的地位上。1977年我国科学研究经费平均每人2.5美元，估计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4%，而美国为2.2%（1977年），苏联为2.6%（1975年），日本为2%（1973年），联邦德国为2.1%（1973年），英国为2.7%（1969年），法国为1.8%（1971年）。我国科学技术人员在人口中所占比重也远远少于这些国家。

什么是当前经济结构中最主要的问题呢？我们认为最主要的是两大部类关系不协调。大家知道，处理好两大部类的关系是顺利实现社会再生产的首要条件。具体来说，实现社会扩大再生产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第一，生产资料部门应该生产出维持简单再生产所需要的生产资料 and 实现扩大再生产所需要追加的生产资料。第二，生产消费资料部门应该生产出维持简单再生产所需要的消费资料和实现扩大再生产所需要追



加的消费资料。只有具备这两个条件，才有可能实现扩大再生产，缺少其中任何一个条件，扩大再生产都会遇到困难。当前我国经济结构的根本问题，就在于生产资料生产和消费资料生产不相适应，总的来说，是消费资料严重落后于生产资料。列宁在论述资本主义再生产问题时曾说：“把社会产品分为截然不同的两类即生产资料和消费品，应该是谈论社会资本和社会收入（也就是谈论资本主义社会产品的实现）的出发点。”^①这对于社会主义再生产也是适用的，我们也要把解决两大部类的关系作为解决一系列经济结构问题的出发点。

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具体存在的是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等部门，而不是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两大部类。在计划工作和其他经济工作中，两大部类必须具体化为农轻重等部门。但是农轻重部门之间的关系并不能确切反映两大部类的关系。我们通常把农业、轻工业看成是消费资料部门，把重工业看成是生产资料部门，实际上，农业轻工业也生产某些生产资料，重工业也生产某些消费资料。有些部门例如化学工业很难说是轻工业还是重工业。农轻重关系是否协调，归根结底要看它是否符合社会再生产对两大部类的要求，离开了两大部类的划分，处理农轻重关系也就失去了客观标准和科学依据。

经济结构不合理的后果

以上问题，说明当前我国经济结构很不合理，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这种情况，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极大的损害。

首先，阻碍社会再生产的进行。

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必然使得社会再生产难以顺利进行。长时期来，我们一方面设备利用率低，产品库存多，另一方面大量待业人员需要就业，这就是社会再生产受到阻碍的明显表现。不妨和资本主义国家比较一下设备利用率和失业率的情况。我国不少企业“停三开四”或“停四开三”；全国金属切削机床的利用率，1977年为54.6%，1978年为55.6%。美国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时设备利用率最低为1932年的

^① 《列宁全集》第3卷，第119页。



42%，依次为1933年的52%，1931年的53%，1934年的58%，其他年份都在65%以上。我国有些产品一方面大量进口，另一方面库存不断增加。如钢材，1976年底库存1 200万吨，1977年底1 260万吨，1978年底1 550万吨，1979年6月底1 865万吨，相当于8个月的周转量，而罗马尼亚不超过90天，日本相当于一个月。我国需要就业的人数同可提供的就业机会矛盾很大，1979年初要求安排就业的2 000万人，其中急需安排的800万人。美国20世纪30年代危机时期的失业率最高为1933年的24.9%，依次为1932年的23.6%，1934年的21.7%，1935年的20.1%，1936年的16.9%，1931年的15.9%，1930年的8.7%。50年代最高为1958年的6.8%，最低为1954年的2.5%。1979年年初我国职工人数9 499万人，待业人员所占的比重是相当高的。我国不少企业的工时利用率也很低。据北京市调查，1978年为84.3%，其中第三、四、五机械工业部所属北京工业企业只有74.5%。我国社会再生产受到阻碍还表现在国民经济大起大落和许多基本建设项目被迫下马。我国工业总产值1958年和1959年每年增长54.8%和36.1%，1961年和1962年每年下降38.2%和16.6%。农业总产值1959年和1960年每年下降13.6%和12.6%。1961年基本建设投资比1960年减少2/3，1962年又比1961年减少1/3。这次调整国民经济，也有大批工程下马。资本主义制度由于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占有的矛盾必然发生经济危机。社会主义制度克服了资本主义的矛盾，完全有可能避免经济危机。但是，如果经济结构不合理，社会主义制度下也难免产生种种类似于资本主义危机的现象。

其次，导致经济效果下降。

我国“一五”时期经济效果是比较好的。但从“二五”时期开始，除1963~1965年调整时期有所好转外，经济效果有下降的趋势。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一五”时期为83.7%，“二五”时期为71.4%，“三五”时期为59.5%，“四五”时期为61.4%，1952~1978年平均为68.5%。1952~1978年我国基建投资共6 000亿元，仅形成固定资产4 000亿元，如果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维持在“一五”时期水平，则可以多形成固定资产1 000亿元。我国每增加一元国民收入需要的投资数，“一五”时期为1.68元，“二五”时期为73.7元，“三五”时期为2.32元，“四五”时期为3.76元，1976~1978年为3.20元。可见近年来增



加一元国民收入需要的投资比“一五”时期增加近一倍。我国国营企业每百元资金实现的利润和税金，“一五”时期为29.4元，1978年为18.2元，减少11.2元。1978年底国营企业共有资金6 095亿元，如果每百元资金实现的税利达到“一五”时期的水平，则可增加收入600多亿元。

经济效果下降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经济结构不合理确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一五”时期积累率 and 建设规模比较合理，经济效果也较好，“二五”时期和“三五”时期以来，积累率过高和建设规模过大，经济效果也下降很多。这不是偶然的。因为，建设规模超过了国家可能提供的财力、物力和人力，必然使建设项目不能及时得到所需的资金、设备、材料和劳动力。过去几年，木材、钢材、水泥一般只能满足需要的60%~80%，这种情况，必然拖长工期，增加造价。许多项目不能及时建成，即使建成了，由于缺乏原料、动力，也不能及时投产。建设规模过大还会损害原有企业的生产，这就是扩大再生产挤掉简单再生产，结果两败俱伤。过分突出重工业和忽视轻工业也导致经济效果下降。1978年每百元资金实现的利润和税金，轻工业为54.1元，重工业为18元。资金回收年限，轻工业为一年四个月，重工业为五年七个月。农业结构不合理也导致经济效果下降。例如有些地方由于毁林开荒，毁草种粮，使植被遭到破坏，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据估计目前全国水土流失面积达150万平方公里，每年冲走表土50亿吨，损失的氮、磷、钾相当于4 000万吨化肥。我国国土面积960万平方公里，除10%属于高山、冰川、流动沙丘和戈壁等，不能或基本不能用于农业生产，以及主要用于农业生产的10%耕地以外，其余80%的土地没有很好利用。有人计算这80%的土地只创造了10%的产值，现有牧业、副业产值的大部分也来自农区。这种情况和农业结构不合理也有密切关系。工业地区结构不合理对经济效果也有很大影响，例如三线的建设费用和生产成本比其他地区高得多。

再次，阻碍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如前所说，从统计数字看，我国经济发展速度是相当快的，甚至快于世界上一些重要国家。但是，我国人民经济生活却改善得比这些国家都慢，人民吃穿用住全面紧张。从1957年到1978年，我国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9.7%，而职工的生活水平不仅没有改善，反而下降了。扣除物价因素后的职工实际工资，1978年平均为557元，比1957年的



583元减少26元,平均每年下降0.2%。同国外相比,日本1955年到1975年职工实际工资每年增长7.1%,罗马尼亚1950年到1977年职工实际工资每年增长5.9%。1978年我国农村人民公社每个社员从集体分得的收入是73.9元,比1957年增加33元,平均每年增长2.9%,如扣除价格因素,实际上没有增加那么多。目前还有相当一部分农民缺吃少穿。1978年每人从集体分得收入在50元以下的困难队还占30%,每人每年分配的口粮,水稻地区在400斤以下、杂粮地区在300斤以下的生产队,约占全国20%左右,青海宁夏占30%,内蒙古、甘肃、贵州占40%。

以上情况的形成当然不能完全归之于经济结构不合理,但结构不合理显然也是重要原因之一。积累率过高必然挤掉消费,使人民生活得不到应有的提高,这个道理是很容易明白的。此外,产业结构不合理,例如忽视农业、轻工业、商业、服务业,不把它们放在应有的地位上,也必然限制人民生活的改善。现在我们主观上希望快些纠正积累偏高、消费偏低的缺点,希望迅速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但这样做不仅受增产速度的限制,而且受目前生产结构的限制。这两年我们较大幅度地提高了职工的工资和社员的收入,市场供应就比较紧张。这些都表明合理的经济结构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前提条件,而经济结构不合理必然对人民生活起消极作用。

最后,妨碍改革经济管理体制。

我国经济管理体制存在很多严重问题,亟须改革,大家也越来越深刻认识到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但在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的情况下,是难以进行大规模的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即使改革的试点工作,也遇到经济结构不合理带来的种种困难。例如基本建设投资由拨款改为贷款,就受到有些基建物资得不到及时供应的限制和阻碍。经济结构不合理也使得一些产品的供销受到限制,妨碍竞争的开展和商品生产的发展,从而不利于贯彻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方针。经济结构不合理也妨碍企业进行整顿和改进经济管理,妨碍按专业化协作的原则改组工业。现在有些企业扩大了自主权,但所需的燃料、动力和原材料得不到保证,生产和基建不能顺利进行,因而也难以发挥主动性、积极性。我们当然不能说经济结构不合理就不能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必要的改革还是应该坚持进行的,这样也才能保证经济结构逐步合理化。但



是，当前经济结构存在的问题确实是不利于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的。

若干经验教训

为什么建国 30 年我国经济结构还很不合理呢？这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从客观方面说，我国解放以前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结构，不能不对以后的经济结构产生影响。解放后，我国一直受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包围和威胁。我国开始建设时，是以苏联作为社会主义的惟一样板，把它的经济管理体制和经济结构全盘搬过来的。加上我国经历过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封建的传统长，影响深，例如不重视甚至歧视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不讲究经济核算和经济效果，是有根深蒂固的基础的。但当前经济结构不合理主要是由于主观上的原因，除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外，就是由于工作指导上的失误，这种失误又是和理论上的片面性和经济管理体制上的缺陷联系着的。如果我们工作得好一点，失误少一点，经济结构中的问题就不会像现在这样严重。如果“一五”时期以后经济结构继续不断地健康发展，现在我国就会有一个比较合理的经济结构了。因此，为了使未来少犯错误，不犯和过去同样的错误，我们应该认真地总结经验教训。

我国在处理经济结构时有哪些经验教训呢？我认为以下几点经验教训是比较重要的：

第一，要按照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和水平的要求建立合理的生产关系结构。

经济结构包括生产力结构和生产关系结构两个方面。马克思说：“生产的承担者对自然的关系以及他们互相之间的关系，他们借以进行生产的各种关系的总和，就是从社会经济结构方面来看的社会”。^① 马克思的这个定义，对社会主义社会也是适用的。因此，合理的生产关系结构理所当然是合理的经济结构的内容。我们必须按照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的要求，正确处理所有制结构等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生产关系结构还对生产力结构的许多方面有决定性

^① 《资本论》第三卷，第 925 页。



的影响，生产关系结构不合理，也就难以建立合理的生产力结构。我国经济结构的演变表明：建立合理的生产关系结构是建立合理的生产力结构的前提。

我国“一五”时期经济结构的演变所以比较健康，就是因为进行了土地改革，采取恰当的方法步骤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由于这些措施是符合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的要求的，因而促进了生产力迅速发展，从而为经济结构的合理化创造了有利条件。我国经济结构出现严重问题是从1958年公社化开始的。在1956年合作化高潮中，就有对合作化速度要求过快，对社会化程度要求过高的缺点，以后在公社化运动中大刮共产风，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损害了农业的发展。农业减产，影响到轻工业和重工业，加上在工业商业中破坏经济核算、按劳分配等社会主义制度，这就不仅使得生产关系出了问题，而且使得生产力受到破坏，导致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三年调整时期经济所以好转，首先也是由于调整了生产关系（如实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取消供给制和食堂），使之适合生产力的状况。文化大革命时期和近几年的历史也是既从反面又从正面说明了合理的生产关系结构是建立合理经济结构的关键问题之一。

我国当前生产力状况极不平衡，和多层次的生产力相适应，必须建立多层次的生产关系。因此，为了建立起合适的生产关系结构，就必须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占绝对优势的条件下，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多种经营方式并存。

曾经流行一种观点，认为所有制越大越好，越公越好。这种观点的理论基础，是认为生产关系可以走在生产力的前面，这样才能使生产力有发展的余地，从而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它在实践上导致盲目地追求“一大二公”，在经济形式上搞一刀切。这种观点是违背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和水平的基本原理的。事实表明，生产关系落后于生产力状况固然要阻碍和破坏生产力发展，生产关系超越生产力状况同样要阻碍和破坏生产力发展。过去我们对机械化和合作化的关系也有片面的认识。诚然，在我国走先机械化后合作化的道路是不合适的。但是，不能认为合作化的过程可以完全不依赖于机械化，更不能认为合作化可以超越生产力的发展水平。首先，合作化的步骤和合作化的规模是由生产力的状况，特别是由机械化的水平决定的。其次，



合作社组织生产、交换、分配的经济形式也是由生产力的状况决定的。再次，合作社的巩固和发展也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列宁说：“没有整个的文化革命，要完全合作化是不可能的。”^① 这里说的文化革命包括生产力的提高和农民文化水平的提高。历史证明列宁的论断是正确的，而我们没有完全按照列宁的话去做，犯了错误。

最近，党中央提出：要放宽政策；经济特别落后的地区，政策要放宽、放宽、再放宽。所谓政策要放宽，就是要彻底纠正长期以来执行的“左”的政策，纠正一刀切的错误做法，使生产关系的各个环节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和水平。党中央的这个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只有坚持贯彻这个方针，才能充分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使工农业生产迅速发展起来，使经济结构逐步合理化。

第二，正确处理速度和比例的关系，搞好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

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实行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于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个重要方面。而要保证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就必须搞好综合平衡工作。我国过去的经验也充分表明，综合平衡是顺利地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条件，也是顺利地实现经济结构合理化的重要条件。

“一五”时期我们缺乏经验，但当时比较注意综合平衡，强调“综合平衡是计划工作的基本方法”，因此经济发展比较顺利。以后为了盲目追求高速度，往往不重视甚至违背综合平衡的要求，吃够了苦头。例如1957年我国钢产量535万吨，1958年要求达到1070万吨，1959年要求达到1800万吨，这种不切合实际的高速度导致三年困难时期的严重比例失调。后来也没有认真吸取教训，“三五”时期、“四五”时期又重复了高指标的错误，又一次导致严重比例失调。

搞好综合平衡必须正确处理速度和比例的关系。速度和比例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根据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的原理，社会再生产顺利进行的条件是两大部类之间以及各个部类的内部必须按比例发展。也就是说，比例是速度的前提条件，速度应该服从比例，而不是比例应该服从速度。但过去却流行比例应该服从速度的说法，认为比例关系应该服从高速度的要求，计划工作中一切应该服从高速度，把速度作为计划的出

^① 《列宁选集》第四卷，第687页。



发点和归宿。经济发展速度问题当然是一个重要问题。我们常说社会主义经济应该高速度发展，但这种高速度应该是有科学根据的，能够长期持续维持的，有利于国民经济各部门协调发展的，有利于形成和发展合理经济结构的，有利于迅速提高人民生活的。这就必须以搞好综合平衡为前提。由于指导思想上的问题，我们往往背离了这种要求，仅仅追求总产值的一时的高速度，甚至不择手段，采用竭泽而渔等办法，用浪费来增加总产值。这样就使得速度中有许多虚假的东西，难免发生有速度而没有人民生活改善这类不正常现象。实践已经充分说明比例服从速度之类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社会主义国民经济只有按比例，才可能高速度发展，不按比例，绝不可能有真正的高速度。

这里涉及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问题。计划的目的就是生产的目的，把速度作为计划的目的，实质上就是为速度而速度。马克思早就指出：“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但是，没有消费，也就没有生产，因为如果这样，生产就没有目的。”^①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就是以提高人民生活作为直接的目的。而过去我们却长期忽视人民生活问题，政治经济学很少研究甚至根本不研究消费问题。一直流行着“先生产、后生活”、“先治坡、后治窝”等说法，这就反映了我们思想认识上的片面性。

为什么长期以来我们盲目追求高速度呢？这个问题是很值得研究的。原因之一是我国经济落后，人民生活贫困，迫切要求改变落后面貌和提高人民生活，因而在指导上就容易产生急躁冒进情绪和“左”的倾向。这也可以说是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的速成论思想，这种思想除表现为盲目追求高速度外，还有其他许多表现，如要求各省都很快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我国有的省比欧洲一个国家还大，在经济建设上当然应该发挥它们的主动性、积极性。但每一个省都要求很短时间内建立自己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在当前我国生产力水平还很低的情况下，就必然导致百业俱兴，齐头并进、力量分散、重复建设，造成基本建设规模过大和国民经济比例失调。毛泽东同志在著名的《论持久战》一书中曾指出：“亡国论是不对的，速胜论也是不对的。”“这里也是主观性和片面性作怪”；“‘先生之志则大矣’，先生的看法则不对，照了做去，一定碰壁。因为估计不符合真相，行动就无法达到目的，勉强行去，败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94页。



军亡国，结果和失败主义者没有两样”。抗日战争问题上的速胜论是不对的，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的速成论也是不对的。今后我们还应该警惕这种速成论。

第三，正确处理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关系。

过去，我们把工业化道路看成主要是农轻重的关系问题，看来这个认识应该提高。因为，实现工业化，除了处理农轻重关系外，还要处理好其他许多非常重要的问题，如能源问题，交通运输问题，科学技术问题，教育问题等等，这些问题，有的不包括在农轻重关系之内，有的虽然在内，但地位没有突出。为了使经济结构合理化，我们也必须处理好所有这些问题。

但是，农轻重问题在实现工业化和经济结构合理化方面也确实是一个关键问题。在我国国民收入中，农轻重加起来占80%以上，在我国当前就业人数中，农轻重合计占85%以上。我国“一五”时期经济结构比较合理，农轻重关系处理得比较好是一个重要原因。“一五”时期工农业总产值中，农、轻、重的比重分别为47.9%、29.6%、22.5%，这个比例在当时来说是比较合适的。“二五”时期改变为27.2%、29.7%、43.1%，农业的比重急剧下降，重工业的比重急剧上升，标志着国民经济比例的严重失调。大体来说，目前我国农轻重比例以3:3:4比较合适，即农业、轻工业的比重合计不低于工农业总产值的60%，重工业的比重不高于40%。

为了正确处理农轻重的关系，我们必须纠正片面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错误。过去片面优先发展重工业是同理论上的片面性有关的，就是认为优先发展重工业才是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道路，优先发展轻工业则是资本主义工业化的道路。其实，这种理论是不能成立的。人们常引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的历史来证明这种理论。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确实是从轻工业开始工业化的，但由此不能证明从轻工业开始工业化就是资本主义道路。问题在于，这些资本主义国家从轻工业开始工业化主要不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是由于当时生产力的状况。英、法等国家开始工业化的时候，农业在这些国家占统治地位，工业中是以纺织工业和其他轻工业为主，煤炭炼铁等重工业还很不发达，这种生产力状况决定了工业化要从轻工业开始。当时这些国家纺织工业的原料和销路比较有保证，技术上比较早为产业革命准备了条件，因此很自然地从事



工业开始工业化，资本主义企业规模小、积累少，也适宜于经营轻工业，没有条件大规模发展重工业。而企业的规模和积累的规模归根到底也是生产力决定的。可见，当时这些国家生产力的状况决定了它们的工业化只能从轻工业开始，后来生产力状况改变了，重工业发展了，资本积累了，到了一定的阶段，它们也都优先发展重工业，靠重工业的发展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纵观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一个国家从农业国发展为工业国，一般都要从轻工业开始工业化，经过一个优先发展轻工业的阶段，用轻工业来带动农业和重工业的发展，轻工业和农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然后再优先发展重工业。

因此，我们并不笼统地反对优先发展重工业，问题在于时间、地点、条件。例如，我国“一五”时期实现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就是正确的。我国1953年大规模开展社会主义工业化，当时轻工业已有所发展，同时有一定的潜力，而重工业却很不发展。1952年，重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不到15%，全国一年只能生产原煤6600万吨，生铁193万吨，钢材135万吨，成品钢材106万吨，金属切削机床1.37万台。在这种情况下，优先发展重工业是必要的。事实上，“一五”时期贯彻这个方针也取得了巨大成绩。但以后我们没有根据条件的变化，在重工业已经离开了农业和轻工业片面发展的情况下，还是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同时在重工业中又片面实行以钢为纲，这就不能不犯错误了。

我们片面优先发展重工业同片面理解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原理也有密切关系。过去流行的说法是：没有生产资料生产的优先增长，扩大再生产根本不能实现。这种说法有很大的片面性，不符合马列主义原理。马克思提出的扩大再生产的公式并不认为生产资料必然优先增长。列宁把技术进步引起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情况引入马克思的公式，才得出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结论。可见，根据列宁的意见，生产资料优先增长也是有条件的，扩大再生产中并非任何时候都要求生产资料优先增长。需要指出的是，列宁是在舍象了许多条件，或者说是在假定一些条件下得出技术进步和有机构成提高的情况下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结论的，在他的公式中，除了马克思的那些假定〔如不变资本(c)在一年内全部消耗完，剩余价值率(M:V)不变，劳动生产率不变等〕外，还假定积累率下降，第一部类有机构成提高速度快于第二部类，这些假定当然是



有根据的，就是说客观中可能存在这种情况。然而客观情况是极其复杂的，我们也可以做出和列宁不同的但也是有根据的假定。问题在于，技术进步和有机构成提高会伴随着种种复杂的情况，例如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剩余价值率的增加，积累率的提高等等。如果考虑到这些复杂情况，则在另外一些合理的假定下，技术进步和有机构成提高时扩大再生产也未必一定要求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而且以上我们也还没有考虑到公式发端时的种种不同情况。如果原来第一部类已经过分突出从而影响再生产的顺利进行，则就不能优先发展生产资料而必须优先发展消费资料了。过去把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看成是无条件的，并以此来证明应该无条件地优先发展重工业，这显然是不妥当的。但是，现在有些同志根本否认生产资料优先增长是一个规律，或者根本否认这个规律在社会主义再生产中的作用，这也是缺乏科学根据因而是不正确的。列宁对于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分析是有科学根据的。在技术进步和有机构成提高等一定条件下，扩大再生产是以生产资料优先增长为前提条件的。世界上主要的经济发达国家几乎都经历过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阶段。我国现在还处于手工劳动向机械化过渡的历史阶段，随着技术的进步，有机构成必将提高，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规律显然是要继续发挥作用的。当然，在运用这个规律时，必须充分考虑我国的实际情况。

第四，正确处理积累和消费的关系。

积累和消费的关系是国民经济结构的一个重要方面。积累和消费属于分配领域，它是由生产决定的，但又对生产有反作用。正确处理积累和消费的关系，也才有可能建立一个合理的经济结构。

“一五”时期我国积累消费关系处理得较好，保证了经济结构的健康发展。薄一波同志总结了“一五”时期的经验，曾经提出：在今后一段时期里，国民收入中积累部分的比重应不低于20%，或者略高一点；国民收入中国家预算收入的比重，应不低于30%，或者略高一点；国家预算支出中基本建设支出的比重，应不低于40%，或者略高一点。这个数量界线是有相当科学根据的。但以后我们没有这样做，积累率长期偏高，导致经济结构严重不合理。

一种曾经颇为流行的观点是：积累率越高，生产发展速度就可以越高，而提高消费水平，则必然会降低发展速度。这种把积累和消费对立起来，片面强调积累，忽视消费，甚至为了盲目追求高速度，不惜牺牲



消费来增加积累的观点，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以后林彪、“四人帮”就利用这种观点，公然胡说“八亿人民生活苦一点不要紧”，“生活再苦一点也没关系”。我国30年来的经验表明，积累率决定于生产发展的水平，一般来说，积累率在25%左右可能出现高速度，超过30%以上就可能会出现低速度，超过40%就要倒退。

为什么积累率过高总是引起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呢？这是因为，积累率不仅本身是一种重要的国民经济比例关系，而且影响其他比例关系。列宁说：“‘社会消费能力’和‘不同生产部门的比例’——这决不是什么个别的、独立的、彼此没有联系的条件。相反地，一定的消费状况乃是比例的要素之一。”^①特别是当前我国生产力还不发达，劳动生产率很低，人民生活还不富裕，在这种情况下，积累率就不能过高，即使生产有较快的增长，积累率也不能一下子提高很多。否则就必然挫伤劳动者的积极性，影响生产的发展，引起国民经济比例失调。

有人援引日本积累率超过30%来证明我国过去积累率并不偏高，这也是缺乏科学根据的。积累率高低要根据具体情况而定，日本按人口平均的国民收入比我国高得多，人民的消费水平和增长速度也比我国高得多，因此不能机械地把日本的积累率和我国相比。其实，日本的积累率也是逐步提高的。积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1946年至1955年为25.6%，1956年至1965年为33.4%，1966年至1973年为38.8%。而且日本1956年至1973年的18年间积累占国民生产总值为35.7%，占国民收入则为29.6%，也低于我国“二五”时期、“三五”时期和近几年的水平。

现在有些人有一种积累率越低越好的倾向。有些同志认为我国“一五”时期也是高积累和低消费，意思是说当时的积累率也是过高和不适当的。这种看法是错误的。“一五”时期的积累率平均为24.2%，各年相差不大。在这样一个积累水平上，国民经济各方面都有很大的发展，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0.9%。1957年比1952年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增长了52.1%，职工的平均工资增长了42.8%。这个时期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人民生活有较大改善，怎么能说是高积累低消费呢？恩格斯早就说过：“积累是社会的最重要的进步职能，”

^① 《列宁全集》第4卷，第44页。



“过去和现在都是一切社会的、政治的和智力的继续发展的基础。”^① 为了使国民经济有一定的增长速度，就必须保持一定的积累率。旧中国所以不能实现工业化，一个重要原因是缺少积累。据一些学者的估算，1931年到1936年我国的积累率分别为-4.1%、2.4%、-2%、-9%、-1.8%、6.4%。^② 这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剥削压迫的结果，不仅使工业化得不到必要的资金，而且造成了国民经济的停滞甚至倒退。现在我们有可能积累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所必要的资金，这正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表现。我们固然不能认为积累率越高越好，同样也不能认为积累率越低越好。

第五，改革全民所有制的经济管理体制。

我国现行的经济管理体制，是20世纪50年代初期从苏联搬过来的。这种管理体制的特点是片面强调国家对国民经济实行高度集中统一领导，国营企业由国家直接领导和管理，国家自上而下地向企业下达指令性计划指标，企业需要的生产资料由国家统一组织供应，生产的商品由国家统购统销，商品的价格由国家统一规定，企业的利润绝大部分上缴国家财政，亏损由国家补贴，企业基本建设需要的资金由国家财政拨款等等。在这种管理体制下，企业不是自动机而是国家行政机关的算盘珠，缺少应有的独立性和强大的经济动力，并完全取消了市场的调节作用。企业没有主动性也没有自主权按照市场需要进行生产，因此难免造成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的脱节，导致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在这种体制下，社会由于缺少一种自动调节的机制，既不能预先防止发生国民经济比例失调，而且在比例失调发生后，也不能及时发现和克服。

这种体制的理论基础是把社会主义经济看成自然经济或半自然经济。政治经济学的传统观点认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内部（全民所有制企业之间）是不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商品交换只存在于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之间以及不同的集体经济之间，理由是全民所有制经济内部交换产品时不改变所有权，而只有通过交换改变所有权的产品才是商品。持这种观点的人因此认为全民所有制内部流通的商品只具有商品的外壳，实质上已经不是商品，因而也不受价值规律的支配。实践证明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国营企业虽然都属于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233、350页。

^② 巫宝三主编：《中国国民所得》上册，第173页。



全民所有制，但企业又是具有相对独立性的，这种相对独立性是由当前生产力的状况和企业的地位作用决定的，它表现在生产技术、经营管理和经济利益等各方面。国营企业的这种相对独立性，决定它生产的产品，不论是消费资料还是生产资料，仍然都是商品，而商品必然受价值规律支配。如果不承认这些产品是商品，不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就必然要损害社会主义企业的相对独立性，必然要挫伤企业及其职工的主动性、积极性，对国民经济产生消极作用。党中央已经决定逐步扩大企业的自主权，实行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方针，这是完全正确的。

第六，重视经济管理和经济效果。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建立合理的经济结构，归根到底是要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就是要求加强经济管理，不断提高管理水平。列宁曾说：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紧接着就要解决管理这个任务。由于我国原来经济十分落后，缺乏组织和管理经济的经验，因此更加应该重视管理工作。“一五”时期经济管理工作做得比较好，经济结构也比较协调。但以后长期忽视了这项工作，没有把它放在应有的位置上。尤其是频繁的政治运动使整个国民经济和企业的正常秩序不断受到干扰破坏，形成长期不安定的政治局面，十年浩劫中各级政府机关、经济机关更陷于瘫痪的局面，搞乱了整个国民经济。

我国经济结构不合理同忽视经济效果也有密切关系。经济工作必须注意经济效果，这本来是天经地义的。刘少奇同志曾说：按经济学原理，用最少的劳动取得最大的报酬，这个原则，永远是这样，一万年也是这样。但是这个原理却长期被指责为修正主义，认为对社会主义社会是不适用的，流行着“要算政治账，不要算经济账”之类的“理论”。由于忽视经济效果，我们过去很少考虑甚至根本不考虑在现代化过程中如何充分利用我国的优势和避免劣势的问题。经济结构合理与否是相对的，是就一定时间、地点、条件而言的。合理的经济结构应该适合我国的国情，充分利用有利条件，克服不利条件。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大国，社会主义制度要求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因此必须加速发展农业、轻工业，解决人民的吃、穿、用、住、行问题，国民经济才能迅速健康地发展。而过去我们没有坚持这样做。我国劳动力多，相对来说缺乏资金，因此应该充分利用劳动力，努力积累资金、节约资金。发展轻工业既有利于利用劳动力，又有利于积累资金。但我们



却长期片面优先发展重工业，忽视发展轻工业。我国每人平均的耕地虽少，但有广大的草原、山地、水面可以开发利用，因此在重视狭义的农业的同时，还应该重视林牧副渔各业的全面发展。但我们片面强调以粮为纲，不仅忽视了林牧副渔，而且忽视了经济作物。我国各个地区也常常不注意利用当地的有利条件。例如山西省煤炭资源非常丰富，但并没有利用来把本地的经济搞活，甘肃、青海、内蒙古等地毛畜产品很多，也没有利用来带动本地经济的发展。一说炼钢铁，不管有无条件，全国都炼钢铁；一说发展化肥，不管是否经济合算，各地都搞小化肥。这种用搞政治运动的办法来搞经济建设，结果不是趋利避害而是趋害避利，不是提高经济效果而是降低经济效果。



合理化的经济结构和经济结构的合理化*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结构很不合理。粉碎“四人帮”以后，贯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情况明显好转，但仍存在不少问题。进一步调整经济结构，使之逐步合理化，为加快四个现代化创造条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任务。为此，需要从理论上和实践上研究和解决很多问题。本文准备提出一些问题，并谈谈自己的看法。

合理化经济结构的主要标志

什么是合理化的经济结构？合理化经济结构的主要标志是什么？

我认为，合理化的经济结构应该具有以下四个主要标志：

第一，有合适的所有制结构，即所有制结构适合于生产力的状况。只有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的状况，才有可能促进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建立起合理的经济结构。生产力的发展总是不平衡的，一定时期内各地区各部门的生产力状况不同，适应多层次的生产力，必须建立多种经济形式，而其中又有一种主导的经济形式。因此，建立合适的经济结构必须因地制宜，而不能搞一刀切。

马克思说：“生产的承担者对自然的关系以及他们互相之间的关系，他们借以进行生产的各种关系的总和，就是从社会经济结构方面来看的社会。”^①这个定义把生产力结构和生产关系结构都包括在经济结构内，是科学的。过去，我们忽视了生产力结构的研究，现在不能走向另一个

* 原载《齐鲁学报》1980年第6期。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25页。



极端，忽视生产关系的结构。问题还在于，没有合理的所有制结构，也难以建立合理的生产力结构。诸如合理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都是以合理的所有制结构为前提的。

为了研究的方便和深入，有时着重研究经济结构的某一方面是有必要的。例如，我们曾把经济结构和经济管理体制分作两个问题研究，前者着重研究产业结构等生产力结构，后者着重研究生产关系。但由此也不能否认合理的所有制结构是合理化经济结构的一个标志。而且研究经济管理体制也不能离开生产力结构，正如研究生产力结构不能离开生产关系结构一样。

第二，社会扩大再生产能够顺利进行。这是合理化经济结构的起码要求。如果社会扩大再生产不能顺利进行，这样的经济结构很难说是合理的。社会扩大再生产顺利进行的前提条件是处理好两大部类的关系，即：（1）第一部类应该生产出维持简单再生产所需要的生产资料和实现扩大再生产所需要追加的生产资料；（2）第二部类应该生产出维持简单再生产所需要的生活资料和实现扩大再生产所需要追加的生活资料。这就要求处理好两大部类之间的关系，即第一部类要为第二部类提供必要的生产资料，第二部类要为第一部类提供必要的生活资料。同时要处理好各个部类内部的关系。马克思曾指出，第一部类的产品“会不断地作为生产资料在这个部类的各生产部门之间进行分配”；“在这个部类的不同生产场所之间发生一种不断往返的运动”。^① 第二部类内部也有衣食住行用等方面所需产品的构成问题。必须处理好所有这些问题，社会扩大再生产才能顺利进行。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两大部类具体表现为国民经济的诸物质生产部门。社会扩大再生产能顺利进行，也就意味着国民经济各部门是协调发展的。

有的同志把第三产业^②达到一定比例作为合理化经济结构的一个标志。这个意见值得重视。第三产业的发展离不开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它决定于工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水平，即社会可以提供多少人力、物力从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474页。

^② 美国经济学家C. 科拉克把国民经济各部门划分为：第一产业，主要指农业、林业、水产业、畜牧业、捕捞业等直接利用自然资源进行生产的部门；第二产业，主要指矿山、制造业、建筑业和电力、煤气、自来水等进行加工生产的部门；第三产业，主要指商业、运输业、仓库储藏、邮电、服务业等流通领域和社会公用事业以及教育等部门。也有的国家（如日本）把电力、煤气、自来水等部门列入第三产业。



事这个产业的劳动。因此，不能机械规定第三产业占多大比例经济结构才算合理。不过，这里提出一个问题，即社会再生产顺利进行不仅要求生产出必要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而且要求这些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在流通中不遇到障碍，保证及时销售或及时供应。为了使社会再生产顺利进行，不仅要有合理的生产结构，而且要有合理的流通结构。

第三，生产力诸要素得到充分和有效的利用。合理化经济结构不仅要求社会扩大再生产顺利进行，而且要求整个社会得到最佳的经济效果，就是用尽可能少的劳动消耗取得尽可能大的经济效果。这就要求充分合理地利用现有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即把生产力诸要素合理地组织起来，充分发挥它们的作用。做到这一点，必须处理好就业结构、技术结构及其相互关系。要保持充分就业。如果有不少人失业，显然不能取得最大的社会经济效果。处理技术结构时也要考虑就业问题。在劳动力相对过多的情况下，要多发展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在劳动力相对过少的情况下，要多发展资金密集型的产业。^①

最佳的社会经济效果还意味着合理地利用自然条件，充分发挥自然资源的作用。马克思多次说过，各种自然资源对劳动生产率有重要的影响。各个地区的自然条件不同，各有有利和不利的方面。随着历史的发展，自然优势常常又是和经济优势结合着的。为了合理利用自然条件，就必须发挥各个地区的自然优势和经济优势。这里还有个保持生态平衡的问题。如果滥用滥伐、滥捞滥捕，造成资源枯竭、土地贫瘠、水土流失、气候失调，即使一时某些经济效果较好，但却后患无穷，贻害子孙。这样的经济结构，绝不能说是合理的。

第四，人民生活得到较快地改善。劳动人民的生活状况是经济结构合理与否的一个综合性标志。虽然各个社会生产的直接目的不同，但生产和生活、生产和消费总是相互依存的。马克思说：“产品只是在消费中才成为现实的产品，例如，一件衣服由于穿的行为才现实地成为衣服；一间房屋无人居住，事实上就不成其现实的房屋”；“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但是，没有消费，也就没有生产，因为如果没有消费，生

^① 有些经济学著作把经济分为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或称为资金密集型）。前者是指产业成本中活劳动耗费占比例大的经济，后者是指产业成本中物化劳动耗费占比例大的经济。现在还提出知识（技术）密集型经济，这是指建立在高度发展的科学技术基础上的工业，如高级电子计算机工业、高级客机工业、与原子能开发和宇宙航行有关的工业。



产就没有目的”。^①人民生活改善和提高得较快，不仅意味着生产有了较快的增长，而且意味着生产和生活的关系、积累和消费的关系处理得比较恰当，同时也意味着生产结构、分配结构、流通结构、消费结构都比较合理。

一个社会的经济结构如果具备了上述四个标志，就意味着它是良性循环的经济结构。首先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良性循环，即生产关系适合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又推动生产关系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其次是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良性循环，包括各个生产部门之间相互促进，各个流通部门之间相互促进，以及生产部门和流通部门之间相互促进。再次是生产力中人的要素和物的要素之间的良性循环，以及生产力和自然条件之间的良性循环，它们之间也是一种相互促进的关系。最后是生产和生活、积累和消费之间的良性循环，它们之间也是一种相互促进的关系。显然，这样的经济结构就有可能保证整个国民经济持续地健康发展。

不能认为只有实现了现代化才能达到经济结构合理化。因为合理化经济结构是一个相对概念，在不同的生产力状况下有不同的要求。即使没有实现现代化，建立一个比较合理的经济结构也是可能的。我国“一五”时期，虽然技术水平还较低，但经济结构却比较合理，工农业总产值每年平均增长10.9%，其中农业为4.5%，工业为18%；经济效果也比较好，每百元资金实现的税金利润达到29.4元，每百元积累增加的国民收入达到35元，固定资产支付使用率达到83.7%。这些指标都是比较先进的。人民收入增加也较多，5年内全国职工实际工资每年平均增长5.5%，农民收入每年平均增长4%。问题还在于，只有经济结构比较合理，才能为加速实现现代化创造前提条件。

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建立合理化的经济结构

为了建立合理化的经济结构，我们必须借鉴其他国家包括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但由此出现了一种错误的看法，认为马克思主义关于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8页。



资本主义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理论不灵了，似乎资本主义制度下才可以建立起合理的经济结构。

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结构，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不断地改善，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例如，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产业结构在科学技术发展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基础上发展得比较合理了，技术结构和能源结构也有合理化的趋向，一些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国家根据本国的情况调整产业结构也取得了一定成效。这些都是不容否认的事实。但不能由此而夸大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结构的合理性。简言之，这是因为，首先，资本主义所有制存在着资产阶级剥削无产阶级的对抗性矛盾，不可能建立合理的所有制结构。其次，资本主义制度必然存在生产无政府状态，即使它推行经济计划化，也不能真正实现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即使这些国家的第三产业发达有其积极的一面，但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寄生性的，如泛滥成灾的广告业，海淫海盗的“娱乐业”，臃肿庞大的政府官僚机构以及赌博业、保镖业等等。这些都是现代资本主义腐朽化的表现。尤其是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可避免地要发生经济危机，战后美国就发生过七次经济危机，根本说不上社会扩大再生产顺利进行。再次，资本主义制度下也不可能充分有效地利用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加上剥削阶级的挥霍无度和庞大的军事开支，必然带来生产力的巨大浪费。又次，战后剩余价值率有增长的趋势。美国制造业的剩余价值率1947年是146%，1975年提高为263%；联邦德国工业中剩余价值率1950年是204%，1974年提高到265%；日本工业的剩余价值率1951年为275%，1976年为431%。即使是最富有的美国，根据官方规定的贫困线，1976年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数，占全国总人数的11.8%，其中白人为9.1%，黑人和少数民族为29.4%。可见资本主义制度是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劳动人民贫困化的问题的。因此，说资本主义制度下才可以建立合理的经济结构，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是没有根据的。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有利于实行经济结构的合理化。这是因为：第一，社会主义社会消灭了剥削制度，劳动人民当家作主，有共产党领导和马克思主义指导，有可能正确处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关系，建立合适的所有制结构。第二，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产生了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可能性，有可能正确处理国民经济各个部门之间的关系，使之协调发展，保证社会再生产顺利进行。第三，社会主义制度



克服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为向生产的广度和深度进军提供了有利条件，有可能合理利用人力、物力、财力和自然资源，取得最佳的经济效果。第四，社会主义生产的直接目的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有可能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不断地改善和提高人民生活。

需要指出的是，社会主义制度虽然为经济结构的合理化提供了可能性，而要使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却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我国“一五”时期以后，到粉碎“四人帮”为止，除1963~1965年三年调整时期情况有好转外，其他时期经济结构均处于不很合理或很不合理的状态。究其原因，主要是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没有按照社会主义原则办事。突出的问题有两个：一是违背了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性质和水平的规律，在生产关系上盲目追求“一大二公”，不断地刮“共产风”，搞“平均主义”，严重地挫伤了生产者的积极性，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我国全民所有制经济的管理体制也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这是在自然经济论影响下建立起来的，把社会主义经济看成是自然经济或半自然经济，限制和排挤商品生产，不让企业有必要的相对独立性，取消了市场调节的作用，使社会主义经济缺少一种自动调节的机制，因而也难以充分发挥计划调节的作用，难以避免和克服国民经济失调现象。二是处理生产力结构的一系列指导思想有问题。例如，盲目追求高速度，否定计划工作的综合平衡原则；片面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和以钢为纲；片面强调多积累，忽视改善人民生活。这些错误理论导致错误的产业政策和不切实际的国民经济计划。长期执行这种政策和计划，难免造成国民经济比例失调。虽然，按社会主义制度的本性来说，是完全可以避免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因此，我国经济结构不合理的原因不在于社会主义制度。只要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和社会主义原则办事，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们是能够建立起合理的经济结构的。我国“一五”时期经济结构的健康发展，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既然资本主义国家难以建立真正合理的经济结构，又为什么要向它们学习呢？我认为，认真研究它们的经验是为了：

第一，掌握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经济结构演变的规律。这是建立合理的经济结构所必需的。由于资本主义国家历史较长，目前的技术水平也较高，我们可以从它们经济结构的演变中探讨这方面的规律。例如，随着科学技术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第一产



业部门的就业人数比重趋于下降；第二产业部门的就业人数比重先上升，后下降，总的还是上升；第三产业部门的就业人数比重不断上升。如日本 1880 ~ 1965 年间就业人数中，第一产业由 82% 下降为 25%，第二产业由 6% 增加为 32%，第三产业由 12% 增加到 43%；美国 1880 ~ 1963 年间就业人数中，第一产业由 50% 下降为 8%，第二产业由 24% 增加为 33%，第三产业由 26% 增加为 59%。国民生产总值的部门构成变化同就业构成趋势相同。又如，随着收入增加，资本主义国家居民的消费构成也发生了变化。美国居民 1953 年的食品、衣服和鞋袜的开支占总收入的 35.6%，1976 年为 23%，耐用消费品支出比重则由 11% 上升为 16%。西欧各国居民用于食品、衣服和鞋的开支从 1953 ~ 1955 年的 47.4% 下降到 1971 ~ 1976 年的 40%，耐用消费品则由 7.3% 上升到 11%。这些现象都带有一定的规律性。

第二，学习它们处理产业结构、技术结构等方面的经验教训。在处理生产力结构方面，资本主义国家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例如，它们从轻工业开始工业化，既有利于解决资金、技术、就业等问题，又促进了农业和重工业。后来又由优先发展轻工业转向优先发展重工业，用重工业来带动轻工业和农业。到具备必要的条件时，又因地制宜地实现农业现代化。又如，日本战后劳动力过剩，因而重视劳动密集型产业，20 世纪 60 年代后劳动力紧张，就开始注意资本密集型产业。现在由于能源危机，加上环境污染严重和国际竞争剧烈，正愈来愈重视知识密集型产业，着重于研究发展型产业，如飞机工业、电子计算机工业；高度加工型产业，如汽车和电机产业；流行型产业，包括家庭用品和室内装饰等领域；知识型产业，包括软件和信息处理等在内的产业。再如，一些资本主义国家非常重视基础结构，重视科学教育事业和引进外国技术，这些对改进它们的产业结构也起了良好作用。

第三，借鉴它们处理生产和消费结构、企业的大中小结构、就业结构等方面的经验教训。例如日本，很重视处理生产和消费的关系，最明显的是 1960 年制定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提出“十年后按人口平均计算的国民收入提高一倍”，计划中专有一篇讲“国民生活前景”，给人们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这个计划对动员日本人民的劳动热情起了一定作用，使计划提前完成了。它们还很重视正确处理大中小企业的关系。1975 年日本中小企业共有职工 3 375 万人，占全国就业人数



78.4%。日本的大企业通过各种形式和中小企业紧密结合，织成纵横交错的经济网络，形成了一个比较有活力的大中小企业相结合的经济结构，既充分发挥了中小企业发展生产、流通和服务事业的作用，又有利于稳定社会秩序和政局。再如联邦德国，在解决就业问题上也有一套办法。它们在经济困难年份，总是采取“反失业措施”，主要内容有：扩大公共投资，增加就业出路；刺激私人投资，增加就业机会；实行“改行”训练，帮助工人改换行业、工种和工作地点；提前退休，缩短工时，推迟学生毕业离校日期和延期参加工作，等等。此外，还有些资本主义国家推行经济计划化，力图克服生产无政府状态。这当然不可能完全实现，但其经验教训也可供我们实行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方针时参考。

第四，学习它们研究经济结构的方法。如提出了上面说的把产业分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及第三产业，分为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知识密集型产业等。虽然他们研究的目的是都是为了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理论和方法往往带有资产阶级的偏见，但不仅他们收集的资料（如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在《国家经济增长——总产量和生产结构》一书中，收集了英国、美国、法国、联邦德国、日本等国家长达几十年甚至一二百年的历史资料），而且他们使用的方法和得出的某些结论，都可供我们参考。

怎样实现我国经济结构的合理化

当前我国经济结构不合理的主要表现是：生产关系的某些环节和生产力不相适应，农轻重关系很不协调，生产和流通不相适应，积累和消费比例失调，人力、物力、财力没有充分利用，人民生活有很多困难。实现我国经济结构的合理化，就是要针对这些问题，采取正确的措施。这里不可能全面论述这些措施，只能就若干重要措施作些分析。

第一，正确处理生产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处理生产关系问题的原则，是根据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继续改革国营经济的管理体制，同时充分发挥集体所有制经济的作用，做到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占绝对优势的前提下，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和多种经营方式存在。

1979年开始进行的以扩大企业自主权为中心的经济管理体制



已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应该坚持进行下去。要通过经济管理体制改革，使国营企业自负盈亏，成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这样，社会主义企业才能充分发挥主动性，履行作为国民经济细胞应起的作用；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方针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才能为社会主义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建立起必要的经济机制。没有这种经济机制，生产力结构的合理化是没有保证的。

有的同志不赞成国营企业自负盈亏，理由是实行自负盈亏就取消了国家所有制，使国营企业变成集体企业了。我不同意这种看法。所谓自负盈亏，就是国营企业在交纳国家投资（即国家交给企业支配使用的固定资金和流动资金）所应得到的那部分利润后，在交纳了各种税收和费用后，盈亏由企业也就是企业的领导和全体职工（不仅是领导人，也包括其他职工，因为全体职工都是社会主义企业的经营管理者）完全负责。列宁说过：“各个托拉斯和企业建立在经济核算制基础上，正是为了要他们自己负责，而且是完全负责，使自己的企业不亏本。”^①可见国营企业是能够实行自负盈亏的。这样做没有取消国家所有制（即通常说的全民所有制），企业交给国家的利润就是国家所有权在经济上的实现，而归企业支配的利润则是企业作为经营者所取得的。集体所有制企业使用的生产资料不属于国家所有，因此没有上交利润的任务。可见，国营企业实行自负盈亏和集体企业仍是有区别的。

有同志说，只有独立的商品所有者才能自负盈亏，全民所有制企业虽然是商品生产单位，但不是独立的商品所有者，因此不能自负盈亏。这种说法也值得商榷。我们知道国营企业具有相对独立性，是相对独立的经济单位。如果不维护企业作为商品生产者的权益，还有什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呢？这种说法实际上是否认了国营企业的独立性和它的产品是商品，否认了社会主义生产是商品生产。事实上，说生产资料属于国家所有，又说国营企业要自负盈亏，这并不矛盾。因为所有者和经营者既有联系又能够分离。这种分离，资本主义社会普遍存在，社会主义社会也存在，不过性质有所不同罢了。弄清楚了这一点，就能理解国营企业可以自负盈亏而不会影响国家所有制的性质。

正确对待集体所有制是所有制结构合理化的重要内容。这里有必要

^① 《列宁全集》第35卷，第549页。



强调发展城镇集体经济的必要性、重要性和迫切性。我国城镇集体经济，过去被看做落后的经济形式，屡遭砍伐，这是造成经济结构不合理的一个重要原因。事实上，城镇集体经济应该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职工经济利益密切，市场适应性强，既可以适应手工劳动，也可以适应机械化和自动化，因而有巨大的生命力，将和国营企业一起长期并存，在发展生产、繁荣市场、满足人民需要等方面发挥巨大的作用。那种认为集体经济落后，必须向国营经济过渡的办法，是没有根据的。今后必须大力发展城镇集体经济，并坚持自负盈亏的原则，其所有权和自主权必须得到尊重，有权根据国家法令采取各种经营方式，经营得好，职工的工资福利可以高于国营经济。

当前还应该适当发展城镇个体经济。1957年我国有城镇个体劳动者106万人，占全民和集体所有制职工及城镇劳动者合计的3.2%，1978年减少到15万人，占0.16%。这种情况和生产力的状况也不适应。我国现阶段生产力水平还比较低，有相当一部分小商品的生产、流通和服务行业项目，还得靠手工劳动，宜于分散经营。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还不可能完全取代个体经济。现在有些城市放宽政策，发展了一批个体工商户，对安排就业、促进生产、方便群众生活起了良好作用。社会主义社会的个体经济和旧社会的个体经济不能混为一谈，虽然它属于生产资料私有制范畴，但是，它的发展趋势决定于周围的经济条件。马克思曾说，资本主义社会的现代家庭工业和旧式家庭工业“除了名称毫无共同之处”；“它已经变成了工厂、手工工场和商店的分支结构”。^①现在我国公有制占绝对优势，个体经济已经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附庸，只要我们加强领导，善于领导，就能发挥它的积极作用，克服它的消极作用，而绝不会导致资本主义复辟。

第二，正确处理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关系问题。为了处理好这方面的关系，使扩大再生产顺利进行，需要抓住以下几个主要环节：

(1) 处理好农轻重关系。我国“一五”时期工农业总产值中，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比重分别为47.9%、29.6%、22.5%，在当时是比较合适的。1978年改变为25.6%、31.8%、42.6%，农业比重过低，重工业比重过高。看来，当前加快农业、轻工业的发展速度，适当提高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06页。



农业、轻工业的比重，适当降低重工业的比重，这样使我国的产业结构在一段时期内做到所谓“轻型化”，可能是比较合适的。

我国农业应当有较快的发展。目前，我国发展农业一要靠政策，二要靠科学。要使农村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的状况，据此制定和执行正确的政策。还要使生产队和社员有权因地制宜发展农业生产，采取行之有效的生产责任制和其他经营管理制度。一些地区实行的各种联系产量的责任制，由于把产量和报酬直接联系起来，适应了农业生产劳动的特点，有利于贯彻多劳多得和发展生产，应该总结经验，加以推广。社员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要有长期稳定的政策，要受到保护。要科学地制定农业区域规划，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发挥其优势，实现农林牧副渔业全面发展。

在今后一段时期内，应继续优先发展轻工业，应在多发展一些农业和轻工业的基础上发展重工业。实现现代化必须发展重工业，这是肯定的，但要保证人民生活的需要，重工业就不能过重，就必须为农业轻工业服务。因此要克服重工业主要为自己服务的倾向。

(2) 解决好能源问题。当前和今后，能源问题是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一个主要矛盾。1953年到1978年，我国工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11.2%，而能源年平均只增长9.6%，加上能源使用中浪费严重，当前能源问题极为突出，以致全国约有20%~30%的工业生产不能发挥出来，农业机械得不到充分利用，生活用能源也很紧张，全国1.7亿农户，每年平均缺烧3个月左右。

解决能源问题，要开发和节约并重，近期把节能放在优先地位。我国能源的利用效率低，浪费大。1977年美国能源消费量为我国的5.33倍，日本则和我国大致相等，而美国国内生产总值为我国的11.2倍，日本为我国的4.2倍。我国的能源利用率只有28%~30%，而日本在50%以上。因此，节能潜力是很大的。一方面，要大力发展以节能为中心的技术改造，先搞那些技术已经成熟、看得准、容易搞、投资小、见效快的，再搞那些比较复杂、难做的。另一方面，改革产业结构也要以节能为中心。据计算，重工业比轻工业每亿元产值耗能多四倍，耗电多两倍。我国还应根据资源情况及早确定长期稳定的能源政策，建立合理的能源结构。

(3) 搞好基础设施。国外学者称交通运输、通讯邮电等为基础设



施或公共设施。日本经济专家认为，在发展农业、工业的同时必须注意公共设施的建设，包括围海造地、铁路、公路、港口、大型水利、电力、医院、学校、商业、上下水道、住宅等建设。在日本，各级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主要是考虑并负责这方面的建设。现在我国交通运输业、商业服务业和生产发展都不适应，“骨头”和“肉”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调。这些问题，都应有计划有步骤的解决。

第三，正确处理劳动力、技术和自然资源的关系问题。当前我国劳动力、技术和自然资源都没有充分发挥作用，这是经济效果差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处理好就业结构、技术结构和发挥地方优势，十分重要。

关于就业问题。1978年底，全国需要安排的人员有1500多万，到1985年每年新成长的劳动力有300多万。安排好这些劳动力，将有利于生产的发展，安排不好，将在很多方面带来消极影响。这就需要调整就业结构，广开就业门路，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容纳更多的劳动力。要多发展劳动密集型的、适合我国特点的、节约能源和原材料的产业和产品。我国国营企业职工平均每人固定资产约10000元，其中轻工业约6000元，重工业约12000元。集体企业职工平均每人固定资产不到2000元。同样的资金，用于轻工业比用于重工业可以多安排一倍劳动力，用于集体企业可以多容纳四倍劳动力。因此，应当大力发展需要发展而又用人多的轻工业、手工业、商业服务业，发展集体所有制企业，并允许从事个体劳动，在此基础上逐步实行统一安排和自谋出路相结合的就业方针。为了解决就业问题，还要严格控制人口增长，有步骤地改革劳动制度，克服现行劳动制度过死、只能进不能出的缺陷。

关于技术结构。合理的技术结构应该符合最佳经济效果的原则。因此要和劳动力、资金结合起来考虑。为了加快现代化，应该引进一些必要的先进技术，但是不能花太多的钱来搞引进先进技术的大型企业，在这样的企业里，每个职工的固定资金要几十万元甚至几百万元，搞得多了是力所不及的。我们要尽可能实现少花钱的现代化。在采用先进技术的同时，要多采用资金少、提供就业机会多的适用技术。有些发展中国家根据经验，认为不适用的技术包括：（1）不适合本地市场和消费者要求、喜好的技术；（2）以进口材料为基础，很少使用本地材料的技术；（3）不能缩减到与本地市场的规模相适应的技术；（4）不能充分